

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

主 编：裴坚章

副主编：于武真 张光祐 姚英

世界知识出版社

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

2012.12

钱其琛

为世界和平而奋斗
金日成

外交部：

这个文件看过，很好，同意。

这个文件在我这看了近一个月，这是我的不对。但你们不得也有责任，近几天还是因为怕错，我才从该局的文件中译出来看了。因为，在修权时，¹⁹⁶¹1961年10月20日，文中最近将统一领导组织提提的提法提出，如果这个提法已经提出，就须加以说明的。

金日成

十二月三日

(106)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之厚愛，不勝感荷。茲為擴大宣傳，特在各地設立分銷處，以便讀者隨時購閱。凡欲訂閱者，請向各分銷處接洽。此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第 一 期

本報地址：重慶市中區

本報地址：重慶市中區

謝子厚先生賀電
 敬啟者：貴報創辦以來，成績斐然，不勝欽佩。特此敬賀，並希繼續努力，為社會服務。此致。

清大附：

周經理處：(101)
 有，原中校路，前次及有美并平
 延期撥款，順的模文，即將
 七五期或十六日在莫斯科等處，高
 日因發表，(101)第二日定於。清大
 的部招，整復月全一高，立即起件
 一編此稿，並於十五日下午送我們。

1947年10月14日

1950年2月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和维辛斯基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字





1954年10月，毛泽东主席等同访华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见后合影

1972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1972年9月，毛泽东主席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



1974年2月，毛泽东主席会见访华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



毛泽东主席 1975 年 10 月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

李鹏总理在毛泽东外交思想
研讨会开幕式上讲话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在研
讨会开幕式上宣读贺词并讲话



在外交部三楼礼堂举行研讨会



贺 信

其琛同志并转外交部毛泽东外交思想研讨会：

欣悉外交部在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之际，举办毛泽东外交思想研讨会，旨在学习、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外交思想，进一步作好新时期的外交工作，为加快我国的四化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我认为这是具有深远和现实意义的事情，衷心祝愿研讨会圆满成功。

江泽民

1993 年 12 月 7 日

目 录

在外交部毛泽东外交思想研讨会

开幕式上的讲话 李 鹏 1

学习毛泽东外交思想做好新时

期外交工作 钱其琛 3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光辉思想积极

开展党的对外工作 李淑铮 12

学习与弘扬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 滕 藤 20

继承毛泽东对外经济交流思想

促进我国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贸易

事业的发展 刘向东 26

毛泽东和中外文化交流 陈昌本 35

毛泽东的民间外交思想和重要决策 韩 叙 46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外交战略思想 姚仲明 63

学习毛泽东外交思想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外交学 刘 山 75

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探析 郝润昌 84

毛泽东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若干论述 傅耀祖 96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演变·····	迟爱萍 112
毛泽东对外战略中掌握主动的思想·····	谢益显 128
学习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的外交 思想与实践·····	周溢潢 140
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建交原则与创建 新型外交的重大思想决策·····	黄嘉华 149
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先声 ——简论毛泽东关于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 主张·····	尹承德 162
重大的历史决策 ——论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 与策略思想·····	木 君 172
学习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 决策·····	曹桂生 181
毛泽东高屋建瓴的策略思想和斗 争艺术 ——学习中美大使级会谈策略运用的点滴体会 ·····	赵祥龄 194
毛泽东关于反对美国武装干涉台湾 的决策·····	沈智焕 203
毛泽东关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 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思想·····	张立淦 217
学习毛泽东关于西欧联合自强的 思想·····	高存铭 226
试论毛泽东关于中法关系的战略	

思想	曲 星	239
毛泽东关于睦邻友好政策的思想		
和实践	马行汉	256
毛泽东关于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		
运河主权和黎巴嫩、约旦、伊拉克		
反抗外来干涉的决策	郁兴志	264
毛泽东关于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		
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斗争的决策	曾 涛	270
毛泽东关于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		
以色列扩张主义斗争的思想		
.....	闻兆祥 王小庄	274
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为中非		
友好合作关系奠定坚实基础	钟 非	281
毛泽东关于发展中拉关系的外交		
思想与实践	蔡维泉 杨万明	294
新中国华侨工作的指路人	张宏喜 何 锦	303
毛泽东与外国文化界朋友的谈话的		
深远意义	金畅如	310
毛泽东与外国记者	马佑增	317
毛泽东反对大国主义的光辉思想		
和实践	刘毓明	323
在外交部毛泽东外交思想研讨会		
上的总结发言	田曾佩	331

在外交部毛泽东外交思想研讨会 开幕式上的讲话

(1993 年 12 月 7 日)

李 鹏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 100 周年，党中央将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届时江泽民同志将发表重要讲话。作为纪念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外交部举行毛泽东外交思想研讨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毛泽东同志是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无论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他都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他的伟大历史功绩是多方面的。从理论上讲，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从实践上讲，他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此后又进行了各方面的建设。外交工作是毛泽东同志历史功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外交战略家，为我国外交战略的确立和外交方针政策的制定，进行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毛泽东外交思想是极为丰富的。比如，在建国初期提出“站在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方针；关于中国的事情应该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的主张；关于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

辅的主张；关于国际关系应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张；关于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正确结合起来的主张；关于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的方针；关于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思想，等等。回顾和研究毛泽东外交思想，目的是为了做好新时期的外交工作，从而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

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提出了一整套包括外交工作在内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开展外交工作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方针。邓小平同志深刻而全面地分析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战略、方针和政策。比如：关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两大主题；关于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新秩序；关于实行对外开放；关于“一国两制”；关于对国际形势的变化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等等。这一系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极强的针对性的思想和论断，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从事外交工作必须认真学习并加以切实贯彻的。

现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的历史时期，世界形势也正处在深刻的大变动之中，外交上面临的局面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希望外交战线上的同志们，认真学习好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大胆开拓，有所作为。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我们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十分珍惜。现在我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外交工作，都在蓬勃发展，形势喜人。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把握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为我们提供的不可多得的有利时机，不断夺取国内战线和外交战线的更大胜利。我预祝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学习毛泽东外交思想 做好新时期外交工作

(1993 年 12 月 7 日)

钱 其 琛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也是当代伟大的外交战略家。他为我国外交战略的确立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建立了辉煌的历史功绩。他的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永远是我们学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在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之际，外交部举行这次研讨会，就是要以学习、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光辉的外交战略和策略思想的实际行动进一步做好外交工作，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开创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为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自鸦片战争以后的 100 多年里，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的祖国饱受忧患，变成为“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为了寻找真理，谋求救国救民之道，曾经不得不向外国学习，向西方学习。然而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次次打破了中国人的迷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战后世界人民和被压迫被剥削民族觉醒起来，人

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正如毛泽东充满革命激情的词句所歌颂的那样：“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在国际上面临以美苏为首的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尖锐对立，并长期进行着冷战的局面。当时的美国政府把中国革命的胜利看作是“受苏联控制”，对中国疯狂推行“扶蒋反共”政策，企图使中国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

在建国前夕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这就是中国将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加强同爱好和平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捍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当然“一边倒”是建筑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基础之上的，绝不是倒向苏联的怀抱。毛泽东当时就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为了同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外交一刀两断，在外交上必须“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就是割断同旧中国屈辱外交的联系，不给驻旧中国的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合法地位，在未建交前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看待。只有经过谈判才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在清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特权和影响之后，再让外国客人进来，以免敌对者“钻进来”捣乱。毛泽东曾形象地把旧中国比作一个被外来铁蹄蹂躏过的破落家庭，说它的屋子太脏了，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蚊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干净，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再请客人进来。为此，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重新审查处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摧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

在建国庆典上，毛泽东庄严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为同世界各国建立新型外交关系，区别不同国家对我国的不同态度，随着形势的发展掀起了三次建交高潮。到他老人家逝世的1976年，在当时世界上独立的130多个国家中，同我国建交的已达110多个。在国际上树立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庄严形象，赢得了朋友，赢得了信誉，为巩固我国革命胜利成果，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毛泽东既十分珍惜我国得来不易的独立自主权利，也非常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权利。他以无产阶级解放自己必须解放全人类的博大胸怀和促进全人类共同进步的远大理想，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正确结合起来，作为我国外交的基本指导思想。他早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就明确指出：“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他多次强调，亚非拉国家有共同的历史遭遇和现实任务，中国同亚非拉国家需要互相支持。亚非拉人民的反帝斗争对我们是很大的支持，胜利了的中国要支持世界人民。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曾庄严宣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并把这种支持看作是“中国应尽的国际义务”。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毛泽东高屋建瓴，坚定地站在被压迫民族和国家一边，坚决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所进行的斗争。只要是有利于民族解放和维护和平的斗争，都给予了道义上的支援，直到他们取得胜利。对于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在经济上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援助，并

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同他们的贸易来往和经济合作，帮助他们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政治独立。毛泽东一贯认为，国家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应一律平等。在对外交往中，他既反对傲慢自大，又反对妄自菲薄，要求不骄不躁，不亢不卑。他说：“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好东西都要学。”当然，“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

为了促进共同发展，毛泽东一向主张世界各国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合作。他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热情似火地盼望和关怀着人类共同发展事业。他在《念奴娇·昆仑》一词中曾豪情满怀地咏道：“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毛泽东这种崇高的国际主义思想，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广泛地赞赏和颂扬，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了国际社会的合作与发展。

为了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必须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此，毛泽东决定把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作为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和历史任务。他一贯认为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国际形势紧张的根源，也是对世界和平与我国安全最大的威胁。他1954年9月在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就明确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他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是纸老虎。他说：“从本质上看，从长期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是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毛泽东把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的成功经验，运用于外交战线上。他提出“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反对帝国主义，制止战争，维护和平。

毛泽东主张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灵活运用策略，根据不同发展情况和实际需要，采取“发展进步努力，争取中间努力，孤立顽固势力”，反对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他领导我们同美苏两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不断调整外交战略和策略，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回想建国初期，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新中国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妄图遏制以至扼杀新中国。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更加紧了对我国的军事威胁。毛泽东不畏强暴，采取“后发制人”策略，三次警告美国，中国人民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国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如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一定要管。但美国错误估计形势，不听我国警告，越过三八线，逼近鸭绿江。毛泽东毅然作出战略决策，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一道，把美国军队打回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于1953年7月签订停战协定。同时，还应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要求，采取多种形式大力援助印度支那人民取得了反法抗美、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胜利。1954年在苏联的建议下召开了日内瓦会议，我国实际上首次以五大国的身份参加

国际会议，排除美国阻挠，恢复了印度支那和平。美国在朝鲜和越南战争中失败后，为加紧对台湾的控制，于1954年12月同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并支持台湾军队对大陆和沿海进行骚扰。毛泽东及时发出解放台湾的号召，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了一江山岛。当时，美国非常恐慌，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出面斡旋，阻止我国采取进一步行动。毛泽东坚定地指出，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联合国或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1955年4月，亚非会议召开，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挫败了美国的破坏，推动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在这次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发表了愿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的讲话，推动中美两国1955年8月开始进行大使级会谈。经过朝鲜、越南和台湾三条战线上打谈结合、灵活多样的较量，严重打击了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也打出了我国的军威和国威。为中国外交树立了不畏强暴，伸张正义，坚持原则，说话算数的独特风格。

到50年代末期，由于苏联当时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妄图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战略，并向我提出许多有损主权的无理要求，当毛泽东和党中央理所当然地坚决予以拒绝后，苏联领导人仍一意孤行，于1960年7月突然决定撤走在华全部苏联专家，撕毁数百个协议和合同，不断制造边境纠纷，煽动边民逃跑，对我国进行经济、政治和军事威胁，使两国关系迅速恶化。为反对苏联的控制，维护我国主权，我国采取“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访苏，再次表示我国改善关系的愿望。但是，苏方不仅拒绝中方的建议，而且加强对我国的军事威胁，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多次制造挑衅事件，并扬言要摧毁我国的核基地，把中苏关系推向战争边缘。与此同时，美国直接出兵越南，逐步扩大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危及我国安全

和世界和平，并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华逆流。面对美苏同时逼来的威胁，毛泽东号召“金猴奋起千钧棒”，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在北面顶住苏联的种种压力；在南面大力援助越南打败美国的侵略战争。

到60年代末期，国际风云变幻。美国由于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国力削弱，内外交困。苏联则趁机增强军力，不断向外扩张，同美争夺世界霸权。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即大声疾呼：“同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所处的地位相比，美国遇到了甚至做梦也想不到的那种挑战。”他决定调整战略，借助中国，结束越南战争，对抗苏联挑战。苏联也怕中美两国联合，使它腹背受敌。面对美苏争夺霸权的新态势，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战略家的卓越胆识，毅然调整我国的外交战略，摆脱与美苏同时对抗的局面，使中国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国际上形成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以平衡国际战略力量，制约战争势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他抓住苏联在珍宝岛的挑衅，打下苏军的猖狂气焰，迫使柯西金来北京机场同周恩来会晤，达成维护边界现状，重开边界谈判，把中苏关系从战争边缘上拉了回来。这时，尼克松也加快同我国和解的步伐，1972年2月正式访华，发表上海公报，终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

通过上述一系列重大外交举措，实现了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促成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建立，捍卫了我国的独立主权，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创了外交新局面。

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7年了，我们外交战线上的干部永远可以从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宝库中吸取营养，结合实践，常学常新。我们要学习他以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立足点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学习他不怕压、不信邪、不畏强暴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英雄气概；学习他满腔热情支持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

国际主义精神；学习他在外交工作中运用统一战线的战略与策略。

在我国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后，外交上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新问题层出不穷。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外交思想，结合新的外交实践，使它更加丰富、完善和具有生命力，并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久前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收入主要谈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的文章 30 多篇，几乎占三卷篇目的三分之一。这些著作中谈到的重大事件和反映出的光辉思想，都是我们 10 多年来亲身经历过的，读起来备感亲切，深有体会。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是我国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内容博大精深。他总结和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把毛泽东外交思想同当前我国具体外交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与方针政策。他经过冷静观察，深入研究，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并相应作出我国的两大战略决策：一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新的科学判断，认为当前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因而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外交要为四化服务。二是改变了“一条线”战略，坚持独立自主，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从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我们的态度和对策。同时，为加速我国四化建设和推动祖国统一大业，他制定了对外开放和“一国两制”等基本国策，进一步开创我国外交的新局面。在小平同志的理论和方针指导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我们在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发展睦邻关系，顶住外来压力，扩大对外开放，为改革和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等方面有了新的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进一步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不久以前，江泽民主席应邀赴美国西雅图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同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了正式会晤。这次访问是我国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的新形势下所采取的一项很重大的外交行动。中美首脑举行正式会晤是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这次会晤不仅对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且对推动我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对国际形势和亚太地区局势都将产生深刻的积极影响。

我们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学习毛泽东、邓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振奋民族自尊和自信心，艰苦实践，做好新时期的外交工作，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我们对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的最好的纪念。

最后，祝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研讨会圆满成功。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光辉思想

积极开展党的对外工作

(1993 年 12 月 7 日)

李 淑 铮

今年 12 月 26 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 100 周年纪念日。我们今天举行这个大会，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学习他的光辉思想，继承他的革命遗志，对于贯彻执行党在新时期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在波澜壮阔的非凡一生中，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永不磨灭的巨大功勋，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对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为争取世界和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他不愧为 20 世纪的世界性伟人。他的业绩永载史册，他的英名万世流芳。

毛泽东同志以他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他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毛泽东同志不仅为我党我国制定了对外关系的基本路

线，而且还亲自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各种不同政治倾向、不同意识形态的各方面人士交往，接见了许多来访的客人。他说：“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同国外的同志、朋友谈谈。连敌对的人，我也见见谈谈。”从新中国成立至1976年9月毛泽东同志逝世的27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他先后700多次会见了应党和政府邀请来自五大洲100多个国家的3000多名各界人士，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不仅在他的重要著作中，而且在同外宾的谈话中，在指导我党我国的对外工作的实践中，阐明和提出了一系列光辉思想，奠定了我党同外国党发展关系的原则基础，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党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对外工作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同志一贯主张不要照搬外国模式，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他一再强调指出，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理论一定要同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国，花了巨大的精力，不断纠正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才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并使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根本出发点。

中国革命的胜利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受到一切要求革命和进步人士的关注，特别是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同志迫切希望学习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对此，毛泽东同志强调的是不要照抄外国的经验。他说：“中国经验作为参考则可，照抄则不可。中国的经验有好的，有坏的；有成功的，有失败的。即使是好的经验，不一定适合别的国家的具体情况。抄经验是要吃

亏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他甚至劝他们回国后“把中国的经验全忘掉”，强调对一切外国同志“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归根结底也在于此。

毛泽东同志强调这个基本原则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因为当时在国际共运中，长期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迷信大党的经验，不顾本国实际情况，照抄照搬。这些倾向、要求和作法，给许多国家的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毛泽东同志针对这种情况，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其历史功绩和深远意义是十分巨大的。

二、毛泽东同志始终强调党和国家都要独立自主。他历来认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各国的党和人民应根据本国的情况和自身条件，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一切事务。他领导中国人民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新中国，使备受外国势力凌辱的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国后，他又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自主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发展道路。我们一定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否则，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在对外关系中，他既坚持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认为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去寻找、创造和决定。他说：“一个国家的党要领导革命走向胜利，不通过自己的路线、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手，而靠别国帮助就不行。”

“革命是自主，建设也是自主。”

国际共运 100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虽然任何一国的革命和建设都离不开国际上的同情、支持和帮助，但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还是这些国家的党和人民。1957 年 11 月，他在出席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时，曾与各党领导人就有关各党独立自主的问题交换看法，反复阐述独立自主的观点。在讨论《宣言》稿时，毛泽东同志明确要求把“独立自主”的意思写进去。他对外国党的领导人说：“在这次会议的宣言上，我们提出加上一句话，各国党的事由他们自己决定。这样对各党就没有束缚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现在已成为国际交往的一个重要准则。

三、毛泽东同志认为，党与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要平等相处，坚决反对“老子党”、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于遭受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欺压的国家、民族和人民，毛泽东同志总是表示极大的关注、支持和同情。他说：“国有大小，党也有大小，都要平等相处，不能不协商而强加于人。”毛泽东同志指出，一个国家或一个党想对另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党实行控制，到最后都控制不了。他说：“当父亲来控制儿子，儿子长大了，照样不听父亲的话。一个家庭都如此，何况一个国家、一个党。”对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毛泽东同志总是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他说：“世界在变化，不是一两个大国所能管住的。各国人民应管各国人民的事情，不能允许任何外国人的干涉。”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坚持平等相处，相互尊重，不强加于人，并且坚定地反对各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被压迫国家和人民伸张正义，因而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崇敬。

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还一再告诫全党，在对外事务中要谦虚谨慎，彻底干净地消灭大国沙文主义。他说：我们自己曾是被

欺侮的，知道受欺侮是什么滋味，“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即使中国将来物质力量发展起来了，也永远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不干涉人家的内政，不搞强加于人。毛泽东同志还要我们虚心向外国学习，认为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他说：“世界各国，什么地方有好东西，统统学来。这是件好事。”“资本主义在经营、管理上有许多地方比我们好，我们也要学习他们的好的东西。”我们党在新时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是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思想一脉相承的。

四、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做人的工作，主张在国际上广交朋友，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和政党之间可以求同存异，发展合作。他强调对外工作要着眼于人民，提出了人民外交的崭新思想，指出党也好，国家也好，总是朋友越多越好，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毛泽东同志说：“没有朋友是不行的。”中国人民需要和平，需要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们需要许多外国朋友的帮助，不管这些朋友是什么国家的，只要他们愿意来中国看一看，我们是欢迎的。他主张同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政党，可以在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下，求同存异，发展合作。早在1954年，毛泽东同志在同来华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就曾明确表示过：“尽管思想和社会制度不同，两个政党完全可以合作，如果丘吉尔的党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同它合作。我们也愿意同美国合作，只要美国愿意。”1959年他在会见智利激进党领导人时说：“你们大概不信仰共产主义。你们信仰你们的，我们信仰我们的，但是我们有共同点，可以合作。”1961年毛泽东同志在同法国社会党的一位领导人交谈时说，西方国家和政党同我们党和国家存在的各种障碍只是“暂时现象，”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障碍，只要在互不

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排除的。

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同志当年关于同西方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发展关系的主张没有能够及时实现。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的对外政策的调整，毛泽东同志的这一预见逐渐变成了现实。现在我们党已同世界上许多各种类型的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其中大部分是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这不仅符合双方的利益，而且对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发展事业也很有好处。

五、毛泽东同志每当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总是高瞻远瞩，不信邪，不怕压，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他一再强调，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道路总是曲折的，而前途却是光明的。他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新中国成立之后，国际反动势力无论用什么方式对我们进行威胁，毛泽东同志从不屈服，总是从战略上藐视它们，在战术上却又非常重视它们。他在斗争中既有高度的原则性，从不拿原则作交易；同时又有充分的灵活性，注意有理、有利、有节。毛泽东同志这些战略和策略思想，曾引导我们党冲破一道道难关，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在今天新的国内外环境下，尤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们党逐步调整了对外关系。邓小平同志在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用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和科学论断，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在国际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洞察和分析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提出了关于在较长时间内有可能避免世界大战的论断；关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关于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关于对国际局势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等新的战略思想。在党的对外关系方面，他回顾了国际共运中纷繁复杂的历史，提出了如何处理我党与外国党关系的指导原则，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党际关系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同志指出，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有两条原则一定要坚持。第一条原则是，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不是父子党关系；第二条原则是，任何国家的事情只能由那个国家的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他在总结过去处理党际关系的经验时指出：“有一点最重要，就是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划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

我们党根据毛泽东同志一贯的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就我们党如何处理同外国党关系所作的新的论述，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我们主张党际关系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为条件。各国不同性质的各类政党，只要遵循这四项原则，都可以进行接触、交往，建立友好联系，增进了解，求同存异，在和平和发展等共同关心的事业中谋求合作。近十几年来，正是在这些原则和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的对外关系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其范围之广泛，形式之多样，内容之丰富，都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现在我党已同世界上 120 多个国家的 280 多个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其中不仅有共产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民主政党，也有发达国家的其他政

党。我们党的对外交往路子越走越宽，朋友越来越多。我们的朋友遍布五洲四海。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领导党和执政党。党的对外工作是国家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同其他外事战线一样，都服从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为我国的建设事业争取一个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我们要进一步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对外关系的思想，学习邓小平同志继承、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最新论述，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为进一步开展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关系而努力奋斗。

学习与弘扬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

(1993 年 12 月 7 日)

滕 藤

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精髓。作为毛泽东思想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是毛泽东同志本人和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战后国际斗争极其尖锐复杂的背景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阶级斗争的普遍原理指导我国进行外交斗争实践的具体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赢得了一次又一次重大的外交斗争胜利，这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正确性和强大生命力。因此，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00 周年之际，我们重温、研究与弘扬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对于指导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外交实践，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

我们认为，为了卓有成效地学习与弘扬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首先要掌握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分析国际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科学方法，了解他们确立我国不同时期的外交斗争的战略目标和依据。

我们知道，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从方法论上讲，是严格建立在对国际社会基本矛盾及主要矛盾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而我国不同时期外交斗争的战略目标的选择就是以对国际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客观认识为基本依据的。把握了这一点，也就意味着把握了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精华。

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方面，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作为这一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空前高涨，席卷世界。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在推行“遏制共产主义”战略的同时，力图建立美国的世界霸权。这样，在国际社会中，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为一方，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及其同盟军——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为另一方之间的对抗与斗争便构成了主要矛盾。新中国解放之初，其主要任务是，保卫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成果，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帝及民族民主解放斗争。从外交战略上讲，新中国当时采取了“一边倒”即倒向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方针。而在1950年10月，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维护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就是这一战略方针的一个具体体现。在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一道，将北犯美军赶到“三八线”附近，而在外交上则运用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加强与朝鲜、苏联等兄弟国家的合作，增进与友好国家的团结，以打破帝国主义的进攻与封锁。这一外交战略还表现在抓住参加日内瓦会议和第一次亚非会议的有利时机，积极宣传我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战略主张。经过与有关国家共同努力促成了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增进了我国与亚非各国的相互了解，开创了我国外交活动的新天地，从而显示了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威力与正确。日内瓦会议是一次为争取朝鲜问题和平解决及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而召开的国际会议。这是

我国建国以后参加的第一次重大国际会议，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亲自率团参加。在这次会议上新中国关于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赢得了国际公正舆论的好评；中国为恢复印支和平所作的努力，也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称赞。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是由29个亚非国家召开的国际会议，在这次会上，由于中国和与会国的共同努力，将十项原则（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引申）写入了会议最后公报。通过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这两次国际会议，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回顾这一历史时期，正是由于准确地分析和把握住了国际斗争的主要矛盾，从而制定了正确的外交战略，并充分运用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思想，如：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大力支持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思想；在战略上敢于藐视敌人，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被敌人所压倒，而在战术上认真对待，绝不轻敌，亦即对待真老虎和纸老虎的辩证统一思想；团结绝大多数，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以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思想等，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的进攻和封锁，取得了外交战线上的辉煌胜利。

从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随着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相继上台，对外实行霸权主义，除出兵捷克、鼓吹有限主权论和用武力征服弱小邻国外，还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在对待社会主义中国的态度上，也同样采取了霸权主义的立场，在中国头上挥舞指挥棒，力图控制中国。为压服中国，苏联不仅调兵遣将于中苏、中蒙边界，而且进一步扬言要对我进行核打击，中国的国家安全及世界和平因此而受到了空前严重的威胁。这也充分表现了国际范围内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转变为广大爱好和平、维护独立的国家和人民与力图瓜分和控制世界的两霸之间的斗争。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

利用美苏矛盾及美方有求于我的机会，不失时机地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并通过各种渠道传递信息，促成尼克松的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有效地减缓了苏联对我国安全所构成的压力，并成功地实现了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外交战略的卓越和斗争艺术的高超！继50年代万隆会议前后我国实现的外交活动高潮之后，70年代我国又一次外交活动高潮的出现，自然是与我国成功地实行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密切相关的。如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完整和民族尊严，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的思想，坚持独立自主、充分利用矛盾、避免孤立的思想，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的思想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确立和发展，为我国国家安全及世界和平在这一时期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历史和人民将永远铭记。

80年代末期以来，国际范围内的主要矛盾再次发生了变化，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两极格局的崩溃，美国实力地位的进一步下降，世界格局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东西矛盾），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矛盾（南北矛盾）等基本矛盾虽仍存在并不断深化，但由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性的规律制约，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矛盾的斗争更加尖锐，西西矛盾日益激化，对中国的外交斗争来说，正确地把握形势，处理好中美、中日、中欧和中俄关系，有利于改善我国的战略安全态势，是当前外交的重要课题。随着经济重心向环太平洋区域转移，亚太地区对世界影响越来越大，中美日关系势将日趋重要，其中处理好中美关系是关键之着。一方面，美国从自身实际利益出发，不得不调整对华关系。而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有利于我改革开放

和发展经济的大局，有利于我搞活外交全局；另一方面，也不能指望美国改变对我国以压促变的既定方针。

邓小平同志在继承与发展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基础上，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风云，进一步阐释并坚定了我国外交斗争应为国家经济建设这一中心服务，处理好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的基本方针，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指导原则。正是在这一方针和原则的指导下，我国在对待诸如中美关系中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和人权、军售与核试验问题，中英关系和香港回归问题，中欧关系和台湾问题等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并在涉及到国家主权的有关问题上坚持原则立场，寸步不让，从而体现了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近几年来，我国的外交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个个新胜利，这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上述指导原则自然是密不可分的。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创新，求同存异，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善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战略指导思想在外交斗争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回顾 40 多年来外交斗争的实践、科学地总结毛主席的外交战略思想，系统、完整地加以表述，是外交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们认为，从外交的战略目标看，必须坚持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和民族尊严，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坚决支持第三世界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经济发展的斗争，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从外交的指导原则看，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在国际上，调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必须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和有利于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对外政策在一定意义上说

总是对内政策的延长,要把握国际形势以实现本国的利益和要求,服务于国家的基本路线。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善于斗争,敢于胜利。我们还应在今后的外交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科学总结,以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

总之,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国际条件下,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我们学习与弘扬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对于我国在外交上推行一项行之有效的战略,以不断提高与增强我国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对于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是具有特殊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支研究国际问题的队伍。我们愿意同外交部及其他兄弟部门的同志一道在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指导下,进一步加强国际问题的研究,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外交工作服务,并以此作为对毛泽东同志的纪念。

继承毛泽东对外经济交流思想 促进我国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贸易 事业的发展

(1993 年 12 月 7 日)

刘 向 东

在毛泽东同志诞辰 100 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举办毛泽东外交思想研讨会，深切缅怀毛泽东同志在开创和领导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中建立的不朽业绩，这对于我们继承毛泽东思想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具有重要的意义。

按照会议的安排，我就继承毛泽东对外经济交流思想的问题作一发言，主要是结合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实际，谈一谈学习毛泽东对外经济交流思想的一些个人体会。毛泽东对外经济交流思想内容是很丰富的，这里，我主要谈三个方面。不当之处，请与会的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开展对外经济交流，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合作是毛泽东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名字不仅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光辉理论和实践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且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包括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实践也是分不开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毛泽东同志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奠基人，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对外经济贸易事业的开拓者，他关于对外经济交流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对于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同志一贯主张，中国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来往，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经济形势是极其严峻的。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努力恢复和发展经济，同时积极着手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当时，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采取敌视和封锁政策，我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基本上限于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进行。1950年2月，毛泽东同志率团访问苏联期间，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开始向我国提供贷款和机器设备，帮助我国建设了156个大型项目，这些项目对新中国奠定工业发展的基础起了重要作用。1950年4月，中苏两国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双方还签订了科学技术以及其他领域的若干合作协议。与此同时，我国还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周边友好国家开展经济贸易交流与合作。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方面取得的首批成果。

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建国以后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主要经验的著作《论十大关系》中，就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和发展对外经济交流问题作了深刻、系统的论述。

他指出：“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生存？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了，一点缺点都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他还指出，任何时候都不能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如果只说一点不说两点，就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此，要放下架子，拿出勇气，敢于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

他还指出，即使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

周恩来同志多次阐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对外经济交流的思想。1956年9月，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强调说：“即使我们在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之后，也不可能设想，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了。事实表明：不仅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技术协作范围将不断地扩大，而且由于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的力量日益强大，国际局势日益趋于和缓，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错误的。”

这些论述，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对外开放、开

展对外经济交流的思想，它构成了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表明了从新中国成立起，我们党和国家就把对外开放、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作为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政策。应该讲，正是在毛泽东同志开展对外经济交流思想的指导下，我国人民通过自身的艰苦奋斗，并尽可能吸取、借鉴国外的经验，引进必要的技术设备，我国的工业基础才得以比较快地建立起来，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事业才得以发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正确思想，未能得到持续、一贯的执行和贯彻。特别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交流受到极大的干扰和破坏。对此，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那时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

二、确立了我国发展对外经济交流的基本原则

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既主张开展同国外进行经济技术交流，又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在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相辅相成的。

第一，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正确处理学习外国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

针对我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实际，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应当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落后的面貌，而依靠别人搞建设是靠不住的。从毛泽东同志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不仅在受到国外的封锁、压力的情况下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在外部环境改善、有外援、有进行

对外交流的条件时也应如此。

联系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正是由于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坚持原则，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下立场坚定，不怕压、不信邪，反对别国以种种形式干涉我国的经济事务，才得以站稳脚跟，按照我国的基本方针政策，比较好地处理同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关系，维护我国的经济主权。像近年来同美国进行保护知识产权谈判、市场准入谈判以及磋商禁止劳改产品出口问题，我们都坚持了这个原则。可以说，坚持独立自主是促进平等协商、并最终达成协议的一个重要条件。在当前加快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强调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仍然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对外开放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需要，对外开放的扩大将进一步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维护经济主权的能力和基础；另一方面，我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了，又将对国外工商界产生更大的吸引力。这些年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外商来华投资蓬勃发展都印证了这个道理。

第二，毛泽东同志主张发展对外经济交流要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

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把“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列为一项基本政策。后来他又指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从建国以来我国整个对外工作来看，无论是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政治关系，还是发展经济贸易合作关系，我们都始终比较好地坚持了这一基本原则。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随着平等互利被纳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广泛传播，它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赞同、所普遍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

我们说，在国际经济贸易交往中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就是

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平等相待，开展互利、互惠的合作；在当今国际间经济交往日益密切的形势下，尤其要强调在合作中的各方权利与义务平衡，按照国际经济规范和惯例办事。

第三，毛泽东同志强调在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中要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需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一切照搬，短处、缺点当然就不能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我们感到，在实行对外开放，大力开展对外经济交流的形势下，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原则处理好学习和抵制的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成为指导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保持清醒头脑、把握对外经贸业务工作正确方向的科学指针。

另外，毛泽东同志还特别强调在进行对外经济交流及其他方面的对外交往中，要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应当求同存异，等等。这些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观点以及在其指导下形成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方法，对我们做好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三、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提出了崭新的对外援助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爱国主义和

国际主义相结合，是我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我国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历史上有过相似的遭遇，当今又面临着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本国经济的共同任务。我国有责任、有义务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向它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早在 50 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和 6 亿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60 年代初，他再次强调：“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成为我国对外援助工作的指导思想。

我国政府和人民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始终坚持国际主义，向经济困难的第三世界友好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指导原则。这集中体现在周恩来同志依照毛泽东同志确立的指导思想而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之中。八项原则的内容是：1. 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2. 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3. 中国政府以无息和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4. 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5. 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6. 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7. 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

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8. 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这八项原则是我国对外援助工作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我国对外政策在援外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八项原则既明确地阐述了我国对外援助的性质和宗旨,又规定了援外工作所遵循的具体政策。在八项原则指导下,我国对外援助的实践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创立了真诚合作的典范,博得了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赞扬与高度评价。八项原则宣布以来,尽管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对外援助工作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它所体现的基本精神依然光辉夺目。

40多年来,我国政府和人民在自身建设任务相当繁重,财力、物力比较紧张的状况下,竭尽可能,动员一部分力量,支援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和新独立国家维护民族独立、抗击外来侵略的正义斗争,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了一大批国计民生所迫切需要的项目。截止1992年底,接受我国经济技术援助的国家共110个。在援款项下,建成各类成套项目1378个。累计派出援外工程技术人员50万人次,还向几十个国家派遣了医疗队。总起来看,大多数项目的效果是好的,受到了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欢迎,有不少项目还成为这些国家在发展民族经济中引以为自豪的成就。

历史表明,做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对于增进我国人民同受援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加强我国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推动我国对外关系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实行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日益发展,交往渠道不断拓宽。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仍然要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认真做好对外援助工作。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就指出:“应当肯定我们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我们国家经济困难,

但是我们还得拿出必要数量的援外资金，从战略上讲，我们真正发展起来了，要用相当数量来援助，中国发展以后不要忘记这一点。在援助问题上，方针要坚持，基本上援助的原则还是那个八条（指援外八项原则），具体办法要修改，真正使受援国得到益处。”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论断，为我国新时期的对外援助工作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正是按照小平同志的思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多年来，我们在继续向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的同时，对援外工作管理体制和援助方式进行了重大改革，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援助方式，将援外工作与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及其他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结合起来，根据“大经贸”的发展思路，逐步走出一条新的援外道路。

40 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15 年来，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事业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额由建国初期 1950 年的 11.35 亿美元增长到 1992 年的 1656 亿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由当年无足轻重的地位上升到 1992 年占世界第 11 位；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内容由比较单纯的商品进出口和技术引进发展到包括商品、技术、资金、劳务交流等各个领域，开始形成各类业务相互渗透、密切结合的“大经贸”格局。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社会主义中国一日千里、蓬勃向上的新风貌。

抚今追昔，缅怀毛泽东同志的对外经济交流思想和光辉业绩，令我们追思不已，感慨万端。在加速改革开放，向着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宏伟目标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学习、继承毛泽东同志的光辉思想，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贯彻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扎实工作，开拓进取，把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对外经济贸易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毛泽东和中外文化交流

(1993年12月7日)

陈 昌 本

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文化宣传工作，建国后把它作为我国整体对外工作和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中外文化关系问题进行理论阐述，并率先垂范，对来访的许多外国文化艺术界人士亲自做工作，会见、谈话、观看演出；对出访的文化团组，规定活动方针，给予指示。几十年来，在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在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具体领导下，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文化宣传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方针政策和行之有效的交流渠道、方式方法。这是毛泽东和老一辈革命家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回顾他在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文化宣传工作方面的实践活动和理论创造，对推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执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搞好对外文化交流，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长期、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从革命根据地被分割、被封锁、与外界失去联系的历史条件出发，寻找和利用一切机会和方式，开展对外文化宣传工作。通过来访的外国记者向世界披露我党我军和根据地情况，成为当时一种重要渠道。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在陕北根据地的保安镇，毛泽东同志对冒险潜入苏区的年轻的美国记者埃·斯诺，给予破格接待。自此，造访革命圣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中外记者、友好人士络绎不绝，接见国际友人成为我党政军领导人宣布政见的重要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国际威望提高，建交国家俱增，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走向世界”的重大举措，中外文化交流被纳入总体外交轨道，使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迅速起步，逐步开展，为发展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增进相互了解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外交思想，新中国与社会主义各国建立并发展文化关系，形成了对外文化交流的第一个高潮。

为建立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联系，还在建国前夕，中国青年文工团即奔赴匈牙利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揭开了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序幕。以后又连续6次参加，并赴苏联、东欧各国巡回演出。毛泽东同志在接见首次出访的青年文工团成员时，规定了出访的三条要求，即“宣传”（宣传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友谊”（加强和各国青年的

友谊)、“学习”(向苏联学习)。后来周恩来总理又提出“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寻求知识”的出访方针。“一宣传、三寻求”遂成为我国出访文化艺术团组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指引我国对外文化工作在健康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开国第一年即实现中苏互换文化代表团、艺术团和合拍影片，与东欧和朝越蒙各国互办或举办展览、电影周，文化代表团和专家互访，交换图书资料。毛主席、周总理访苏时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首次以条法形式肯定发展和巩固双边文化联系。50年代内，我国相继同12个社会主义国家签订文化合作协定和年度执行计划。建国10年，我国同社会主义各国互换文化代表团组共1700多起，17400余人次。表演艺术团组互访频繁，规模大、人数多（不乏百人以上大团）、品种多样，名团、名演员、名节目相继出现在文艺舞台。大量互换留学生，翻译出版对方书籍，发行、放映对方影片。我国文艺舞台引进、移植并发展芭蕾舞、交响乐、马戏等艺术品种，呈现五彩缤纷、百花争艳的景象。

(二)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外交思想，我国一贯重视与周边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的文化交流。从搞好睦邻关系出发，较早地与亚洲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与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建立和发展了文化友好关系。

50年代初，在我国第一次建交高潮中，便同邻近的亚洲民族主义国家建交。发展同这些国家的文化关系是新中国对外文化工作另一个重点。我国同印度、缅甸于1951至1952年互换文化代表团，1953至1954年互换艺术团，开创了我国同南亚、东南亚各国文化交流的新篇章。1951年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缅时，毛主席、周总理规定“讲学术、交朋友、细水长流”和建立中国同亚洲邻国文化界互相往来关系的出访方针，保证首次出访获得圆满成功。对来访的缅甸政府文化代表团，毛主席亲自做工作，为

他们举行茶会。在印度文化代表团访华时，周总理亲自主持印度艺术展开幕式。毛主席接见亚洲邻国的文化代表团、艺术团共 14 次。中国同亚洲邻国的文化交流出现繁花似锦的局面。

对“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毛主席给予特殊关注，很早就确定对反动统治集团和日本人民区别对待、寄希望于人民、以民促官的原则。建国初期，北京即举办日本民主运动图片和进步书籍展览会。1952 年中国文联致函日本“‘七·七’15 周年纪念文化人恳谈会”表示中日文化交流的愿望，支持日本参加亚太地区和平会议。1955 年日本歌舞伎剧团访华，毛主席出席观看，翌年梅兰芳率中国京剧团访日，揭开了中日文化交流新篇章。1955 年日本前首相片山哲和中国对外文协签订中日民间文化协定，次年日本成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自此大批中日民间文化友好人士和艺术团互访，并互办艺术展。毛主席还出席观看了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在北京的演出。诚如周总理所说：“国民外交是人民之间友好的开路先锋”，在日本兴起的“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运动，促使日本政府终于在 1972 年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

充分发挥文化交流独有的先行作用。万隆会议《关于加强亚洲国家文化合作和促进亚洲各国文化交流的决议》为我国与亚非拉各地区文化交流开拓了广阔道路。如果说建国初期文化交流是伴随建交而开展，这一时期则是文化交流“打头排”（陈毅语），文化先行，以文会友，增进了解，水到渠成，达成建交。在西亚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埃及率先与我国建交并签订文化协定，1956 年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首访西亚北非 4 国和埃塞俄比亚，次年中国杂技团赴北非和加纳访演，拉开了中国与西亚和非洲大陆文化交流的序幕，为大批西亚、非洲新独立国家与我建交作了舆论准备。在拉丁美洲，1953 年即派出中国代表团参加在智利召开的第一届美洲大陆文化会议，1956 年中国艺术团首访南美 4 国，

聂鲁达、亚马多、万徒勒里等知名人士和艺术团相继访华。中国与拉美地区的文化往来一直是可观的。在长达 20 年的过程中，这种民间的文化往来为在条件成熟时实现建交，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1971 年联合国以压倒多数票恢复我国合法席位后，再次出现建交高潮，把文化交流推向新的阶段。

值得提及的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决策和关怀下，我国承担了为坦桑尼亚、苏丹、肯尼亚和加纳等非洲国家培训杂技演员，扶植建立杂技团，使植根于华夏大地的杂技艺术在辽阔的非洲大陆安家落户，这是中非文化交流的又一成果。1968 年毛主席、周总理陪同来访的尼雷尔总统观看坦桑杂技学员汇报演出，上台与小演员逐一握手，合影留念。

（三）毛泽东同志力主扩大中西文化交流，推动了我国同欧洲、北美、大洋洲文化交流的进程。

1951 年中国艺术团首访奥地利，翌年中国杂技团出访北欧 3 国，1955 年中国两个大型艺术团出访尚未建交的英、法、意等欧洲大国和其他国家。随后又派民间文化代表团和多品种艺术团遍访欧洲大陆，发挥了文化交流在对外工作中先行作用。许多国家建立了对华友好组织，派遣文化代表团和艺术团来华。中国的《百年画展》、《齐白石画展》、《艺术展》、《工艺美术展》在英、意、德展出，中国影片打入戛纳和爱丁堡电影节，中法合拍电影《风筝》，英、法、瑞典的芭蕾舞和法国的杂技来华访演，达·芬奇、伦勃朗、杜末埃、贝加斯克斯的纪念展览会和麦绥莱勒版画、英国水彩画展览在京举办，都是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的内容。

1956 年毛主席会见德国作家根·魏森堡时说：在中国，人们不仅知道德国的哲学家，而且也知道德国的作家。他力主扩大中西文化交流，说：一切作家都可以来，左派作家、右派作家、中间派作家，甚至反对中国的人也可以来，让大家来亲眼看看。

对于加澳新地区，1959 年我国接待了加拿大第一个访华文化代表团。次年中国 101 人艺术团访加，引起轰动。毛主席接见多伦多大学校长一行。白求恩亲属多次组团来华访问。1955 年中国艺术团访澳新，澳新文化代表团、艺术团和新西兰毛利族艺术团相继来华。毛主席接见新西兰著名诗人梅逊，接受毛利族人民敬献的精美民族服装。

根据毛主席“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的教导，在美国敌视中国的年代，中国多方采取主动，力求敲开中美文化联系的大门。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决策和领导下，推出了“打开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周总理语）的著名“乒乓外交”，促成尼克松总统 1972 年访华，《上海公报》问世，中美僵局终被打开。费城交响乐团和沈阳杂技团以及其他文化人士、艺术团实现了互访、互演。

（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同志的关怀下，我国充分利用多边国际文化活动和国际比赛，了解和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

最早把中国艺术推向国际舞台，是建国前夕首次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后又连续参加卡洛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莫斯科电影节以及肖邦、舒曼、李斯特、乔·埃乃斯库、柴可夫斯基和日内瓦、比利时国际音乐（或钢琴）比赛，并于 50 年代中期打入戛纳、爱丁堡、威尼斯、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以及亚洲电影节、亚非电影节。

1952 年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国际会议，作出《关于扩大文化交流决议》。自 1956 年始，我国连续参加在新德里、塔什干、开罗、巴厘（印尼）和北京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或紧急会议。1964 年主持召开北京科学讨论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根据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建议和安排，我国从 1952 年纪念四大名人活动始，到 1963 年共举行纪念世界文化名人 66 人，其他文化名人 26 人次，把遍及五大洲包括文学、艺术、教育、新闻、科

学、医学、美术各领域古今文化名人介绍给中国人民，他们中有阿里斯托芬、拉伯雷、席勒、海涅、安徒生、易卜生、果戈里、契可夫、托尔斯泰、马克·吐温、欧·亨利、朗费罗、泰戈尔等文学巨擘、戏剧大师，哥尔多尼、亨德尔、莫扎特、舒曼、李斯特等音乐鼻祖，伦勃朗、葛饰北斋等画坛大师。

二

在夺取全国政权的年代，毛泽东同志在致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创造中，在革命文艺理论和政策的创立过程中，对中外文化关系总是予以特别的重视和关注，在他的许多论著和讲话中，对有关问题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解答。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方面做出的伟大贡献，是不可泯灭的。今天我们重温这些重要论述，备感亲切。

这要首推发表在40年代第一春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这部系统论述革命文化的纲领性文献中，毛泽东同志第一次精辟地阐明了中外文化关系，规定了中外文化交流的目的和方针。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中国应该建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时，提出中外文化应该建立互相吸收的关系，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互相吸收”，是中外文化关系的总原则、总方针。为互相吸收，则应通过互相交流的渠道。吸收的目的，是发展新文化。

毛泽东进而指出，吸收并非兼收并蓄，而是批判地吸收。他说：“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并形象地描绘：“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

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鉴于五四以来的历史教训，明确提出反对和防止“全盘西化”和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文化的错误倾向。

关于吸收外国文化的范围，毛泽东指出：“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这里实际上已经孕育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树立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性。他以中国具有几千年灿烂的古代文化为自豪，坚决摒弃一切否定传统、妄自菲薄、崇洋媚外、臣服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文化裙下的奴才思想。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完整、系统地阐述和规定了党的文艺政策和纲领，开辟了中国革命文艺工作的新纪元。毛泽东同志发挥《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批判继承和吸收文化遗产的思想，指出：“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与延安整风运动同步进行的文艺界批判教条主义的运动，端正了文艺工作的方向，克服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滋长的盲目硬搬外国文化艺术的倾向。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

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获决定性胜利，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起步。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我国面临着是按苏联模式继续走下去，还是另辟新径走自己的路的重大选择关头，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问世，“中国和外国关系”被列为十大关系之一，文化关系是中外关系的一部分。毛泽东同志重申：“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他特别强调“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

如果说《论十大关系》提出的是学习外国的问题，那么时隔4个月，毛泽东同志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则进一步发挥这一思想，系统、全面地阐述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外文化关系面临的新问题，这是继《新民主主义论》之后，毛泽东同志对中外文化关系理论的重要建树和重大贡献。毛泽东同志针对新时期出现的一部分人照抄搬用外国，另一部分人拒绝借鉴外国的两种错误倾向，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说明中外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的客观必然性，阐明学习外国的正确态度。他指出古代中国史上中外文化就是相互吸收、互相补充、共同发展的，以音乐为例，“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中国音乐。”他告诫我们：“演些外国音乐，不要害怕。”“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失了”，“而是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够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

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分析学习外国与继承传统这个在文艺工作者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指出，一方面要坚持不渝地学习外国。近代文化，外国确实高于中国；艺术上，中国在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却比中国高明，如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

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另一方面要坚持学习外国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发扬和创造自己的文化。学习外国，只是学习其长处，整理中国的，创造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东西，他特别强调民族形式、民族风格、特殊风格，要敢于标新立异，善于独树一帜，以实现中国文化的跃进。他说：“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阐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称这个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从40年代和50年代初逐渐形成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到50年代中期提出双百方针，一直到60年代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毛泽东同志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文化建设和中外文化交流，五六十年代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事业蓬勃发展，是贯彻执行这些方针的结果。

邓小平同志对对外文化工作也给予了很大关注。早在50年代他担任副总理、党的总书记时，就经常会见来访的文化界的外宾，观看来访的外国艺术团体的演出，指导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新时期以来，邓小平同志又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思想，严厉批判丧失人格、丧失国格、丧失民族自尊心的可耻行径。他多次指示必须正确地学习外国，说：“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邓小平同志去年在南巡讲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针对改革开放大潮中滋生的错误倾向，他指出：“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

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在如何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上，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邓小平同志上述重要论述，是毛泽东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的重大发展，对于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对于进一步开创对外文化交流新局面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和战略的指导意义。

回顾既往，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由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开创的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事业，定能健康发展，阔步前进。

毛泽东的民间外交思想和重要决策

韩 叙

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纪念日之际，外交部组织召开毛泽东外交思想研讨会，藉以隆重纪念新中国的缔造者、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这对于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向研讨会致以热烈的祝贺。

毛泽东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也是新中国外交的最高领导者和决策者，他的外交思想和战略策略丰富多采。在长达数十年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一向身体力行，广交朋友，珍视与发展同国际友人之间的友谊。新中国诞生前后，毛泽东将他的国际活动的实践经验不断归纳和发展，形成了系统的人民外交思想，并且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为新中国民间外交的蓬勃开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想在此就毛主席的民间外交思想和重大决策这一专题作一初步探讨。

毛泽东民间外交思想的哲学基础和历史传统

从本世纪20年代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地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武装斗争。这场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早在1934年初，毛泽东就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观为哲学基础，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著名论断。他认为，要想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唤起民众”。这个民众不仅包括几亿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而且也包括国际上一切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国际友人。在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又强调指出，国际统一战线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必要条件。因此，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就十分重视国际友人的作用，并且亲自做交朋友的工作。

1936年，工农红军历经艰辛，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不顾国民党的层层阻挠和封锁，冒着生命危险，赴陕北苏区采访。在历时4个月的采访过程中，毛主席多次与斯诺促膝长谈，并且把红军的许多高级将领和普通士兵介绍与其相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精辟见解，中国工农红军和苏区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赢得了斯诺先生的崇高敬意。他撰写了《红星照耀中国》的长篇报导。这是一部震撼世界的名作。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后，仅在第一年就连续再版5次，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之一。国内外许多青年读后，走上了革命道路，誓作旧世界的叛逆者。毛泽东曾经向干部推荐这是一部真实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斯诺也多次向友人

谈到他“在红色苏区找到了真正的东方魅力”。“同这些英勇的男女们生活在一起，并暂时同他们等同起来，这是我的殊荣。”他还写道，在这些老资格的“赤匪”中，有许多位，是他在中国10年以来所见过的最优秀的男女。

毛泽东与著名的加拿大胸外科专家白求恩的友谊，是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做好国际友人工作的一个光辉范例。1938年1月，白求恩率领一支医疗队，穿洋渡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3月底，白求恩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在窑洞里接见了，亲切交谈了3个多小时。不久以后，白求恩东渡黄河，前往晋察冀边区。毛泽东对他的工作和生活非常关心，并电告聂荣臻司令员予以照顾，同意“白求恩任军区卫生部顾问，对其意见和能力完全信任”。1939年11月，白求恩大夫不幸因公殉职。毛主席闻讯后非常悲痛。延安各界为白求恩举行了隆重追悼会，毛主席亲自出席，并书写挽联。12月21日，毛泽东写了《纪念白求恩》这篇光辉著作，对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作了高度评价。延安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成为首家以国际友人的名字命名的医院。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大举进攻延安。在形势很险恶的情况下，毛主席仍然从容不迫地接待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就是毛主席在与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的，他说“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在戎马倥偬、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里，毛主席在延安接待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外国记者和来宾。尽管美国政府从其自身利益出发，扶蒋反共，但毛主席始终注意把美国政府和一般工作人员区别开来。他以诚待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像

谢伟思这样的美国政府工作人员也为之感佩。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视做好国际友人工作的大量实践活动，使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和同情，团结了像史沫特莱、斯诺、海伦·斯诺、斯特朗、罗生特、艾黎、马海德等一大批真诚的朋友。他们与中国人民患难与共，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并为之贡献了毕生的心血。有些国际友人，如白求恩、柯棣华、希伯等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新中国诞生的曙光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

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诞生之前所从事的大量国际友好的实践活动，形成了新中国的民间外交事业的优良历史传统，同时，也为新中国的人民外交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国初期的民间外交及其重大决策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中国的诞生，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外交史。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中国的外交从此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篇章。

建国初期，我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巩固革命胜利成果，站稳脚跟，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影响，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为我国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

然而，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仍然是相当严峻的。美国政府

对新中国奉行敌视政策，继续支持国民党当局，在国际上阻挠一些国家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朝鲜战争爆发后，它又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同时，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在军事上从朝鲜、台湾、印度支那等方面对我国实行包围，在经济贸易方面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企图扼杀新中国。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毛主席、党中央毅然作出了向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倒的外交决策。

到 1950 年 10 月止，与我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 18 个。按时间顺序排列，它们分别是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瑞典、丹麦、缅甸、瑞士、列支敦士登、芬兰。此外，还有英国、挪威和荷兰在与中国举行建交谈判。西欧、南欧的大多数国家均与新中国处于未建交状态。非洲、北美、拉丁美洲则是同我国极少往来的空白地区。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巩固政权，争取更多的国家和人民认识并了解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争取国际的持久和平，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成为新中国外交的迫切任务。

由于建国初期与我国正式建交的国家数量不多，政府的官方外交活动区域相对狭小，因此，民间外交的作用及其重要性显得相当突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外交形式。正如周恩来总理后来阐述的那样：“中国的外交是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间的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新中国的外交立足于人民，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针是“民间先行、以民促官”。

为此，毛主席、党中央在建国初期为民间外交工作的蓬勃开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常设机构

1949年10月2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二天，经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批准，中国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族和海外华侨代表以及来自意大利、苏联、朝鲜等国家的朋友共1000多人，在首都北京举行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林伯渠同志致开幕词，朱德等同志发表讲话。出席大会的有宋庆龄、何香凝、李德全、许德珩、徐特立、陈毅、薄一波、黄克诚、张云逸等德高望重的革命家，还有郭沫若、沈雁冰、马寅初、夏衍、梅兰芳、许广平、陈嘉庚、邵力子、周建人和戎冠秀等100多名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和劳动英雄。林伯渠在开幕词中指出：“在北京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是一件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它向全世界表明了我们这个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是坚决拥护世界和平，坚决反对侵略战争的”。他接着说：“大家应该记得，毛主席在他有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历史文献中告诉我们，‘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各国人民共同奋斗，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民主国家及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我们今天举行这个大会，就是在拥护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指示之下，对于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决议的热诚响应。”

这次大会决定成立以郭沫若为主席的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常设机构，简称“和大”。在“和大”成立初期的3年内，我国派遣代表团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和平理事会、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以及派往德国、奥地利参加反细菌战展览会和国际科学委员会，共计27次2096人。接待了来自54个国家的外宾共计1041人到我国参观访问。“和大”通过广泛的国际交往活动，有力

地扩大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在世界各地结交了许多有名望、有重要影响的人士。如英国的约翰逊教长、费尔顿夫人，法国的法奇、柏蒂将军，加拿大的文幼章，墨西哥前总统卡德纳斯将军，智利诗人聂鲁达，巴西作家阿马多，古巴诗人纪廉，日本的西园寺公一、松本治一郎、高良富和帆足计等人，印度的森德拉尔（后任印中友协主席）和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等等。这些著名人士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成为向世界人民宣传和介绍新中国的先驱者，有些人士还成为所在国家对华友好组织的发起人。

成立中苏友协、中缅友协和中印友协等 对口友好组织

1949年7月14日，宋庆龄从上海致电周恩来、郭沫若，同意领衔发起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同年10月，正式成立以刘少奇为会长，宋庆龄、吴玉章、沈钧儒、李济深、张澜、黄炎培等7人为副会长的中苏友好协会。1954年，中苏友协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宋庆龄为会长，沈雁冰、李四光、马寅初等知名学者、科学家当选为副会长。中苏友协是我国民间外交体系中最早成立的第一个对口友协，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继中苏友协成立后，1952年5月，又成立了以郑振铎为会长的中缅友好协会和丁西林为会长的中印友好协会。1960年3月，成立了以楚图南为会长的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同年4月，在北京隆重成立了中国—非洲友好协会，迎来了中非关系蓬勃发展的新时期。1963年成立了中日友好协会，使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发展到半官半民的阶段。到60年代中期，各种对口友协已经发展到20多个，成为连接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一座座重要桥梁。

成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

1949年12月，经周恩来总理提议，成立了以张奚若为会长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亲自担任该会名誉会长。外交学会成立后，积极开展与各国半官方人士，如国会议员、政党领袖以及退休的高级党政领导人士的友好交往，成为我国与世界各国政界人士进行民间友好交往的一条重要渠道。

成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1952年5月，成立了以南汉宸同志为会长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贸促会的成立，为我国同一些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开展民间贸易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有效地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封锁。

成立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

1954年5月，成立了以楚图南同志为会长的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即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前身。对外文协成立后，大力开展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派出各种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艺术团体往访于世界各地，展示了新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足迹遍及欧洲和亚非拉美各国。随着对外文协的国际交往面的不断扩大，其工作面亦随之拓展，1966年改名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文革”期间，民间外交受到严重干扰，对外文协的工作曾一度陷于停顿。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对外文协于1969年恢复活动，并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

会。1972年5月，“和大”与对外友协合并，大大地扩展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工作范畴。成为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一条重要纽带。

以上民间外交团体成立后，邀请和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艺术、教育、科技、体育和宗教等方面的人士到我国访问，并派遣各种代表团往访，加上大力开展民间商业贸易活动，使新中国的民间外交从起步阶段就具有了和平与建设并行发展，文化交流与经济交流两翼齐飞的鲜明特色。

在开展民间外交和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毛主席、周总理很注意行业和专业对口，“兵对兵，将对将，各行各业要通畅”，以加强交流效果。我国的工会、青联、学联和妇联等群众团体贯彻执行了这一指导思想，在多渠道、多领域开展民间外交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为建立和发展新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友谊、团结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下，在建国初期的短短5年时间里，新中国就完成了官方、半官方和民间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战略部署。由于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积极参与和广泛支持，使新中国的外交事业拥有了雄厚的群众基础，从而从根本上结束了100多年来使每个中国人都感到痛心的旧中国屈辱外交的历史，开创了中国外交的崭新时代。新中国的民间外交战线出现了一个群星灿烂、交映生辉的新局面。

民间外交的空前盛况

毛主席、党中央十分关心和重视民间外交的组织建设。在50年代，党中央还成立了以周恩来、王稼祥等同志领导的国际活动

指导委员会，以便统一领导、指导和协调各民间外交团体之间的对外友好交往活动。尤其在人员的配备方面，给予民间外交团体大力支持。一些重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甚至亲自担任民间外交团体的荣誉职务。一大批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知名人士、艺术家、社会贤达都纷纷参与民间外交工作，贡献了他们的知识和力量，功勋卓著，成就斐然。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更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们以各种方式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用实际行动促进了新中国民间外交事业的蓬勃开展。

新中国成立时，杰出的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已年近九旬。他不顾耄耋之年，以极大的创作热情投身于保卫新中国的和平事业。1952年，白石先生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创作了巨幅国画《百花与和平》。1955年，他又以95岁高龄与我国13位著名画家共同创作了巨幅彩墨画《和平颂》，将此作为给世界和平大会的献礼。他的这些传世名作受到各国艺术界的高度重视。1955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常务会议，一致决定将1955年国际和平奖金（500万法国法郎）和1枚金质奖章授予齐白石先生。齐白石先生获奖，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约里奥—居里先生和世界各国朋友纷纷发来贺电，“对大师雄伟劲健而富有青春气息的作品，以及他热烈争取和平的活动，表示钦佩。”“和大”主席郭沫若在授奖仪式上致辞：“这奖金的授予，不仅是齐白石先生的个人荣誉，也是我国艺术界和我国人民的光荣。”

新中国以保卫和平为宗旨的人民外交的另外两个大型活动，是举行全民性的和平签名运动和要求五大国签订和平公约的签名运动。以和平签名运动为例：1950年，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要求禁止原子战争的呼吁书开展签名活动。从5月1日开始到同年11月16日，即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华沙开幕这一天为止，全国各地参加签名的人数共计

223739545 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47%。参加签名的人包括了全国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阶层和各种不同信仰、不同职业的人民。这种盛况空前的签名运动，表明全中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党中央周围，保卫新中国，反对侵略战争，拥护世界和平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在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和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和平造成严重威胁、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形势下，由宋庆龄、郭沫若等著名社会活动家倡议和发起，于 1952 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37 个国家和 9 个国际组织的 400 多名代表前来出席会议，其中不少代表，特别是美国、日本以及一些拉美国家的代表是冲破重重阻力才来到北京的，这次由“和大”等民间外交团体举办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从始至终得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和有力支持。对于打破封锁，使世界各国人民了解新中国的现实，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新中国的民间外交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50 年代，拉丁美洲共有 20 个独立国家，同我国都没有外交关系。为了改变中国人民与拉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隔离状况，毛主席、周总理提出了“细水长流，稳步前进”的民间外交方针。仅建国后的头 10 年里，我国就邀请了 19 个拉美国家的 1000 多人上来我国访问，其中包括作家、教授、医生、律师、艺术家、企业家、国会议员以及工会、妇女等各界知名人士。

1953 年，李一氓同志率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智利。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访问拉美的代表团。1956 年，楚图南同志率中国民间艺术团出访乌拉圭、阿根廷、智利、巴西 4 国。这个艺术团集中了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云燕铭等我国久负盛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和我国中央歌舞团的第一流舞蹈演员。这种大规模的艺术代表团在拉美演出，在中拉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获得了巨大

成功。在这次访问途中，有 10 位同志不幸牺牲。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以这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在拉美人民心中播下了友谊的种子。50 年代的人民外交及民间的频繁交往，为我国同拉美国家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节节胜利，使中非关系进入了一个历史新纪元。新中国在建国伊始，就把支持非洲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斗争、增进中非人民的友好、团结、合作关系，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据不完全统计，从 1949 年至 1960 年，非洲 41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0 多位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的领导人、爱国知识分子及工会、青年、学生、妇女组织的代表和各界人士到我国访问。毛主席、周总理经常会见他们，进行亲切深入的谈话。1960 年 4 月，由我国 17 个全国性人民团体发起，有 20 个全国性人民团体作为会员团体和各界人士参加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在北京隆重成立。1961 年春夏，刘长胜会长率领中非人民友好协会代表团出访西非 8 国。这是新中国向非洲派出的第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的国家最多，历时最长。在这段时期，另一支活跃的力量是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它为声援非洲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作了大量工作。随着非洲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中非人民友好之树也不断茁壮成长，根深叶茂。中非人民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领域开展了多方面的合作。成千上万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专家受中国政府和人民派遣，在非洲大地上同非洲兄弟一起，同心协力，建设有益于非洲人民的合作项目。同时，非洲人民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持的原则立场也一贯给予宝贵的支持。这种支持，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东方的面貌。作为领导并实现这一变革的领袖毛泽东，不仅得到全中国人民的热爱和敬仰，而且也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崇敬和爱戴。他的威望，有如日月中天。因此，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希望能够见到他，聆听他的教诲。对于外国朋友的期冀与希望，毛主席总是尽力予以满足。他在繁忙的国务活动中，经常接见远道而来的宾客，体现了他对民间友好工作的高度重视。毛主席在一次接见拉丁美洲 8 个国家的朋友时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因此，需要时间，需要和平，需要朋友。”他还说：“人民是决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必能战胜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取得世界的持久和平。”

毛主席不仅经常会见远道而来的各国朋友，而且还多次出席我国民间对外友好团体举办的盛大群众集会，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国际问题的重要声明，如《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和《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等等。毛主席出席并在大型群众集会上发表声明，体现了他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体现了领袖与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共同心声，强有力地支持和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正义斗争，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毛主席的这些重要谈话和声明，为新中国开展民间外交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政策依据。毛主席关于开展民间外交的思想通过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杰出外交实践得到最完美的体现。从整体上看，新中国人民外交的形成和发展，是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陈毅、郭沫若、廖承志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

的光辉结晶。正因为如此，我国的民间外交事业经久不衰，为国际外交界和学术界所公认，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成功范例

我国的民间外交工作，从根本上说，是紧密围绕着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外交总方针、总战略展开的，也就是说，民间外交为政府的官方外交服务。在贯彻党的外交方针方面，民间外交有很强的针对性；在贯彻落实党的外交总战略方面，民间外交具有很高的原则性和政策性；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民间外交与政府的官方外交有很强的互补性。再则，民间外交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对外交往中又具有多国别、多层次、亦官亦民、能上能下、机动灵活、形式多样等方面的特点。其最终目的是，对已建交的国家而言，能使政府之间的官方外交建立在牢固的民众基础之上；对未建交的国家而言，则能通过人民之间的频繁交往，为正式建交创造必要的条件，从而使双边关系走上全面正常化的轨道。这一点，在对日工作中表现尤为突出。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承认台湾，敌视中国，中日之间无法进行正常交往。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党和政府根据日本战后亟图发展对外贸易的需求，积极鼓励双方开展民间贸易活动，以推动中日双边关系尽快向正常化的方向发展。

1956年，毛主席亲自接见来华举办日本工业展览会的日本朋友，向他们明确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正常交往的意见。毛主席说：“你们的展览办得很好，希望以后能加强经济友好往来，政府间不好往来，还有别的渠道，还可以加强民

间往来嘛。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日本民族也是个伟大的民族，我们两国人民应该团结互助。我们欢迎你们多来，多交往。”虽然当时的日本政府采取了错误的对华政策，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进程遭受极大困难，但是，中日民间贸易这一渠道并没有堵塞，还是细水长流，日积月累。与此同时，双方的许多人民团体，包括一些党派先后建立关系。日本民间人士访华人数常常居各国来宾之首。经过长达 20 多年的努力，两国政府终于在 1972 年 9 月实现了中日邦交的全面正常化，创造了国际交往中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成功范例。

70 年代初，在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我国对美国开展以民间为先导的乒乓外交，使小球推动大球，给当时国际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乒乓外交的成功，体现了我国民间外交的机动灵活、形式多样的特点，在我国外交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开展友好城市工作，是毛主席、周总理在我国民间外交方面的又一重大决策。1973 年 2 月 22 日，对外友协和中日友协经与国内有关部门研究协商，起草了关于与日本建立友好城市问题的请求。上报中央后，毛主席、周总理决定同意批发。同年 6 月和 11 月，天津市与神户市、上海市与横滨市先后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值得指出的是，周总理对国际上通用的姊妹城市这一名称作了修改，他指出：姊妹有大有小，而友好城市则是平等的。这一更改，体现了我国人民外交工作中重友谊、讲平等的原则，得到各方的赞成。从此，由周总理改定的友好城市的称呼，在我国开展同世界各国的省、州、市的友好交往中得到广泛采用。

友好城市工作，作为我国民间外交的一个新的重要领域，经过 70 年代的实践阶段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得到迅速发展。截止 1992 年底，我国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126 个城市同 56 个国家的 133 个省、州、县、大区和 319 个城市建立了 456 对友好

城市关系。此外，还有 86 对已获批准，待正式签署结好协议书，成为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与国外开展半官方的、以及民间交往的一个主要渠道。

实践证明，友好城市工作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在起步阶段就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关怀。长期以来，又得到各地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其中一条最根本的原因是友好城市关系本身具有政治影响和经济效益两方面的综合优势。这种优势，在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得到了充分体现和发挥。

友好城市关系的建立，有效地促进了双方的地方政府之间、团体之间以及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体育界之间的友好交往，促进了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不少城市已经出现了多层次的友好网络，并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对华友好关系。在经济领域，友城工作有效地推动了互利互惠的经济贸易活动，促进了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加强了科技合作和人才交流，它对于我国的四化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饮水思源，我国的民间外交事业从建国初期的规模逐步扩大到友好城市领域，使我们深深体会到毛主席、周总理关于建立友好城市的决策是我国民间外交史上影响深远、具有远见卓识的一项重大决策。

实践证明，民间外交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对民间外交领域的杰出贡献，远远超出了外交的范畴，它不仅对促进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以及新中国外交格局的形成，而且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的民间外交思想和实践，将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载入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史册。

现在，我国人民正按照邓小平同志的宏伟设计，在江泽民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新的形势，要求我们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的人民外交思想，要求我们在这个世纪之交、国际关系的新旧格局转换时期，努力工作，进而为我国的四化大业做出新的贡献。新的形势，也为我国民间外交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目前，我会同世界 90 多个国家的 100 多个对华友好团体保持、建立并发展着友好联系，并先后同 150 多个国家开展了民间友好活动。不久前又新成立了中埃（及）、中叙、中德、中韩、中马（来西亚）、中孟（加拉）等友协。恢复了中老、中越、中巴、中印 4 个对口友协的活动。我会同海湾诸国、以色列、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交往渠道也正在形成之中。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精神鼓舞下，我国的民间外交事业也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 的外交战略思想

姚 仲 明

毛泽东主席在建国初期的外交战略，我根据自己肤浅的学习和有限的体验，认为有几大标志：一曰“另起炉灶”，二曰“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曰“一边倒”，四曰“抗美援朝”。这一系列的重大决策，集中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在外交上的强烈意志，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是开天辟地的大变革。兹将有关情节分别阐述于后。

一、“另起炉灶”

1949年2月，毛主席鉴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全胜在望，新中国诞生为期不远，在他驻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首先提出了新中国要“另起炉灶”这一外交方针。他的着眼点是针对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悲惨局面，广大人民历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旧中国腐败的统治阶级为了依附帝国主义，对外先后签订了大量丧权辱国的条约和协定，致使我文明古国沦为半殖民地，从清朝到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都是屈辱外交。新中国必须彻底埋葬这种屈辱外

交，另起真正符合人民渴望已久的独立自主的外交炉灶。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又强调指出：“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控制权，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起来了。”“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他的讲话不仅是新中国初期外交战略思想的奠基石，而且也是外交建设的指南。当时，我们党对毛主席的决策思想及时地有步骤地做了落实安排。

1. 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主席再次阐明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政策，经过热烈讨论，大家一致拥护，并在《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这样，不但规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而且对新中国外交的一些具体政策和立场都做了规定，既反映出中国人

民推倒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之后的人格和国格，又使我国外交部门有章可依，有规可循。另起的这一炉灶，意味着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一去不复返了。

2. 组成一支新的外交队伍，确保各项外交方针政策的贯彻。这支队伍是以有革命经验的老同志挑大梁，由周总理兼任外长。配备的副部长、司局长、驻外使节及使馆的高级官员，有的是从人民解放军调来的经历过南征北战的将军；有的是从地方调来的在新老解放区担任过党政重要职务的负责同志；还调来一批多年受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在蒋管区或在国外长期从事外交活动的同志，以及一大批文化水平较高、政治素质较好的青年干部，作为接班换代的后备军。此外，还调集了具有外交专业特长的进步人士和旧政府驻外使馆起义的愿献身于新中国的外交事业的官员。对这两方面的爱国人士，分别安置其为外交顾问或专门委员等职务。

新中国的外交阵容与旧中国的外交班底是根本不同的。这支外交队伍是按照“另起炉灶”的要求组建的。但有的老同志被调出国做外交官，一方面感到多年参加革命，如今取得解放全国的胜利，无限光荣；一方面又深感对外交工作太陌生，恐误大事。有的人曾说：自己是打游击出身的，对外交不曾沾过边，而今要出国办“洋务”，岂不是拿着黄牛当马骑？希望别让我这个土包子出洋相了。这种言论引起了领导上的注意。针对这一现象，周总理指出，毛主席一再强调我们外交工作非常需要有革命经验的老同志去挑重担。现在的问题是急需加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外交战士的头脑，否则，这支队伍就承担不起应有的政治使命。他指出外交经验和外交技术要了解一些，请人讲一讲旧政府屈辱外交的罪状和在外交技术上应注意的事项。周总理说到做到，除在百忙中见缝插针地给大家讲国际形势，讲中央的有关方针、政

策，还安排中央若干领导同志给出国人员一些教诲。有一次周总理安排即将出国的一些大使，在幕后参观毛主席接受外国大使呈递国书的仪式，当递国书的大使及其随从人员走后，周总理将幕布一拉，请毛主席给即将出国的大使们一些指示。毛主席亲切地说：你们都是老同志，政治观念强，纪律性强，能认真贯彻“另起炉灶”的方针。你们出国工作，中央放心，切不要疏忽大意授人以柄，更不要以大国自恃，要平等相待，要学习人家的长处。我们办外交是新鲜事，但不能人云亦云，凡事要问个为什么？你们看我今天穿的是黑色中山装、黑色皮鞋，这是按礼宾负责人的意见办的。我曾提出，国家元首接收外国大使呈递国书，为什么要穿黑色礼服？我喜欢穿灰色中山装，它也是我们的民族服装，有什么不可以？负责礼宾的同志讲，事关外交技术问题，国际法上有规定。我又问国际法是谁定的？我们可不可以创立几条、改变几条呢？礼宾负责人却无言以对了。这一谈话引起了大家的深思。经一段政治学习之后，他们深感出国当使节责任重大，都抱着为“另起炉灶”的外交多做一些贡献的愿望，愉快地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积极发挥作用。

3. 逐步开展民间外交活动。周总理一再强调，毛泽东思想一向重视广大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人翁地位，从长远看，民心向背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主要因素。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中，民间的友好交往也是非常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一个方面，官民并举、互相配合的局面是必须重视的。而后的实践证明：对已建交的国家，开展民间友好往来，对双方政府间交往可以起到补充作用，并能够开拓新的交流渠道，扩大经济、文化交流。特别对周边邻国，像走亲戚、看朋友那样的来往，对增进双方的友谊和睦邻关系，都是实际而有效的。组织对口行业人员的友好交往，彼此交换在业务方面所需要的知识，互相学习，对促进两国友好的发展是很有益

的。所以我们提倡工农青妇和各行各业，都可以酌情派友好访问团出国。对未建交国家，根据情势的许可更应开展民间往来，使两国人民在历史上早已存在的友好感情，能够继续发展，并通过互相访问，增进在新形势下的相互了解，以民促官。例如，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双方民间的交往是颇为频繁的，且为两国的建交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又如，中美未建交之前，毛主席决定邀请美国的乒乓球队来访，起了疏通两国关系的作用，被国际上赞称为“乒乓外交”。

事实一再表明，我们开展民间外交，为尊重两国人民间的实际需要，应抱因势利导的态度，请进来，走出去，寻友谊，求知识。从民间友好来往的逐步发展更可以看出，新中国对民间外交的重视，同已往的旧政府在外交中把人民视为绊脚石，甚至当作被出卖的对象，简直形成了天渊之别。

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在中国曾横行霸道多年的帝国主义，其控制权虽在中国被打倒，但它们在中国的土地上还遗留下许多“污泥浊水”，急需打扫干净。毛主席 1949 年 2 月在西柏坡也讲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就是要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残余势力，先把屋子打扫干净，然后再请外国客人进来，以免使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受到影响，并利于中国人民摆脱外来干扰，致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家园。

1. 帝国主义过去侵入中国，曾用多样的手段迫使旧中国政府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和协定，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等等，逼迫我国割地赔款，并明目张胆地夺取了治外法权、内河航运权、领空领海使用权等。对这些不平等条约和协定，我方必须重新审查，严加处理，决不容许这些欺负中国的罪行再存在

下去。

2. 帝国主义遗留的污泥浊水，有的还悄悄地传播着奴化中国人的毒素，扼杀着中国人实现国家独立自主的要求，新中国对这种祸害必须尽早排除扫清，以免后患。

3. 新中国成立后一再声明，凡愿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须与逃到台湾的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企图原封不动地继承在旧中国的外交地位者，或企图在新中国与蒋介石集团之间脚踏两只船者，我宁可暂缓与之建交。我国上述严正立场，被一些国家的外交人士所赞赏，认为这是被压迫民族取得独立后的一大创举，不愧为恢复国家独立、主权和尊严的范例。

当时有一件事颇引人注目，即当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南京之际，国民党政府被迫仓皇撤至广州，并邀各国驻华使馆亦随之撤退。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仍滞留南京窥察解放军进驻南京后的动向，其用心不外在中国发生如此巨变之际企图运用两手政策，保护美国在华的特权。一手仍支持蒋军在内战中挣扎，谋求偏安局面，甚至妄想卷土重来；一手试图谋求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外交接触，保护其在华利益。毛主席说这是“想捞一把”。由于美国政府仍坚持与中国人民为敌，其大使也就只有收拾行李上路了。

毛主席关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以及“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等著作，使广大革命战士提高了认识水平，增强了革命的意志。站在要冲的外交人员更不例外，他们面对着对外斗争形势的发展，朝气蓬勃地遵照毛主席给予的任务和教导，勇往直前，力求做到符合政策要求，从中深切体会到毛主席的深谋远虑。通过“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一战略步骤，使与建交有关的诸多事项环环相扣、节节把关；这一连

环套对彻底摆脱过去的屈辱地位，真正实现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是关键性的一大决策。

三、“一边倒”

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时，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就是旗帜鲜明地宣布新中国站在当时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倒”成为我国外交的又一重大战略方针。

1.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客观现实出发，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新中国成立时及其后一个时期，国际上存在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尖锐对立和斗争；美帝国主义又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新中国实行军事威胁、政治孤立、经济封锁的敌视政策，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蒋介石国民党集团虽被赶出大陆，逃到台湾，但仍想借助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反攻大陆、卷土重来。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要站稳脚跟，巩固得来不易的独立主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就必须加强和发展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图谋。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利益所在。所以，一边倒是当时同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复杂斗争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需要，也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需要。一边倒同独立自主并不矛盾，我国在实行一边倒方针时，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立场。

2. 尊重历史事实，做出无可置疑的结论。毛主席强调指出，孙中山先生积40余年的经验，我党积28年的经验，彼此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中国必须联俄。孙中山先生还曾强调中国的革命必

须“以俄为师”，在其遗嘱中又说“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我们党深知，俄国在列宁领导下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在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时期给予了“雪中送炭”的无私援助。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孙中山先生所期望的支援，光说空话，使孙中山先生识透了真假朋友关系的症结所在。

在中国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又给予了难能可贵的援助。如用骆驼队运送汽油给我国，派飞机和驾驶员参加我国的保卫战。于此可见，列宁所开创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永远值得推崇的！自称中国朋友的帝国主义，反而乘中国抗日战争危难之际，竟伸手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尊严，这与苏联又是截然不同的对照。新中国诞生后，在外交上加以区别对待，完全是公正、合理的。我党政军民根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一面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并医治战争留下的创伤，争取尽早地建设社会主义，一面在建立外交关系上，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对我友好的国家建交。这是对历史经验的尊重，也是从实际出发的抉择。我们还同受帝国主义压迫进行反帝反殖斗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并且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大众站在一起，因为它们讲正义的，爱好和平的，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至于对正在为摆脱殖民统治、争取独立而斗争的被压迫民族，我们不仅给予无限的同情，且尽可能给予应有的支持。

3. 根据客观现实，有步骤地开展外交关系。首先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紧接着东欧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同我国建交；几个亚洲邻近国家也很快地同我国建交；还有西北欧几个国家，也先后同我国建交；另有与英、荷的代办级关系。从不同类型中可以看出增进友好合作、维护世界和平是最大的共同点，成效是显著的。经济交流、文化交流，逐渐走向广度和深度。事实说明，

“一边倒”的方针，在国内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鼓舞了反帝反殖的斗争，增强了维护世界和平的信心。

4. 坚持原则，勇于应变。在新中国诞生后，苏联对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方面曾给予了大量援助。我们热情地尊敬他们为老大哥，真诚地与之合作，共同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制造战争的阴谋活动，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有力的积极作用。不料，赫鲁晓夫掌握苏联大权之后，主张美苏共同主宰世界；对兄弟党以老子党自居，发号施令，挥舞指挥棒，损害兄弟国家独立自主的原则。在这种情势下，我们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为了实现中国人民的远大理想，同苏联的大国主义、霸权主义进行了斗争。在新形势下，不再提“一边倒”了。但是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仍如往昔。

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帝悍然对朝鲜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同时用武力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美军飞机侵入我国东北领空进行轰炸扫射，进逼鸭绿江，我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毛主席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1. 大家经反复思考，深知抗美援朝的重大意义。朝鲜是我们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国家，双方唇齿相依，患难与共。他们遭受强盗欺凌，我们理应挺身而出，拔刀相助，而且与我方“保家卫国”亦息息相关。

我国人民对美帝的到处侵略早已同仇敌忾，进行抗美援朝，热火朝天，万众一心。但有的人考虑到美军的先进装备，对取胜的信心有些不足。遂以毛主席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作为教材，让大家学习，并认真贯彻毛主席在战略上要藐视敌

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的思想，还要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对敌斗争在气势上必须压倒敌人、决不被敌人所压倒等教导。我广大军民掌握了这种精神原子弹，就大大地增强了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力量。

2. 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密切配合作战，取得节节胜利，国际上的正义人士和团体为之振奋，国内广大人民欢欣鼓舞。但美帝竟宣布封锁我国沿海港口，禁运战略物资，进一步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并冻结我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本着“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原则，我国接管了美国在华主办的和津贴的文化教育机构，冻结了美国在华的资产，还结合抗美援朝形势在社会上开展政治运动，大张旗鼓地肃清了社会上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我方运用如此后发制人的方针，更加强了我方在外交斗争中的主动地位，将“打扫干净屋子”的要求引入了一个更彻底的地步。

3. 以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战场上愈战愈强，致使美国的将军们难于招架，不得不坐下来通过谈判解决停战问题。

这一战场局势的扭转，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特别是被压迫民族，为之扬眉吐气，且增强了反对帝国主义蹂躏及其炮制战争的勇气和信心。当时尚未与我国建交的锡兰（斯里兰卡）曾有引人瞩目的表现，即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正与美军拼杀、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的时候，锡兰愿将其所产橡胶售于中国，中国提供锡兰所需的大米。此事在中锡友好史上被传为佳话。可见反对帝国主义的欺侮，是被压迫民族的共同需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毛主席的这一论断，已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

抗美援朝的胜利，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中国人民捍

卫社会主义祖国不受侵犯的意志更加坚强了。在一次国务会议上，原国民党人张治中将军颇有感慨地说：现在做中国人有了自豪感，在蒋政府执政时期，出兵抗美援朝是根本不可思议的，因为它是依靠美帝而生存的。毛主席以超人的胆略和卓识，高瞻远瞩，做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其结局，不仅在战场上赢得了惊人的胜利，而且在谈判桌上也取得了以理服人的停战结果，使世人为之敬佩。可见毛主席英断、雄略之伟大！且又一次充分体现了由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军民其意志的坚强和力量的巨大，都是不可低估的。

综观新中国初期我外交战线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不断取得胜利，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望逐步提高，1954年周总理对印度、缅甸做了国事访问，分别在联合公报中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准则，得到了国际公正舆论的热烈支持。1955年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又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引申为十项原则，周总理同与会各国代表充分协商的精神发挥了积极作用，颇受好评。同我建交国家大大地增多了，我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活动也逐渐增多了。

时至今日也有人提出，毛主席对建国初期的外交所定的一些方针是否早已过时？我认为由于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有的提法确实不宜再重复了，但也有很多的提法还必须要坚持强调的提。例如对建交在谈判中要对方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类规定对妄图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者仍是一个严正制约，且符合实际情况的需要。如果从立场、观点、方法来论，毛主席对建国初期关于外交方面所有决策的讲话，永远不会过时。我作为一名外交战士愿反复地从他的决策讲话中吸取启示和力量。我们重温毛主席对建国初期关于外交的系列讲话，就更加了解我们应如何理直气壮地回击来自霸

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挑衅，更应切实遵循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真贯彻我党十四大的精神，迈开大步走自己的路！

学习毛泽东外交思想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学

刘 山

在毛泽东同志诞辰 100 周年之际，我们参加这次纪念活动，以表达外交学院全体同志对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崇敬和怀念之情。作为一所培养外交人才的高等学校，我们觉得，最好的纪念方式是，加强对毛泽东同志的外交思想和实践的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学。我想，这不但对于外交教育事业是一个推动，长远地看，也将有助于我国外交事业的开拓。

毛泽东同志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领导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把一个受尽帝国主义侵略和欺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与此同时，他也领导我们创建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一道，不仅为创建中国的新型外交运筹帷幄、呕心沥血，还以他们亲身的实践为我们树立了新中国独具特色的外交风格和中华民族的崇高形象。可以说，毛泽东同志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人和决策者，他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也为世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人

民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把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根本经验，特别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用于指导我们的对外斗争，不仅为我国外交事业打开了局面，对当代世界外交也发挥了重大的影响。他在外交方面的言论和实践，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国际关系中的各项重大问题。这里只就几个问题谈谈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一点粗浅认识。

一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政策 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核心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旧中国的外交史，乃是一部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下不断蒙受屈辱的外交史。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高高举起反帝的旗帜，争取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地位。这就决定了新中国的外交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早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了全民动员、坚持抗战的方针，其中包含了抗日的外交主张。这是中国的革命政权第一次在外交方面提出的系统主张。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毛泽东同志又提出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纲领，并且在延安开展了国际交往，包括同美国官方人士的交往。这些国际活动为后来新中国的外交积累了经验。在延安建立起来的外事队伍，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了组织准备。在194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

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的任务，并且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外交问题的具体纲领。其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借“调停”之名，行干涉中国内政之实，公开援助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致使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对外政策目标未能实现。然而，美国公然站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对立面和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在第二次大战后大大削弱的变化，又给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独立与解放提供了条件。毛泽东同志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气魄，排除外来干扰，坚持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胜利后，他不失时机地规划了新中国外交的蓝图，作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决断。在1949年3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他明确提出了“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包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等等。于是，新中国的外交以与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的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毛泽东同志从新中国成立之始就明确表示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和平性质。他在1949年6月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上庄严宣告，“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

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正是本着这些原则同外国政府谈判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周恩来同志根据这一讲话的精神和以后我国的外交实践，总结提出了有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我国发展对外关系的指导方针。这是对毛泽东和平外交政策思想的发展。

二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 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精华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也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灵魂。毛泽东同志在指导对外斗争中，始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国际形势和我国国内任务的实际出发，经过认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据以确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复杂多变的。正确地认清形势已属不易，要审时度势地采取恰当的对策更是困难。应当看到，毛泽东同志在世时，我国的国际环境不断出现急剧的变动，我国的独立和安全不时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准确地把握形势和果断采取恰当对策，不但需要理论上的远见卓识，还需要有革命家高屋建瓴的胆略和魄力。在中国革命和建设面临外来威胁的一些重要历史关头，毛泽东同志以他的思想和实践表明了，他是当代伟大的外交战略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处于西方霸主的顶峰。当蒋介石仗着美国的支持发动内战时，西方世界正掀起一股反苏战争的叫嚣，

似乎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这时不但国内有人对解放战争能否取胜怀有疑问，国外也有“好心人”奉劝中国人民不要去碰硬。毛泽东同志以他敏锐的洞察力看出，美国实际是拿反苏反共战争宣传作烟幕，而要把美苏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霸占起来。在这种形势下，只有横下一条心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才有可能取得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他在1946年8月同安娜·路易·斯特朗的谈话中，精辟地分析了反苏战争宣传的两重性，提出美国在压服美苏之间辽阔的中间地带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因此，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的矛盾，并且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这一思想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历史性胜利；同时也给各殖民地、附属国战后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事业以极大的鼓舞。也正是依据这一思想，当新中国建立不久，面临美国侵朝战争的严重威胁和封锁禁运的困难形势，毛泽东同志又一次作出了果敢的决策，以抗美援朝为我国国内建设赢得了宝贵的和平。

建国初期，为了对付美国的威胁，我国曾经同苏联结盟。然而，在毛泽东同志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指导下，我国始终坚持维护自己的独立与主权，维护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在波匈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发表了一论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公开批评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了我国外交的原则立场。1958年以后，当苏联提出对我国妄图进行控制的无理要求，并进而把中苏两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采取了撕毁协定、撤退专家、断绝援助等行动，向我国施加压力时，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对这种霸权主义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些是众所周知的。

中苏关系的恶化，一度使我国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1969

年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陆续在中苏边境和蒙古陈兵百万，对我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因陷于侵越战争的泥潭而内外交困。尼克松政府表现出调整对华政策以改善美国处境的动向。1969年12月，美国驻波兰大使秉承尼克松之命，伸出了向中国使节进行接触的触角。毛泽东同志抓住时机，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并且在会见斯诺时发出了欢迎尼克松访华的信息。在周恩来同志亲自参与和精心安排下，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在中美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访问我国。中美双方达成了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公报》，为尔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础。在此前后，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世界上掀起了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又一次高潮。毛泽东同志在外交上作出的高屋建瓴的战略调整，对于70年代我国外交局面的开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 建立广泛的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和 推行人民外交，是毛泽东外交 思想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开创新中国的外交局面，毛泽东同志把中国革命的根本经验之一——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引申到国际领域，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他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明确提出：“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并且强调，“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毛泽东同志把团结国际友人看作是保证我们的事业永远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第二，团结国际友人的标准不是根据社会制度或者意识形态，而是根据是否爱好和平。

毛泽东同志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一向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在统一战线内部，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在反对顽固势力时，则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这些政策和策略也同样适用于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周恩来同志正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思想，在建国后按照资本主义国家当时对待和平与战争的不同态度，把它们分为三种类型，团结以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西北欧具有中立倾向的国家和正在进行独立斗争的民族所代表的“和平中立派”，争取以英、法为代表的“维持现状派”，孤立以美国为代表的“主战派”，从而打破了美国妄图在世界上孤立我国的企图。对待美国则采取坚定而又慎重的政策，一方面反对其侵略政策和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径。另一方面，不主动挑起冲突，斗争有理有利有节，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国间的争端。以上这些政策和策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到一个比较有利的和平环境。

到了70年代，毛泽东同志又根据美苏争霸和国际力量重新组合的形势，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国际力量划分的理论。他把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友好作为我国外交工作的立足点，主张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同日本、西欧、加澳新等第二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争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美苏恢复和保持正常的关系。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思想以及在不同时期依据实际情况对国际力量作不同的划分，以调整统一战线的构成，是科学而富有远见的。

为了团结国际友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在外交上的一个创举就是推行人民外交。这既是出自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世界历

史的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信念，也是为了打破建国后美国政府长期采取敌视、孤立我国的政策现实需要。周恩来同志曾经说：“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这是对毛泽东的人民外交思想的最好说明。毛泽东同志从抗日战争起就注意做团结国际友人的工作。他生前会见过数以千百计的外宾，有各国共产党的领袖，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有西方国家的政治领袖、知名人士和新闻记者，也有亚非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群众代表。他的谈话坦诚而富有哲理，自尊自信而不强加于人，既体现了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宽广胸怀；又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谦虚和平等待人，特别是尊重与平等对待中小国家和普通群众的外交风格。在当代各国的领袖人物中，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巨大的精力和热情去同世界各国人民交朋友，同时，又能以自己博大精深的思想给各国人民以深刻影响的，恐怕在世界上是不多的。

四 学习、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外交思想和实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学

毛泽东同志的外交思想与外交实践，是我们宝贵的思想财富，今天仍然是指导我们从事外交工作的有力思想武器。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去世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又一次伟大的革命，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同志以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出发点，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工作重心的转变，在80年代及时调整了我国对外政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

的两大主题，并且把中国的对外政策概括为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针对 80 年代末以来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和两极格局的终结，邓小平同志又及时地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并且调整了外交工作的部署。把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争取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作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继续把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谊和合作作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点：在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中，既坚决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又愿意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在多边外交中，我国为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推动政治解决地区冲突和国际争端，为促进世界裁军进程和各国的共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努力。由于这一切的努力，我国经受住了严峻国际形势的考验，又同 30 多个国家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从而进一步打开了外交局面。在国际格局转换的新形势下，邓小平同志还提出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我国对外工作的奋斗目标。事实表明，邓小平同志是我们学习、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光辉榜样。

周恩来同志在建国之初就向外交战线的同志提出了总结对外斗争经验，把外交学中国化的任务。实现他的遗愿，是外交界、特别是从事外事教育的专家、学者的共同责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学，固然要借鉴和参考外国一切有益的东西，但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放在总结我们自己的外交理论与实践上，特别是关于毛泽东同志的外交思想与实践的研究上。举行毛泽东外交思想研讨会，将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学提供有益的思路和丰富的内容。我们外交战线的同志，包括长期从事外交斗争的老前辈和各位专家、学者应共同努力，把这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做好。

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探析

郝 润 昌

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则给世界战略思想的智慧之苑增添了新的光彩。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毛泽东外交战略与策略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外交工作，为维护国家利益及世界和平，均作出了重大而积极的贡献，从而结束了过去即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受外侮的痛史和为中国的现代外交史谱写了新的篇章。因此，在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之际，撰写本文，一方面是为纪念毛泽东这位当代中国的伟大先哲和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更好地继承与弘扬毛泽东的外交战略与策略思想，深刻领会邓小平同志近几年来针对国际风云的突变为我国外交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方针和原则，以便更加客观而清醒地认识与把握两极格局终结之后出现的更加错综复杂的世界风云。

一 关于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形成的背景

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形成的背景是：

第一，从时代的角度讲，二战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迎来新的高潮而国际资本主义势力一度转入守势地位。其主要表现是：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越出了苏联一国的范围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经建立便随之加入并壮大了这一阵营。另一方面，随着民族和民主解放运动席卷广大亚、非、拉地区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大批亚、非、拉国家挣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而纷纷走上独立自主的解放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既是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条件下的产物，反过来它又给这一运动的发展以极大的鼓舞和有力的推动。在此情势下，社会主义阵营以及民族与民主解放运动的力量便因此而不断得以发展和加强；相反，国际资本主义一方的力量则受到极大消弱并被迫在战略上处于守势。作为伟大的战略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自然看到了并抓住了大时代发展带来的这一良机，领导中国果敢而又迅速地投入到了以世界为斗争舞台的反帝反殖及支持民族和民主解放斗争的国际大搏斗之中。为了防止斗争的盲目性、主观性及片面性，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理所当然地需要制定一套正确的战略来指导新中国从事广泛而重大的外交活动。

第二，从国际战略环境的角度讲，一方面，战后世界长期处于两极格局冷战状态，世界和平经常受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威胁；另一方面，我国因反对美苏称霸，国家安全常常受到来自美苏的威胁。

十分清楚，美国和苏联为了各自的战略利益而展开的全球争

夺与抗衡，不仅会激化它们之间的矛盾，而且亦必然与世界各国，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利益相悖而发生冲突。从战后初期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的侵略政策与战争政策曾经严重威胁我国的国家安全。而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到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苏联成为我国的主要威胁。作为新中国的领袖，作为那一代人中不畏强权、敢于同强者抗争的光辉代表，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起而先后同两个超级大国推行的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行径斗智斗勇。因此，我们看到，形成于这一国际环境下的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既充满着浩然正气，又具有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鲜明特征。

第三，从国情方面讲，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综合实力远难以单独同美国或同苏联相匹配，但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民族尊严和根本利益，为了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又必须与它们推行的侵略政策、战争政策及霸权主义行径进行抗衡。

新中国成立之初，其经济、文化均十分落后。“一穷二白”，正是对其建国之初的落后状况的形象写照。到60年代初期之后，虽然其亦拥有了象征大国军事力量的核武器，但中国的综合实力仍远远落后于美国和苏联。面对先是美国而后是苏联对华奉行的以武力相威胁的政策，已经扫掉百年之耻的新中国，自然不得不奋起与它们作坚决的斗争，以维护国家的安全及民族的尊严，维护世界的和平。在此前提下，作为深谙古今中外战略思想并将之贯通于一体的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当然会利用美苏矛盾，借他国力量补己之不足，以与最主要的敌手进行斗争，进行抗衡。

上述种种充分说明，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确实是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国际大环境及特殊的国情相结合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及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正是在毛泽东外交战略与策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方能战胜各种险恶的国际环境而取得一

次次重大的外交胜利。今天，国际大环境又一次发生了众所周知的深刻变化。因而，邓小平同志针对这一变化所进行的战略调整和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无疑为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作出了新的贡献。这已为 80 年代以来我国的外交实践所证明。

二 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内容及其实践

（一）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精辟地指出：“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凡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又说：“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据此，可以认为，一个国家的外交工作，亦有全局与局部、战略与战役战术之分野。我们这里所说的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当属于战略学这一大宏观层面。我们当须从这一角度来认识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概言之，作为我国外交实践全局的指导思想，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主要包括下列方方面面，即：

第一，从总的指导思想上讲，就是坚持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民族和民主解放斗争，以推动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

第二，从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讲，就是坚持反对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反对侵略政策与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安全。

第三，从战略指导思想上讲，就是坚持藐视敌人，并压倒敌

人而不被之所吓倒。与此同时，在战役与战术上对敌人则高度重视之。

第四，从策略指导思想上讲，就是坚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主要敌人，并设法战而胜之。

第五，从行动的立足点上讲，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以自力更生为主，以外援为辅，决不依附他人。

当然，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内容绝不仅仅是上述五个方面，但可以认为，这几个方面构成了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精髓并使这一思想浑然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回首往昔，考察今天，我们看到，一方面，我国的外交实践正是在毛泽东外交战略与策略思想指导下进行并赢得一次次胜利的；另一方面，我国的外交实践则不仅检验并反过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毛泽东的外交战略与策略思想。

（二）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实践

从新中国建立迄今，毛泽东的外交战略与策略思想用于指导我国的外交实践，似可分作三个阶段，即：

第一阶段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到60年代末，历时20年左右。在这一时期中，在两极格局的总形势下，国际政治的主要特点，一是，社会主义阵营由形成壮大、发展到中苏分裂；二是，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不断高涨，亚、非、拉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相继摆脱殖民主义枷锁而纷纷走上独立的道路。三是，美国实施“遏制共产主义”战略，为此，它甚至不惜进行侵朝战争与侵越战争，并对苏联和中国等进行军事威胁、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等等。因此，在这一阶段中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与战争政策，支持民族与民主解放斗争，便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而这样的一种国际形势和任务自然会影响和反映在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外交战略及其相关

的外交举措中。

在此期间，中国政府采取的主要外交举措是：

第一，建国之后不久，作为新中国的首任主席，毛泽东赴苏访问，与斯大林进行会谈，并同苏联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苏联结成政治上的战略联盟，以此揭开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新篇章。毛泽东及中国政府的这一外交举措，生动地体现了新中国所奉行的“一边倒”，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的诚意与决心。战略家们公认，一项战略的推行，其成败的关键首先在于对战略突破口的选择及其对与实现其战略目标相关的重轻急缓关系的处理。建国之初，毛泽东把苏联作为我国对外战略的突破口及重点，足见其战略与策略的高超。而新中国崭新的外交史正是通过毛泽东访苏而启开的。正是在此次访问之后，一方面，新中国的外交迎来了它的第一次小高潮，即与社会主义各国团结合作的小高潮，从而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另一方面，中国在一个强大邻国的支持与援助之下，更可无后顾之忧地进行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当然，在建国之初，我国有条件放开手脚进行反帝反殖斗争，从客观上讲与我国“一边倒”的外交成就即中苏合作及社会主义的各国的团结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可以说，这一切正是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最初结出的外交硕果。

第二，毛泽东果断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大义凛然赴朝抗美援朝，打败美军，以血的代价，援助了朝鲜，伸张了正义，保卫了祖国的安全，赢得了世界的赞誉，从而成为我国外交史上的一大壮举。

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后，美国立即对朝鲜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侵占我国领土台湾，严重威胁我国大陆的安全。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兴正义之师，赴朝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抗美援朝斗争是一场弱国对强国，穷国对富国，无核国对抗有核国的战争。在此种力量对比的情况下，面对强敌，以

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勇于并敢于作出如此战略抉择，充分体现顶天立地的大无畏的胆识。在战争期间，他们在军事与外交上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将美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附近，最终迫使美国在谈判桌上签订停战协定。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教授说：“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和国际威信由于在朝鲜与世界上最大的强国打得相持不下而大为提高。”与此同时，朝鲜战争的胜利还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全世界的影响，增强了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信心与勇气。因此，可以说，朝鲜战争的胜利，的确堪称为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胜利的典范。

第三，通过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这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促成印支问题的和平解决，增进了我国与亚非各国的了解与合作，开创了我国外交活动的新天地，从而进一步显示了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威力。

日内瓦会议从1954年4月26日起到同年7月21日结束，持续近3个月。在日内瓦会议上，由于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所作出的不懈的努力，在克服了重重阻力之后，1954年7月21日印支和平协议终于签定。万隆会议则于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召开，历时一周。万隆会议的重要意义则在于，一是通过亚非各国的共同努力，其中尤其是我国的努力，进一步加强了亚非各国之间的团结与合作；二是进一步增强了亚非各国反帝反殖的信心与决心，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新发展；三是将十项原则（即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相一致的原则）写入了会议最后公报，产生了“万隆精神”，从而不仅为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亦进一步推动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向纵深发展。在“万隆精神”产生之前，我国已与有关国家共同提出了处理国家与国家关系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因而，“万隆精神”的产生及

其以后亚非拉出现的新形势，与我国的外交努力，关系极为密切。一言以蔽之，正是在上述两次国际会议之后，我国不仅迎来了其第二次外交高潮，即与亚非国家展开频繁活动的高潮，而且其国际影响及地位随之进一步得以扩大和提高。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的《国际事务概览——一九五四》一书曾就我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及其作用作这样的评论：“1954年是中国人民政府威望增强的一年，更是共产主义世界和非共产主义世界一致认为中国是东亚大国和世界五强之一的一年。中国于这一年的春夏季参加了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日内瓦会议，这就最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威力通过参加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又一次得到新的体现。

在上述三大举措中，抗美援朝这一壮举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所具有的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中国人民在朝鲜战争中，为援助朝鲜人民，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也正是抗美援朝，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所具有的在战略上敢于藐视强敌、敢于胜利的精神风貌。例如，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同志声明道：“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决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他们将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再如，在1950年9月30日，即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前20天，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声明道：“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远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毛泽东的讲话和周恩来的讲话与声明，满是正义，满是豪情，满是胆识。

第二阶段始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止于80年代末、90年

代初，历时亦近 20 年。在此期间，在两极战略格局依然存在的大前提下，影响世界政治形势的主要因素，一是美苏全球争夺的加剧；二是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与苏联对中国军事压力的激增以及两国关系的调整；三是中美关系的改善及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及其调整。在这一时期的初、中期，我国在对外政策上及其战略指导思想上采取了两大相关的行动。其一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及远东与世界和平，在援越抗美的同时，利用当时的美苏矛盾，其中主要是美国有求于我的战略需要，把握有利时机，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僵局，推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由于这一举措是以对美的“乒乓外交”开始的，故而人们把此看成是“小球”转动了“大球”。这一点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所具有的高超艺术。随着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在 70 年代初期迎来了发展对外关系的另一次新高潮，即与一系列国家建立邦交并积极展开交往的。其二是，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决策。这在当时情况下，指导我国的外交工作，不断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大力开展同第二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坚决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再次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国不称霸并决心反对霸权主义的战略主张。显然，这足以反映毛泽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最大限度地孤立与打击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外交战略思想。

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继续存在的前提下，在这一阶段的中后期，中国在外交上还采取了三大主动行动。一是积极而有步骤调整了它同包括苏联在内的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为自身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二是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一国两制”的原则指导下，积极开展活动，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三是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战

略主张，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显然，这一切与邓小平灵活而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是分不开的。

第三阶段从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至今。这一阶段刚刚开始，现在仅仅是其初始阶段。从国际大环境讲，在这一阶段世界政治的主要特点是，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已经终结，世界正在从旧格局瓦解之后走向新格局的过渡时期中。这几年来，国际风云更加变幻莫测及国际形势更加动荡表明，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两极格局的新的历史时期。针对这种情势邓小平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新方针及建立国际新秩序等主张。这几年来我国外交正是遵循上述方针和主张而进行实践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看到，作为一种指导思想，即用以指导我国外交的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确实具有丰富的内容，并确实受到了我国外交实践的检验与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显然，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在外交上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胜利，其国际地位与影响因此而空前提高与扩大的无数事实，正是表明了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正确，我们应当把它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认真学习，继承并进一步弘扬之。

三 关于对毛泽东外交战略 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在我国今天的外交工作中，继承与发扬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就是要力求做到下列这样一些方面：

第一，从战略视野上讲，就是要有以世界为舞台，放眼全球，着眼未来，谋全局与谋未来相结合，以便纵横于天地间的宏观指导思想。诚如古人所云：“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我们看到，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恰恰将

谋全局与谋万世即谋未来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第二，从战略指导思想上讲，在处理国际关系中，就是要有争取联合与团结大多数，以防在国际斗争中陷于被动和孤立的思想。可以说，这一观点构成了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灵魂。这就是说，在对外工作中，应争取联合与团结一切可以联合与团结的力量，形成广泛的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以最大限度地孤立与打击最主要的手。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即在从旧格局终结到新格局形成之前的过渡时期中，我们应随时注意大国关系的调整并广交朋友，这无疑是有深远的战略意义的。

第三，从胆略上讲，就是要有在气势上敢于藐视一切而一往无前的气概及在战术上则慎之又慎的思想。当前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形势瞬息万变，我们在外交上尤其需要这种思想，这样的精神风貌。

第四，从谋略上讲，当前就是要认真学习与领会邓小平近几年来提出的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过的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等战略思想，以确保我在外交上不断赢得新胜利。

第五，从战略构想上讲，针对国际大环境的变化，要明确新时期我国外交工作远期、中期及近期目标，使外交行动与我外交战略的大目标密切结合，以更好地为维护我们国家利益及国际安全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六，从战略研究上讲，就是要建立我国从事国际战略问题的专门机构，培养一支国际战略问题研究的专门队伍，从战略角度细致深入地总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外交思想及我国外交实践，从国际战略全局出发，把握国际大环境的发展，及时向中央提供研究成果，以供其在进行战略决策时参考。而这无疑是继承并宏扬毛泽东外交战略的重要方式之一。

毛泽东同志毕生为我们国家的独立、富强与中华民族的尊严而不遗余力地奋斗了一生，建立了巨大功勋。只要我们不断发扬光大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并用于实践，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中，为我们的祖国赢得富强、赢得荣誉、赢得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尊严，为我们生活的世界赢得和平，那无疑就是对毛泽东同志永远的最好的纪念。

毛泽东关于战争与 和平问题的若干论述

傅 耀 祖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状态，两者相互矛盾、又互相交替。古今中外大大小小的战争此起彼伏、层出不穷。据国际上一些学者统计，在以往 5000 年的历史里，世界各地曾发生过 1.4 万余起战争。就全球而言，几乎年年有战争，而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战争状态与和平状态总是相互交替的，和平的时间要长得多。战争是一种暴力，给社会生活带来极大影响，无数财富毁于一旦，众多生灵倒毙疆场。但是有的战争恰恰起到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列宁曾指出：“战争虽然引起种种灾祸和苦难，但它也会带来相当大的好处，它无情地暴露、揭穿和破坏人类制度中许多腐朽、衰颓和垂死的东西。”正因为战争对人类社会有众多直接和深远的影响，所以历代智者贤人对战争与和平这一重大问题进行过广泛的研究，有许多真知灼见和至理名言。然而由于历史和阶级性的局限，他们还难以揭示战争与和平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吸收和继承了人类优秀文明的精华，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剖析战争的起源、性质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

从而在理论上确立了科学的战争观。马克思主义认为：

战争不是人类有史以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地存在下去。战争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的根源在于私有制与剥削阶级。“战争总是由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者挑起的。”

战争是政治或政策的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

战争有不同类型和性质之分，战争可分为非正义的掠夺性战争和正义的解放性质的战争。“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

只有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才能消除战争；只有同战争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维护和平。对付一切反动势力和战争狂人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

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取决于战争性质和参战各方的国内制度和政策；取决于人民群众对战争的目的和原因的认识以及他们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

毛泽东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半个多世纪以来，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同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相结合，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战争与和平这一关系人类命运和各国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有许多精辟、独创的论断，把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及和平观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对指导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斗争实践具有历史性的贡献。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之际，我们学习毛泽东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若干论述，有助于我们领会、继承和发扬毛泽

东思想，指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对开展外交斗争和建设中国的国际关系、外交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战争不可避免、世界大战可能制止

关于战争规律，历代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有许多分析和总结。列宁十分赞赏普鲁士资产阶级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列宁认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探讨战争规律的“理论基础”。列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给这句名言以新的更加科学的内涵。列宁指出：战争是“有关国家（和其内部各个阶级）当时的政策的继续”。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不同阶级（包括国家、民族和政治集团）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当这些矛盾和冲突发展到用其他手段难以缓解的时候，战争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是几千年阶级斗争的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数以万计的战争都是社会集团政治斗争的必然继续，也是不同利益集团所执行的政策必然继续。1936年毛泽东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指出：“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一切关于战争的规律，都是进行战争的民族、国家、阶级、政治集团为了争取自己的胜利而使用的。”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私有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战争作为解决政治危机的一种手段和社会现象是难以避免的，过去和今天的历史和现实证明了这一点，将来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但是强调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并不能推理作出世界大战也是不可避免的结论。因为一般战争与世界大战并不是同一概念。战

争是一种总体现象，而每一场战争都有类型、性质、规模、种类之分。以国际间战争而言，就有双边战争，地区战争；有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殖民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等等。作为世界大战，即全球战争（世界大多数国家、民族和地区都卷入的战争）在战争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一种特殊形态的战争。历史上发生的 1.4 万次战争中，世界大战仅有两次。因此在谈论战争的时候要把一般战争同世界大战的概念加以区分，切不可混同。毛泽东在 1960 年底接见外宾时非常明确地指出：局部战争和世界战争要加以区别。后来周恩来在 1961 年 9 月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周恩来说“推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也在增长，但有限战争即局部战争却不可避免。”

毛泽东把一般概念的“战争”同特殊形式的“世界大战”加以区别，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当时具有捍卫马列主义的现实意义。大家知道，1956 年赫鲁晓夫在苏共 20 大上提出一个引人注意的观点，即“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观点如果是指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那倒是一种新意。但是纵观赫鲁晓夫当时的言行，他提出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真正涵义并不是指推迟和制止新的世界大战，赫鲁晓夫极力渲染核战争的恐怖，宣扬世界大战将毁灭地球。他大肆攻击当时在亚非拉兴起的民族解放战争，说什么这些战争将成为“星星之火”引发世界大战。可见赫鲁晓夫有意混淆概念，企图在避免世界战争的幌子下，反对人民革命、反对民族独立战争，把民族解放运动纳入苏联实现与美帝国主义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的战略轨道。

毛泽东从当代国际形势的现状和特点出发，科学地把一般战争与世界大战加以区别，并提出当今世界局部战争、有限战争不可避免，世界大战可以推迟和制止的战略思想，为全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实践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

指导原则。

毛泽东从以下三个层次论证推迟和制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第一，世界大战有两种可能性。

辩证唯物主义是毛泽东观察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根本思想方法。关于新的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毛泽东历来坚持两点论，即当今世界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依然存在，但是推迟或制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也很大。1950年6月13日毛泽东发表建国后的又一篇重要著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阐述了对世界大战的两点论的论断。毛泽东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在这以后的20多年里，毛泽东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反复强调战争的两种可能性。所不同的是由于谈话对象各异和当时具体形势有别，毛泽东论述的侧重点也略有不同。1955年10月12日，毛泽东会见民主德国的外宾时，指出：世界战争打或不打，两种可能都有。但我们要作好准备。1957年4—5月苏联伏罗希洛夫访华时，毛主席同他多次讨论了帝国主义也怕社会主义的问题，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不敢真正的同我们打仗。现在有着两种可能性：一是战争的可能；一是和平时期拉长的可能。在60年代、70年代，毛泽东曾多次谈到保持15年、20年世界和平是可能的。1976年2月23日毛泽东在最后几次外事活动中，对前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说，保持和平“25年可能”。可见，毛主席生前对推迟世界大战、在20世纪内维持世界和平是乐观的。

对世界战争与世界和平问题，毛泽东强调两种可能性，坚持两点论的辩证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毛泽东的科学论断既防止了把列宁、斯大林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不恰当地理解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又纠正了由于对战争的恐怖而产生祈求世界大战不要爆发的盲目情绪。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之一是事物在矛盾斗争中发展，任何事物的两重性是可以转化的。毛泽东在阐述世界大战两种可能性的时候，着重强调经过努力和斗争，可以推迟和制止新的世界大战。

第二，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能够制止世界战争。

历史唯物主义是毛主席观察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立足点。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历史是由人民大众创造的，赢得战争和制止战争归根到底取决于人民。1960年5月8日毛主席接见拉美8国朋友的时候说：“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人民是决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必然战胜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取得世界的持久和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开创了中国外交历史的新纪元。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人民外交思想，这是人类外交史的重大发展。周恩来总理对外交工作有一句极为深刻的概述：“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毛泽东身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新中国的国家元首，国务繁忙、日理万机，但他老人家仍关注着世界人民的觉醒和团结战斗。新中国建立以后，毛主席先后会见过数百起外国朋友，其中相当数量是来自亚、非、拉和世界各地的各阶层的人士。毛主席亲切地同他们进行长时间的交谈，阐述人民创造历史的真理，宣传世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斗争，能够制止战争，赢得世界持久和平的思想。像毛主席、周总理这样的国家领导人，花

费那么多的精力同世界各国各界人士广交朋友、促膝谈心，这在国际上是不多见的。

二次大战后，世界人民空前觉醒，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亚非拉人民摧毁了统治几个世纪的殖民体系，赢得了民族独立，成为国际政治中一支独立的力量；欧洲、日本的资本主义各国人民饱受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祸之苦，再不愿被卷入战争。这一切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成为反对世界大战、保卫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毛主席正是充分估计了这股力量，寄希望于世界人民，得出了新的世界大战有可能推迟和制止的重要结论。

第三，帝国主义也会总结历史经验，不敢轻易发动新的世界大战。

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在分析新的世界大战两种可能的时候，从哲理的高度总结前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教训，并具体分析战后帝国主义的若干新特点，提出了他们也会研究历史，不敢轻易发动世界大战的科学论断。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人民争取和保护世界和平的信心和决心。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历史阶段。在以后的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势力范围，争取世界霸权，曾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极大的祸害，在战争中数以千万计的群众惨死疆场，数以万亿计的物资财富毁于战乱。世界各国和全世界人民都不允许历史重演。两次世界大战对帝国主义来说也是“利小害大”、“划不来”。帝国主义体系被削弱了，世界上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发动战争是帝国主义推行霸权政策的一种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当历史经验证明世界大战的结果对帝国主义并不有利时，他们不

得不采用别的手段，避免在不利的情况下冒然挑起世界规模的战争。

50年代初，毛主席在会见来访的各国朋友时，曾与他们反复讨论过帝国主义敢不敢发动新的世界大战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来华访问时，毛主席同他进行了三次长时间的会谈，谈话的议题之一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毛主席从哲学的高度总结两次世界大战的规律，指出：在两次大战中，都是防御者胜利，进攻者失败。毛泽东具体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客观历史结果，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世界上出现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世界上出现一批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和大批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帝国主义中除了美国以外其他国家都被战争削弱了。如果再打大战，对美国来说也是划不来的。毛泽东还从更深的层次分析战争可能引起的历史结果。毛泽东认为，要搞战争的话，就要动员人民，就要使人民处于紧张状态，并且使他们学会打仗。但是人民动员起来以后，势必会产生革命。后来，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时更明确地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结果，输的不是我们这类国家，而是帝国主义国家。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将会有更多的国家得到独立和解放。毛泽东认为这是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战争的最重要的政治理由。毛主席还强调，帝国主义也会研究历史，总结教训的。因此新的世界大战不打的可能性很大。

战后几十年来的历史证明毛主席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确实在不断研究历史、总结经验，反复修改其侵略扩张的手段和方法，使之更有利于他们争霸世界的野心。美帝国主义不断挥舞核武器进行核威慑，但毕竟不敢发动核战争；帝国主义制造紧张局势，散布世界战争气氛，但

他们实际上进行的是局部战争和有限战争；当局部战争屡屡惨败以后，他们又提出“低烈度战争”，尽量避免陷入长期的局部战争泥潭。

周恩来在论述当代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和平与战争问题时，曾深刻地揭示：“帝国主义既怕和平，又怕战争。”毛泽东、周恩来从战后帝国主义的实际出发，揭露了帝国主义也有害怕世界大战、不敢发动世界大战的一面，无疑丰富了马列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为指导我国的国际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战争不可避免、世界大战可能制止的科学原理，而且在不同时期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独特精辟的见解，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比如：

二次大战刚结束不久，帝国主义害怕社会主义的影响扩大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大肆渲染“赤祸”，发动了反共、反苏的宣传战。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杜鲁门陪同下在富尔敦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一篇臭名昭著的冷战演说，他危言耸听地宣扬苏联的势力扩张，鼓动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反苏。美国利用这篇演说，大搞战争宣传。斯大林在3月13日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丘吉尔现在已站在战争煽动者的地位。”“丘吉尔的方针就是作战的方针。”当时国际上气氛相当紧张，有一种论调认为新的战争很快就会爆发。毛泽东高瞻远瞩，看出了其中的问题，指示陆定一同志写文章批驳新战争即将爆发的观点。同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国记者斯特朗，发表了重要谈话，指出美国的反苏战争宣传是一种烟幕，“他们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疯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提出了关于“中间地带”的理论，这个重要的理论是我国外交战略的思想基础之一。

1950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中朝人民经过3年浴血奋战，打败了美国侵略者。朝鲜战争的胜利具有全局性，它推迟了世界大战，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美国也得到应有的教训。毛主席说过，美国连朝鲜战争都打不赢，还能挑起世界大战？

60年代，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碰得头破血流，狼狈脱身。毛泽东指出，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强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这对全世界人民和一切反对侵略、维护和平的力量是极大的鼓舞。

70年代，毛主席提出了“三个世界”战略思想，并且认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苏联处于进攻态势，美国处于守势。正是在这种战略性判断下，我国及时调整外交战略，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侧重打击苏霸，从而使总的国际形势呈现出“大三角”的格局。中国和全世界人民一起，牵制了超级大国的挑起大规模战争的部署，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新的贡献。

二 制止战争、保卫和平的战略方针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持久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历史使命。这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需要各国人民几代人的努力奋斗。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国际上还有人称王称霸，任何人都不能抱有幻想，高枕无忧。毛泽东是当代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战略家，在他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始终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反对霸权主义，捍卫人类的和平与进步贡献了毕生精力。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同当代世界形势紧密结合在一起，确定了一条国际斗争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策略。毛泽东提出制止世界战争、维护持久和平的

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最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起来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进行坚决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9年8、9月间，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夜，毛泽东亲自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4篇评论，抨击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并且从理论上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从而提出了新中国的外交路线。毛主席指出：对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唯一办法，就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在这里，毛泽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基本原理，那就是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取决于矛盾的统一和斗争。对待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挫败它的侵略扩张计划，才能迫使它作出退让和妥协。当然这种斗争并不是僵硬和一成不变的，恰恰相反，毛泽东提倡的斗争哲学是一种极复杂的斗争艺术。在过去几十年里，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又善于斗争，始终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从而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推动了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朝着有利于和平进步的方向发展，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敬仰和爱戴，使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惊恐不安，又无可奈何。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维护持久和平的斗争中，提出了若干光辉的理论和思想，积累和总结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一切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指导我们外交斗争，争取外交工作新成就的思想基础。

第一，关于纸老虎的论断

二次大战结束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长期斗争实践得出的结论，也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毛泽

东从帝国主义所处的历史地位及其没落的趋势以及帝国主义反人民的本质出发，论述了当代帝国主义最基本的特征。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武装了中国人民，加强了革命斗争的信心。1958年12月1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全面地、科学地阐述这一论断，毛泽东说：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毛泽东的这段话，说得多好呀！近百年的历史表明，帝国主义已经或正在转化为纸老虎。20世纪初，帝国主义在世界上一统天下，横行霸道。一次大战后他们阵营中有一个薄弱环节垮台了，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二次大战后帝国主义的大后方——殖民体系崩溃了，他们的地盘大大削弱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一时间，在西方世界充满着资本主义永生的乐观情绪，但是这几年的事态表明，苏联霸权主义的瓦解并不能挽救资本主

义。今天的帝国主义仍是经济困难重重、社会极不稳定、政局动荡多变。从总体来看，帝国主义仍是纸老虎。当然就物质条件，统治经验来说，帝国主义还有实力、还能生存，它又是真老虎。1958年9月毛主席在会见外国朋友时指出，帝国主义还能咬人，打老虎要一拳一拳地打，老虎还可能活一个时期。

毛泽东把原子弹、核武器也比作纸老虎。这是从揭露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强调决定战争胜负不是从一两件武器的角度分析的。1954年10月毛主席会见尼赫鲁总理时说过，原子武器的产生标志着战争工具有质的变化，从弓箭、大炮到原子弹三个阶段。毛泽东以后反复强调核武器的破坏力，一再声明，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核战争，反对使用核武器。但是现在大部分核武器由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掌握，那么怎样才能制止核战争呢？毛泽东高屋建瓴，提出了防止核战争的设想。“毛主席早在1945年就说过：如果原子弹发展起来，许多国家都有了，原子武器战争就打不起来。”

核武器是一把双刃匕首，它既可以给对方造成极大破坏，也可能给自己带来灾难。1955年1月28日毛主席在会见外宾时，曾非常风趣地说：美国在中国投原子弹，把地球弄穿了，通到地球的那一头，就是美国。

关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的论说，在西方引起种种非议。如果我们全面领会毛泽东的思想，那就不难揭穿西方的造谣诬蔑。当别人挥舞核武器、疯狂进行核讹诈的时候；当有人散布核恐怖的时候，难道不应予以回击和揭露，而是惊慌失措地跟着核霸权跑，鹦鹉学舌地惊呼核战争要毁灭全人类吗？几十年来的历史证明，打破了核垄断、揭穿了核讹诈，就有可能迫使核超级大国走上核裁军的道路。原子弹是纸老虎，人类有能力防止核战争，最终消灭核武器。

第二，关于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策略思想

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领导人都有长期革命斗争的亲身实践，身经百战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具有卓越的斗争艺术。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不仅指挥人民解放军，而且也“指挥”着国民党军队进退败逃，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佳话。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敢于同两个超级大国斗争，气势非凡，又善于同他们斗争，一次又一次挫败了他们的反华阴谋，其高超的斗争艺术令世界惊叹！

毛泽东把敢于斗争比作是不怕鬼。毛主席认为越是怕鬼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对付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威胁，一是坚决斗争，二是不要着急。1958年10月2日毛泽东在会见东欧国家外宾时，深刻地指出：同帝国主义作斗争有两种打法，文打和武打，基本上是文打，用和平的方法打它，但也要准备武打。新中国建立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处于先是美帝、后是苏霸的包围和威胁之中，斗争一天也没有中断过。但是真的动刀动枪，称得上武打的只有一次，那就是朝鲜战争，结果把世界上的头号帝国主义打败了。中国历来坚持和平外交，不向国外派遣一兵一卒，我们的军队始终是自卫的，以确保祖国建设的和平环境。外交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意识形态斗争等文打都是极为复杂的。毛泽东、周恩来的斗争艺术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第三，关于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思想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历来重视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把它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在几十年的国际斗争中，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更加丰富。他最先提出中间地带和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团结世界上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力量。后来又提出“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团结世界上一切

反对霸权主义的力量。在具体策略的运用上还把敌对势力内部的不同派别作为工作的对象，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派。1956年1月22日毛主席在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提到美国内部也不统一，好像50支香烟，一半是共和党，一半是民主党。共和党的25支中有几派，民主党的几十支亦不统一。所以这里有文章可做。

毛泽东的这一策略思想在今天更有现实意义。在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强权政策仍然是实现和平与发展这一历史使命的主要障碍，我们在贯彻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实践中不仅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家、民族和人民共同奋斗，还要注意利用各种矛盾，分化和牵制霸权主义者和顽固势力。

毛主席在考察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总是同革命形势，总的国际格局联系起来分析的。1957年毛主席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这是对战后10多年里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革命浪潮高涨的总结。这个论断后来表明并不完全符合以后的实际。这是因为在那以后的世界形势发展出人预料，有两个想不到：一是作为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竟出现了赫鲁晓夫之类，走上了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挫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歧路。二是在60年代后，帝国主义被迫接受了殖民体系崩溃的现实，转向新殖民主义，突出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控制和掠夺，这时候国际斗争中经济因素加强。而民族解放运动在取得政治胜利以后，对如何掀起以经济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为中心的高潮，大家还没有经验。因此，从60年代起世界革命形势开始由高潮走向低潮。毛泽东以他卓越的、敏锐的洞察力觉察了这个问题。1961年1月24日毛主席在会见日本著名政治家黑田寿南的时候说：现在看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正处在第一个高峰之后和第二个高峰之前，斗争是波浪式前进的，暂时处于低潮是酝酿第二次高潮。今天读到毛

主席这一论述时，感到特别深刻，发人深思。毛主席关于革命形势出现低潮的科学预见，被以后的历史所证实，苏联的解体标志着这一低潮已到了谷底。但是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思想没有进一步深化，由于种种原因毛主席作出了另外的结论。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在“五·二〇”声明中指出：“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战略性的判断失误，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在这同时，又一度对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夺，以及他们对我国的威胁看得严重了一些，认为战争的危险增大。

邓小平同志和我国第三代领导人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在80年代，小平同志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思想，认为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新的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重点转到加快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苏联东欧剧变后，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及时指出，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我们“应按照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方针，坚持把注意力集中放在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上”。这些战略性的判断，无疑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外交思想。

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毛泽东思想又在革命实践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尽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起有伏，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将永放光芒。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演变

迟 爱 萍

所谓国际战略是指一国在较长时期内对国际格局、本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以及相应的外交、军事政策等总的认识和谋划。毛泽东是举世闻名、全党公认的战略家，他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缔造并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程中，根据国际格局和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及政治力量的变化，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一系列国际战略思想。这些思想对我国外交方针和政策的确立起着重要指导作用。探讨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对于深入研究建国以来我国对外工作发展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作为指导当今外交工作的借鉴，有着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本文仅将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并依照历史发展顺序试析三个阶段国际战略的确立、演变和基本内容，以及毛泽东国际战略对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客观作用。

一、“一边倒”的国际战略

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毛泽东为什么作出

如此抉择？这与新中国面临的国际格局有直接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体系呈现一种与战前迥然不同的面貌：西方阵营中德、意、日法西斯彻底失败，英法受到严重削弱，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社会主义由一国胜利扩展到多国胜利，形成以苏联为核心，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在地理上也连成一片的社会主义阵营，从而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对比发生很大变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很多国家相继取得独立。国际关系体系新变化引起的直接结果是：帝国主义无法维持原来的国际格局，各种国际政治力量按照力量对比的变化和主要矛盾的转化，很快形成分别以美苏为中心两大阵营对抗的新格局。面对这样的国际格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如何着手建立外交关系，能否在对抗的两大阵营面前不作倾向性的选择？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表明，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第一，在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或依附于帝国主义阵营之外，中国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早已被中国的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对此无须赘言。毛泽东针对建国前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仍幻想在中国无限制的发展资本主义、走第三条道路的思想，明确指出“积孙中山四十年和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又决定了，胜利后必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政治信仰和社会制度上的倾向性，决定了新中国外交战略上的倾向性，必然是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第二，面对美苏对峙的态势，要获得强有力的国际援助，必须表示明朗的外交态度。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从战时的盟国走向敌对，成为主要竞

争对手。美国为遏制苏联，实行“冷战政策”。1947年美国先后抛出“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1949年又策划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经济和军事上具体实施对苏联的遏制和称霸世界的计划。面对帝国主义的威胁，为维护安全、主权和国家利益，苏联和欧亚各人民民主国家从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加强联系，签订双边、多边和共同的协定、条约。1947年组成9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1949年成立经互会。后又组成华沙条约组织，以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抗衡。面对美苏的尖锐对立，想采取左右逢源的外交政策，显然行不通。保持中立，在美苏激烈竞争的国际舞台上，也难以立足。只有明朗的外交态度，才有可能赢得强有力的国际援助。

新中国需要国际援助，对此毛泽东十分明确。他认为：中国是大国，但还不是强国，经济十分落后；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首要的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但我们对经济建设不熟悉，应该向外国特别是社会主义苏联学习；建设需要有稳定的和平环境，而新中国诞生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有可能进行武装干涉。这些情况便决定了中国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方面获得援助的必要性。没有这种国际援助，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能巩固。这是新中国安全和建设所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毛泽东在外交上提出与苏联盟的一个重要依据。

第三，二次大战后，中国与美苏的实际关系决定了新中国在当时只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鉴于中苏美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合作背景，中国共产党曾一度真诚希望各抗日盟国，尤其是美国能帮助中国避免内战，促进战后中国的和平民主建设，然而，这种愿望很快被美国采取的扶蒋反共政策所打消。国民党政府发动的内战，实际上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战争。”伴随美国对

国民党政府大规模的援助和国共内战的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同美国进入了一个深刻的对抗时期。1949年春夏，中国共产党又一度怀着希望同美国外交官进行短暂接触，仍因美方原因而以失望告终。由于美国长时期地顽固地坚持错误的对华政策，把中国推向与美国对抗的地位、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奉行共同的意识形态，自建党以来一直在外交上采取与苏友好的立场。尽管毛泽东对苏联的政策在某些方面是有意见的，但总的说来，在毛泽东心目中，苏联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也是最好的朋友。对于苏联采取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援助，毛泽东念念不忘。他曾例举说：“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在1924年孙中山先生召集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在其后进行北伐战争时，苏联是当时唯一援助中国解放战争的国家。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承认中国并互派大使的国家。可以说，“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正是中国共产党与苏一贯友好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显而易见，毛泽东提出联苏抗美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绝非主观臆断，而是根据当时国际格局及中国历史和现状作出的重大决策。应该说明的是，这一国际战略在政治上的倾向是十分明朗的。正如建国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谈及此举意义时所说：“我们提出‘一边倒’，是意味着在政治上必须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团结起来，同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边，不能一脚踏在社会主义方面，一脚又跨在西方资本主义方面。所以‘一边倒’就表明我们在政治上同资产阶级国家断然分开，打消一切西方国家的幻想。”但对此绝不能作出形而上学的理解，即理解为无条件的倒向苏联

一边，或是与美的绝对对抗。事实上，中国在联苏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在反美时，也存在一定条件下讲和的一面。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所包含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是全方位的，毛泽东并没有把这一时期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仅仅局限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内，而是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根据这一方针，新中国不经谈判即同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并在此基础上同它们开展友好合作关系。

“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团结。”毛泽东认为，有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国家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为此，新中国在建国初期，十分注意与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新中国以自己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崭新的外交形象，赢得了亚、非、拉国家的信赖与支持，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因考虑帝国主义决不会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毛泽东主张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时，要和我国同社会主义及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办法上有所区别：一是不急于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二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在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以前均须经过谈判。其中与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是与新中国建交的一个基本条件。但是，对于平等互利的经济往来，我们并不拒绝。毛泽东还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在经营、管理上的长处。

对于美国，毛泽东一直主张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建国前夕，

他曾明确指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以后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话中又几次谈到，对美国，一方面我们要争取主动，公开主张与他们和平共处，建立外交关系，解决台湾问题，欢迎他们来中国；另一方面，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坚持斗争。

毛泽东明朗的“一边倒”国际战略和全方位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是不矛盾的，二者统一于为新中国创造较长时期和平环境这一战略目标，这是新中国根本利益所在。建国后，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是严峻的。美国采取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除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盘踞台湾，阻止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外；还武装入侵朝鲜，梦想以朝鲜为跳板进犯中国；它干涉印度支那国家内政，支持法国殖民主义者镇压印度支那人民，对中国南方边陲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面对来自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半岛三个方面的战争威胁，新中国必须在国际上寻找强有力的支持，同时又要广交朋友，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以免受制于人。毛泽东“一边倒”的国际战略和全方位的外交方针，正是基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独立自主外交地位两种客观需要而相结合的产物。事实表明这种结合是恰到好处的。

二、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

从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毛泽东逐步改变“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这一时期，从国际上来说，美国仍继续推行其敌视中国的政策。从国内来说，社会主义建设正处于艰难探索时期。当时的国际国内情况表明，中国仍需继续为自己创造一个安定和平的建设环境。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改变原来的联苏抗美，而不惜同时和美苏相对抗呢？这与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中苏关系的恶化有关。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对马列主义一些理论问题、国际共运某些原则问题以及当代世界形势若干重大问题，出现一些不同看法。对于这些分歧，毛泽东始终主张通过内部讨论来解决，而不应影响两国正常关系。但赫鲁晓夫从追求同美国共同主宰世界的外交战略出发，一心想把中国纳入他的战略体系，并为此不断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致使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中苏之间控制反控制的斗争日趋激烈。

面对苏方不尊重中国主权的对抗态度，“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显然已不适用了。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毛泽东断然放弃“一边倒”的国际战略，逐步把苏联作为中国的对立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

中国60年代反帝、反霸的外交格局，是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为敌的局面下被迫形成的，它是毛泽东不畏强暴、自主自强的民族气概的产物。为了与美苏压力和威胁相抗衡，中国必须在世界上寻求广泛的支持，拓宽外交局面，这便是毛泽东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的必要之所在。

毛泽东认为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所以有可能提出，还有其深刻的理论依据。

1. “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早在1946年毛泽东就提出“中间地带”的概念，它包含苏联同美国之间广大的国家，中国也在其中。到60年代，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新的变化。美苏两国都力图保持两极格局，但在他们的盟国中，独立自主的倾向开始有所发展。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在赢得独立后陆续走上中立的道路，不结盟运动应时而起并日益壮大。根据变化的世界格局，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新理论。这一理论表明美苏之外的国家都属中间地带：中间地带按照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广

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与美苏之间都有矛盾，而且随着自身力量的发展，矛盾日益加深。事情很清楚，中间地带发展的趋势将是独立于美苏之外，并能与美苏抗衡的一支强大国际政治力量的产生。这种世界格局为毛泽东实施建立世界范围内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国一方面大力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继续支持被压迫国家和民族争取和维护独立的斗争；另一方面加强对西欧和日本的工作；从而顶住了美苏的孤立政策，赢得了新中国第二次建交高潮。

2. 对于美苏当局本质的清醒认识。在美苏夹击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毅然提出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民族气概，绝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他对美苏本质深刻认识基础之上的：第一，美国的扩张政策决定它必然要失败。美国是各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也是最弱的。因为它控制的地方太多，力量分散。毛泽东作了两个形象比喻：美国是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哪个指头也动弹不得；美国就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大堆鸡蛋的人，鸡蛋堆得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所以美帝并不可怕。第二，苏联的霸权主义没有出路。他们一时好像是多数，将来会证明他们不是多数，而是少数。第三，苏联处于美国和中国之间。有一条规律，每当苏联要同美国搞政治交易时，总要搞我们一下，目的是要让美国知道，他们同中国不好，同美国好。但美苏都想称霸，根本利益互相冲突，矛盾不可解决。所以美苏合作打中国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使它们分开的东西比使它们合在一起的东西要多得多。第四，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都是纸老虎，它们内部各自都有许多矛盾，四分五裂，并不是铁板一块，貌似强大，其实很虚弱。第五，世界上“大多数不反华反共，而是亲华亲共的。”中国在长时期内，一方

面被孤立，一方面将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国家和人民的拥护。据此毛泽东论断：美苏孤立中国的政策是行不通的。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只能激发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尽快在经济和文化上赶超最发达的西方国家。反之，反华将暴露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各国反动派的真实面目，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到头来是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脚上。毛泽东上述论断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反帝、反霸的国际战略树立了坚定的信心。

应该说明的是，毛泽东在这一国际战略中，所强调和反对的分量并不是平行的，把侧重点放在反帝统一战线上，明确提出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

三、遏苏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国际战略

自新中国诞生，我国对外一直是以反对美帝为主。直至1970年毛泽东发表的“5·20”声明，主要矛头还是对着美帝。但在这之后，我们的提法逐渐变化，虽仍然提反对两霸，但主要是指向苏联霸权主义。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基辛格博士时，提出“一条线”的思想。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提出“一大片”的思想。“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思想是毛泽东新的国际战略。其主旨就是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中的所有国家，即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这是毛泽东根据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苏战略态势和中美苏三国关系的变化所作出的新的国际战略抉择。这一抉择有着重要的现实依据：

第一，美苏争霸态势易位，呈苏攻美守；在两强争霸世界的矛盾斗争中，苏联处于主要矛盾方面。

进入70年代，美苏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1974年苏联

战略核武器的数量赶上美国，在核武器运载工具和投掷重量方面已取优势，其近海防御性海军也发展成为一支能对美国造成威胁的远洋海军。这种军事力量的巨大变化，构成 70 年代美苏争夺态势变化的基础。面对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在战略上没有迅速作出调整，仍把很大一部分力量用在亚洲方面。而苏联则凭借增强的军事实力，利用美国陷入印支战争的困境，加紧在欧洲和中东等地区同美国进行争夺。致使美国从 70 年代一开始便处于同苏联争夺的战略被动地位。美苏态势的变化，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逐步把视美帝为主要敌人的注意力移到苏联方面。在 60 年代末的外宾会见中毛泽东曾几次指出，美国现在困难很大，日子不好过。进入 70 年代后毛泽东更明确指出：在苏美争夺中，苏取攻势，美取守势；苏联野心很大，想霸占欧洲、亚洲，甚至非洲北部；苏联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威胁。

第二，美国放弃长期奉行的僵硬的对华政策，为中美两国的接近提供了回旋余地。

1969 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特别感到苏联已成为美国最强有力的竞争者。于是，急迫地想通过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以增强美国对苏联的力量，进而维持全球均势，保持美国的主导地位。毛泽东作为一位富于远见的政治家，当然注意到美方所作出的姿态，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毛泽东不失时机地作出恰如其分的反应。1970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引人注目地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次日，会见的照片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种事情的发生当然不是偶然的。同年 12 月 18 日，毛泽东再次会晤斯诺，向斯诺透露了欢迎尼克松来华的意思。1971 年 7 月，基辛格秘密访华。翌年 2 月尼克松亲访中国，并在上海签订了《联合公报》。中美关系的逐步改善，不仅使双方放弃了敌对立场，而且为两国联合抗苏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第三，苏联在中苏边界大量增兵，挑起武装冲突，成为中国安全最大的威胁国。

在赫鲁晓夫当政的最后4年中，中苏边界虽发生过一些事件，但相对来说比较平静，还未大量增兵。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华政策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尤以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和进行军事遏制最为明显。1969年发生的珍宝岛和新疆铁列克提地区两起武装流血冲突，是当时中苏边境最严重的事件。在苏联日益严重的军事威胁情况下，毛泽东在国内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并在会见外宾中多次指出“苏联想控制中国”中国要准备打仗；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由于美国的衰落和与中国关系的改善，中美矛盾已从主要矛盾降到次要矛盾；而苏联的扩张和武装挑衅，则使它与中国的矛盾激化，由次要矛盾升为主要矛盾。为此，毛泽东改变了五六十年代主要是“反帝”的国际战略，适时地提出“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国际战略。这一国际战略的总体构想是：以苏联为主要对手，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同第二世界国家的联合，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

四、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客观效应及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的国际战略开展外交工作的。中国的外交实践表明，毛泽东制定的各个时期的国际战略。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总的来说是顺应国际政治经济潮流和国际形势及世界格局变化的，也符合国内政策的需要。成绩是主要的。

1. “一边倒”的国际战略的客观效应。

建国之初，在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的特定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在新中国面临美国干涉、封锁、颠覆以及利诱的严峻形势

下，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国际战略，符合国家安全和建设的需要，是正确的。依据这一国际战略，我们成功地建立和巩固了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从而在艰难的条件下，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1956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非常坦率的说：“苏联给我国的援助是非常大的。苏联革命成功后遭十几国干涉，而我国革命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并未干涉我们，并不是怕我国人民，主要是有苏联存在，这对我们鼓励很大。当时若无苏联存在，美国一定要来的。它不仅在台湾，还要到大陆来。”另外，中国在同苏联的合作中，得到了急需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知识及各种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这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 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的客观效应。

现在有的西方学者和政治家，把这一阶段中国的外交格局说成是中国“以我为中心的、内向型的思想传统的影响”，是“中国把自己推向双重的对抗之中”。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两反的外交格局实际上是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同中国为敌的严峻国际形势下被迫形成的。当时为顶住美苏的压力，与其抗衡，使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立住脚，毛泽东才提出建立反帝、反霸的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这充分表现出毛泽东不畏强暴，坚持独立自主，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的民族气概。这一国际战略的实施对中国这一阶段的对外工作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加强和发展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从1957年2月到1965年7月，中国先后同23个亚、非、拉国家建交；并同周围一些国家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若干问题，发展了睦邻友好关系。第二，积极开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在这段时期内，中国加强对西欧和日本的工作。在西欧取得的突出成果之一，就是中国和

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使美国孤立中国的图谋在西欧打开了一个缺口。对日本，中国通过民间外交的渠道，使两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和增进了两国人民间的交往和友谊，为最终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由于这两方面外交工作局面的打开，使中国顶住了美苏两家的威胁，捍卫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尊严，并逐步发展成为独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

3. “一条线”、“一大片”的国际战略的客观效应。

“一条线”、“一大片”的国际战略的实施，对于建立国际斗争新格局，促进中国同更多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这一时期，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结束了中美两国 20 多年的敌对状态，使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与日本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改善了同所有西方国家的关系，截止 1975 年，西方国家包括欧洲的绝大部分国家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除美国外几乎全部同中国建交；中国还同欧洲共同体建立了正式关系，互派驻对方的正式代表；中国继续大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在这一时期中国同亚、非、拉三大洲的 45 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除继续保持同朝鲜、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外，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大幅度改善了。总之，整个 70 年代，是中国外交大踏步前进的时期。这与毛泽东国际战略的指导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根据国际形势和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但是在大的轮廓的大变化中，也有始终未变的基本政策和观点，这些政策和观点可以说是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精华，对于我们今天的对外工作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第一，独立自主，自强自立，是毛泽东国际战略中的基本立

场。旧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长达 100 多年，从清朝到国民政府的外交都是屈辱外交，中华民族受尽了丧权辱国之苦。历史证明，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一切。对此，毛泽东是刻骨铭心的。早在 1945 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郑重地指出：“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建国前夕，毛泽东又明确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毛泽东把这一基本立场渗透到他各个阶段的国际战略中去。在政治上，他始终反对依附美苏任何一方，强调独立自主处理本国事务，反对大国的控制和干涉。在经济上，他主张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强调建立不依赖大国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认为只有经济上的独立，才有政治上的独立。在对外学习上，他主张独立思考，反对生搬硬套；认为对外国经验的学习，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必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加以研究。这些思想仍然是我们今天对外工作应该遵循的原则。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所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第二，为新中国创建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毛泽东国际战略中始终一贯的国家目标。列宁依据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将长期并存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和平共处思想，目的在于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环境。毛泽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坚持并发展了列宁这一思想。在理论上他反复强调中国的建设需要和平环境的重要性。认为“保持和平环境，这是大家最大利益”，是我们对外工作的主要目标。在对外交往中“应该把思想体系上的分歧和政治上的合作分别开来。思想体系上的分歧不应该妨碍一国与另一国在政治上的合作。”中国应该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谈判建立外交关

系。从实践上来看，毛泽东三个阶段的国际战略的实施无不是以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国际和平环境为目标的。当今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这决定了中国仍然要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外交的根本目标。

第三，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是毛泽东国际战略中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认为：中国同亚、非、拉国家在历史上都遭到过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有着类似的历史遭遇；独立后又面临着发展经济，防止帝国主义颠覆的相同历史任务，因此中国应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中国人民要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并且要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党在外交工作上，依然坚定不移地奉行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的方针。邓小平在1984年5月会见外宾时明确说：“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第四，密切关注世界形势和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及时调整本国的对外政策，是毛泽东制定国际战略的基本方法。纵观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十分重视国际形势的变化，注意分析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矛盾关系的演变，并依此精辟地概括国际格局，适时调整本国的国际战略。这一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形势的发展，制订出战略策略并不断加以调整的方法，为中国提供了在国际舞台上生动活泼地施展身手的可能性。面对当今风云变幻、扑朔迷离的国际局势，我们更需要很好借鉴毛泽东制定国际战略的辩证科学方法，及时调整外交政策，以使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不受侵害。

第五，团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

战线，这是毛泽东国际战略中的主要策略手段。毛泽东在国际战略的制定中，很注意在认识世界格局和战略格局的同时抓主要矛盾，结成统一战线。新中国建立后长时期里的反对美帝的统一战线和 70 年代后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都是这方面的突出实践，收到了好的效果。进入 80 年代，由于我们正确执行与两个超级大国都不结盟，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分别同它们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外交政策。但在当前维护世界和平与争取发展的问题上，作为主要和平力量和迫切谋求发展的第三世界各国仍需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国际力量，排除一些障碍，以谋求和平与发展事业的进展。这说明毛泽东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进入 80 年代国际形势出现了转折性变化。全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和平，二是发展。与此同时，国内形势也起了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把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党对国际战略又作了一次重大调整，其核心是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一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经过综合客观分析，转变了对战争危险估计过高的看法，作出了和平可以维护的切实判断；二是调整对外政策，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这次重大调整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新的形势下对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坚持和发展。

毛泽东对外战略中掌握主动的思想

谢 益 显

新中国诞生先后处于美帝国主义的敌视、对抗和苏联霸权主义的军事威胁之下，对外关系始终笼罩于严重的斗争气氛之中。学习毛泽东外交思想，我们需要强调毛泽东对外战略中掌握主动的思想，它曾经对中国人民在外交斗争和对外事务取得不断胜利和巨大成绩方面，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

讲到斗争，争取主动是十分重要的。毛泽东在谈到主动性在军事斗争中的重要性时说：“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去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人们知道，在斗争中，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因而，外交斗争中如何做到掌握主动，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毛泽东在对外战略中掌握主动的思想，不是离开毛泽东关于对外的立场、战略，以及有关任务、方针而孤立地呈现的。下面结合有关史实予以阐明。

从独立自主对待国际事务的思想中取得主动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十分重视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实践。这是长时期里苏联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分量和作用所决定的。直至二次大战结束，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反抗国内的阶级压迫和进行抗日民族战争；在广阔视野的国际事务方面则曾经往往“以俄为师”。可是，二次大战结束后，即使在最初的日子里，复杂的国际形势及其对中国国内政治的直接影响，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国际事务，包括有苏联参加的国际活动，进行独立的观察和判断。1945年12月27日发表的苏美英外长莫斯科会议的公报表示，三外长“同意在（蒋介石）国民政府下有一统一与民主之中国，国民政府各级机构中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及内部冲突之停止，均属必要。”这种妥协性语言，既强调统一，又突出民主，似乎不偏不倚；而且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利用其中关于民主和停止冲突之语句来提出自己的正当要求。可是，当时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内战已经打响，而且日趋扩大。这种内战又是蒋介石在要求“统一”的名义下进行的。显然国际事务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更为直接明显了，而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妥善对待有关国际问题，使之有利于中国人民，而不是相反。

1946年4月毛泽东写了一份给党中央部分领导同志传阅的文件。文件在指出了西方宣传的那种反苏战争危险是“必能克服”的之后，指出美英法同苏联之间是能够“在若干问题上，包括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文件不但独立地这样表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世人关心的大战危险及妥协的问题的看法，还明白地指出，“这种妥协，并

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

这份文件的思想，直接地是要中国人民在当时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做好思想准备，不要因为可能出现国际妥协而迷茫、动摇。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斗争中保持了极大的主动。

更其可贵的是，这份文件的思想具有更深层的含义，即：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看待苏联的对外政策问题。现在问题已经摆到面前，对于即使有苏联参与其间的国际活动，中国共产党人也不应是一切照搬苏联，凡是事涉中国，则中国的事情一定要由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来决定。二次大战后，中国共产党人被推上了中国政治中心的历史舞台，对外事务也正在成为他们日益关心的方面，不久他们就掌握了国家政权；正是在这样的重要时刻，该文件所闪烁的毛泽东思想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渡过了一个历史阶段，从此对外事务方面不再需要唯苏联是瞻。这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取得了极大的主动。这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对主要对手进行基本分析确定

基本立场从而取得主动

新中国诞生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于6月间向滞留南京的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间接表示，欢迎他去北平过生日。司徒雷登因杜鲁门总统的严禁而未能成行。后来美国人对此广为责难，认为美国政府没有重视新中国领导人所递送的这一有价值的信息，失去了一次同新中国增加了解、有所疏通和改善关系的机会。但也有美国人说，鉴于是年“七一”，中国即发表毛泽东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阐明新中国对美苏的基本立场，因此这一

信息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其实，新中国领导人在这两件事上做得都是很正确的；而且人们还可从中看出，正是由于当时新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已经确定了基本立场，从而处于主动的地位。

首先，经由当时南京外事处负责人向司徒雷登递送信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作出的一个重大的行动，因为，它的确以巧妙的形式开启了一个新中国领导人同美国官方可以直接接触的渠道。要紧的是这一政策性行为在中国的对美政策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并没有拒美国于千里之外，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递送过去的这一信息，并不能保证美国政府一定给予善意的回应，因此这只是一种可能性。

而《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所阐明的是中国领导人对有关问题所明确肯定了的的基本立场。该文表示了新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基本看法：“它要奴役全世界，它用武器帮助蒋介石杀戮了几百万中国人”；而且美国等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正在“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妨碍我们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文章也表示了对苏联的看法，它是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的那个援助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所不可缺少的各种国际援助力量中居于头一位的那个国家。文章明确地表示，“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这是我们从已有历史的客观分析中得出的从战略上对美苏的基本看法。显然，对美国而言，从这里产生了中国对美国的基本政策。

由此可见，邀请司徒雷登去北平所争取出现的某种可能性，决不曾代替中国人对美国的基本看法和政策，也并不产生延迟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需要。而持有这种基本看法和政策，并不妨碍中国人去试探和争取同美国建立上层接触的可能性。这正

是中国人处于主动的表现。主动来自于对问题的基本分析，以及由此而明确持有的基本立场。

面对侵略者对邻国发动侵略战争时 援助邻国、保卫自己才最主动

1950年6月美国干涉在朝鲜发生的一场内战。10月初，美国把干涉战争变成了一场侵略小国的战争，侵略军大举越过“三八线”，在取得压倒的军事优势之后占领了北朝鲜，随即直扑中朝边境，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怎么办？当时毛泽东在郑重考虑后决定在人民群众中展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中国人民并派出志愿军进入朝鲜。

撼人心魄的这一决定的作出，可明显看出毛泽东掌握主动的思想的运用。中国这样做，要承担人力、财力、物力的巨大牺牲。中国人民在几十年国内外革命战争之后，刚有机会休养生息，又投入这样一场战争，是否正确，这是人们关心的。

中国人民如果投入朝鲜战争，其正义性是毫无问题的。因为，美国军队从干涉朝鲜内战到侵占北朝鲜，都是在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于是可以说，美国军队挟胜利之余威，冲过界河，肆虐中国，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这不过是其反共反社会主义行动的继续而已。所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对一个邻国的侵略，援朝抗美，本已名正言顺，加上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是卫国保家的大义之所在，其正义性是无可怀疑的。

问题在于有人总感觉美国未必会打到中国来。有了这种苟安心理，也就会产生“先顾好自己”的想法。而毛泽东则说：“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

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周恩来说过：“毛主席认为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不下决心，不仅朝鲜被占领，就是我们自己的建设也将成为不可能。”

于是问题就清楚了，一是美帝国主义未必不打过来，结合当时美国一些官方人士的反华叫嚣和反华心理来看，我们应作如是观。二是，即使美国暂不大举进攻中国，当时侵略战争的阵势已经摆开；中国人势将生活在一种时时刻刻准备挨打的心理状态之下，这样中国人将是十分被动的。中国人民所从事的是反侵略，是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人必须掌握主动。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所教导于我们的。正是因此，毛泽东说：“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当然，中国人民在反对国内外敌人的长期斗争的磨炼中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力量和自信；否则，主动是谈不上的。

对重大问题态度明朗有助于 堵住外界的幻想和妄想，掌握主动

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刚结束，中国人民提出了“解放台湾的任务”。毛泽东指出这本应在1953年朝鲜停战以后就提出，现在如不及时提出，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鉴于解放台湾的提出，人们并不认为是一个可以一蹴即就的任务，因此，宣告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它的实际意义在于宣告了，中国人民绝不动摇使台湾统一于祖国的立场；以及中国人民将投身于努力使之实现的过程。问题就是要这样旗帜鲜明地提出来。在这之后，1955年初，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的军事行

动展开了。同年8月，开始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其漫长的过程中，要求美国方面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其军事力量，一直是中国方面所坚持的事项。1956年2月，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倡议提了出来。从50年代起，为台湾统一于祖国，中国人民从军事、外交、宣传等方面作了许多有效的努力。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都从中看到，中国人民对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的统一，是坚定的，任何人想从中国享有的主权中把台湾分割出去，是一定要碰壁的。就这点而言，我们取得了极大的主动，即：我们表示了明确的立场和态度，这有助于堵住外国觊觎中国对台湾的主权的任何幻想和妄想。

在台湾统一于祖国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如果我们不是及时地表明我们鲜明的立场和明朗的态度，那将给我们带来许多不必要的被动。毛泽东关于否则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的说法，使我们又一次学到了掌握主动的重要性。

坚持原则，想得透彻，立于主动

新中国建立后，站在被压迫人民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支持他们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这是建国初的《共同纲领》在对外政策方面就规定了的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原则。中国人民清楚这是正义的；而且懂得，这样做从根本上说来，对新中国的独立和安全是有益的。中国人民从一开始就实践了这些规定。如：对正在艰苦地为独立而斗争着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是新中国第一个予以外交承认；对有可能被美国长期占领的北朝鲜，是新中国直接给予了军事的支援。但是，新中国采取这样的立场，就要招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敌视。后来人们

清楚地看到，美帝国主义在遏制共产主义的旗号下，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冷战和战争威胁，不仅针对苏联，也明显地针对中国。例如：美国不但敌视新中国，而且同中国周围的许多国家订立了各种军事同盟，虎视眈眈地对新中国构成了一个军事包围圈。因此，中国人民必须郑重对待这个问题。毛泽东思想告诉我们，要把问题想“透彻”。

毛泽东认为，首先，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爱和平、反侵略的人民对它的斗争。他提出了著名的“绞索”思想，认为美帝国主义到处侵略，就像到处给自己套上了绞索，“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受侵略的国家的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和平反侵略的人民”。在这里美帝国主义是被动的。

毛泽东还认为，在战后的国际形势下，帝国主义发动大战的危险是能够克服的。在1946年4月和1950年6月毛泽东都曾作如是说。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举出十件大事来说明战后世界上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力量的长足进展；还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论断。世界上资本主义力量在总体上虽然超过社会主义各国的力量，但毛泽东的这一论断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是历史潮流，社会主义与这股潮流站在一起，帝国主义想要加以阻挡，但无能为力。毛泽东正是在当时这样的形势下，在国际交往中还大力宣讲他的著名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以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是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支持和平、民主、民族独立、社会主义力量进行反帝、反殖的正义斗争的时候，是不应该被美帝国主义其势汹汹的战争威胁所吓倒的。

毛泽东说：“我们有条：第一条坚决反对战争；第二条，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就同它打，把问题这样想透了就不

害怕了。”“人类是消灭不了的”。“我们不要打仗，是帝国主义要打仗。”“把问题讲彻底了，反倒可以睡得安稳些。”

70年代初，一方面，美国承认侵越战争失败，被迫从国外进行一定的军事收缩；另一方面，旧殖民体系瓦解，世界上几乎全是独立国家了。这样，国际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在这之前，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人民正在广泛地进行反对侵略战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毛泽东的这些不怕战争威胁的观点曾经给他们以极大的鼓舞。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尽管战术上要认真对待美国的战争威胁，但在对外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明白地继续坚持有原则的政策，不怕美国的敌视和威胁，举措若定，非常主动。这是中国人民在回顾历史时始终感到欣幸的。

政策明确，说话算数， 树立郑重形象，大为主动

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争端，中国政府一直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平等协商来解决。当1962年10月至11月间，中印之间因边界问题发生武装冲突，中国政府没有将军事行动的结果视作既成事实。中国既没有改变谈判解决这一具体争端的基本立场，也没有提高谈判要价，而是仍然坚持谈判要求，自动将军队撤回到军事冲突发生前中国一直强调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并相离20公里的位置上。同印度发生武装冲突不是中国的政策，对中国来说是被迫发生的。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中，印度被看作中国的朋友，当时反对美国的军事包围和侵略威胁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任务，同印度打仗这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对印度的根本政策和谈判解决历史争端的方针都是明确的。现在，中国以自动回复到基本上是冲突发生

前双方的处境，来表明自己主张谈判是说话算数的。作为受亏待的一方，自动将军事胜利“果实”奉还对方，而这份“果实”又是其后将要在谈判中予以争取的，这种情形在历史上是没有见到过的。但是，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郑重形象：“言必信，行必果”，说话算数，给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写下的极富特色的历史的一页。如果说，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关系中说话算数人们是早有好评，那么，这新的一页则使新中国的郑重形象更为鲜明地树立起来。

这样做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从这里又一次看到毛泽东思想的运用。当人们认识到中国的政策是郑重的、说话是算数的时候，中国就获得一种威信和力量，从而使自己能够在具体的对外关系中处于一种非常主动的地位。1965年美国军队侵入越南南方，但是其决策人即使一再策划图谋而最终也未敢作出侵入越南北方，把战争打到中国身边的决定。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不能不顾虑中国人民已经明确表示的反侵略立场和坚决为越南人民后盾的声明。显然，对方的被动也就是自己方面的主动。

从最坏处着想、做好准备也能收到主动之功

1965年9月29日，中国外长陈毅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作了一个让四面八方都来吧，中国人不怕的声明。这一惊人的壮语毛泽东是给予肯定的。毛泽东自己对来访的外宾也说过类似的话：“打就打嘛！”“准备没有坏处。”“你不准备，人家就欺侮你，你准备好了，它就可能不来，打来了也不怕，有办法。”当时的答案就是要应付可能的四面八方的进攻。当时中国有一个总的战略口号：“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其中就包含着这个精神。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人当初在一种壮烈的心情下准备抵御外侮，真是7亿人民奋起，众志成城，在那几年困难的处境下，也没有发生外国的进攻，中国终究安全地挺过来了。虽然，中国只是自卫防御，任何外国要进攻中国就“师出无名”，又虽然，各个与中国对立的大国各有自己的种种矛盾关系的羁绊，要想联合起来进攻中国也几乎不可能，但是，中国主动摆好了积极防御的姿态，谁都不想也不敢去沾一下中国这个火烫的大红炉，终究也是一个原因。

战略布局最要紧，统一战线最主动

以军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为标志而步入霸权主义角逐场的苏联，紧接着“珍宝岛事件”之后，于1969年秋伸出触须，试探着要为袭击中国核基地作好准备。这一回中国大陆面临的战争威胁可以说比以前更加具有可捉摸性了。人们于是看到毛泽东战略思想中逐渐出现的重要调整。首先，中国改善了同南斯拉夫的关系。由于中国在同苏联的“大辩论”中，南斯拉夫曾经被当作首要的靶子，这一调整逻辑地说明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观上的升华要求，是不应影响和妨碍国际领域里根据实际利害关系确定战略上的敌友配置的。这是指导思想上的重要变化。其次，当美国承认要在侵越战争中收缩，并向中国一再递送改善关系的信息之后，中国决定邀请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这一调整说明，中国在战略方向上改变了1965年以来向美苏“两面开弓”的做法。显然，其影响将是深远的。再次，毛泽东于不久之后就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作为人们主要需要对付的“第一世界”，同时又明确侧重反对对中国有现实的战争威胁

的苏联霸权主义。至此，中国的战略布局又回到了人们熟悉的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上来了。显然，在国际社会中只要现实地存在着主要敌手（直至 80 年代初，对中国来说这一情况一直存在着），按照统一战线要求来进行战略布局，具有关键性的重要意义。于是从 70 年代初以后，中国的矫捷身姿在国际舞台上又为人们所常见了。

80 年代初以后，中国明确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两大战略主题。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显然与战后的长时期里相比，有了不同的特色。过去的经验教训已成为今天外交思想和智慧方面的财富。毛泽东对外战略中掌握主动的思想，值得我们很好学习、记取和结合实际情况地加以运用。

学习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 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周 溢 潢

独立自主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方针，也是创建社会主义新型外交的基本立场。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和英明的决策。在纪念他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重温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和决策，对我们进一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使我国外交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与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起，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从清朝到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是丧权辱国的外交。周恩来总理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曾指出：“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 100 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

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最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把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作为民主革命时期

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理所当然地把独立自主作为外交工作的基本立场。

早在1947年12月，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就指出：“我们自己的命运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软弱无能的思想。”1949年6月15日，他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又充满激情地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1949年春、夏之间，毛主席作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伟大决策，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奠定了基础。

“另起炉灶”，指的是完全抛弃半殖民地中国的外交关系、传统和习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把一切驻在国民党政府的各国外交使节都看成是普通的外国侨民，不承认他们的外交官资格；主张一切愿意与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应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建立新的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意思是不急于解决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承认和建交问题，而首先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残余势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两条方针，使我们的国家从一开始就处于战略上的主动地位，体现了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的完全独立的愿望。根据毛主席的上述决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维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订，或重订。”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大无畏的气概为新中国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外交，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地登上了世界舞台，也为世界被压迫人民和民族树立了英雄形象。

二、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

美帝国主义不甘心被赶出中国大陆，企图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的同时，派遣武装力量进入台湾海峡。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将战火烧到了我国东北边界。

面对世界头号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敢不敢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来说，确实是一个极为严峻的考验。当时新中国刚刚诞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在这种情况下，要和有强大武装力量的美军在战场上进行较量，困难是极为严重的。中央经过反复研究，毛泽东下决心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表现了对帝国主义侵略行为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极大勇气。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以后，同朝鲜人民军一道，经过殊死搏斗，把美国军队从中朝边境赶回到三八线附近。美国舆论惊呼“这是美国陆军史上的最大败绩”。1951年10月22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讲到抗美援朝战争时说：“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乎敌人的意料之

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今后的世界必须是人民的世界，世界各国必须由各国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决不能再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横行霸道的世界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出了国威、军威，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美帝国主义的威风，确立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使台湾问题成为中国维护自己的独立、主权和安全而同美国进行斗争的一大主题。朝鲜停战后，一些美国人妄图使台湾“中立”、“托管”，将之置于美国手中。党中央及时识破了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毛主席签署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58年8月23日开始炮轰金门、马祖。10月6日，发表了由毛主席亲自起草的中国国防部长《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对金门停止炮击7天，但以没有美国护航为条件。10月25日发表《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希望台湾负责当局不要屈服于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要提防“皇姑屯事件”再演，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阴谋。

大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再一次显示了毛泽东反对侵略的大无畏气概。1965年，美国对越南发动侵略战争，并加紧对越南北方的海空袭击，同时露骨地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4月2日，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转告四点，指出“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原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将进得来，出不去。”中国除继续向越南提供大量物资援助外，还应越南的要求，先后派出支援部队总计32万余人。越南人民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主持正义的人民的支援下，经过艰苦斗争，

终于迫使美军于 1973 年从越南撤走，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

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在长达 20 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一直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1958 年 6 月毛主席在接见我国驻外大使时说：“我一向所想的是同美国闹成僵局 20 年，对我们有利。一定要美国梳妆打扮送上门来，使他们对华感到出乎意外。你不承认，总有一天你会承认的，一百零一年后一定会承认的。”结果到了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美国总统尼克松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国表示愿意和解。毛泽东决定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1971 年 7 月 9 日，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 年 2 月 21 日，尼克松访问中国；1973 年 5 月，各自在对方的首都设立联络处；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这是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方针的一个伟大胜利。

1958 年，苏联连续向中国提出两项损害中国主权的建议，即在中国领土上建一座由中苏合资实际上由苏方控制的指挥潜艇的长波电台和建立共同潜艇舰队，显示出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意图。党中央和毛主席认为这是涉及主权的政治问题，坚决予以抵制。毛主席对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

1960 年 6 月，赫鲁晓夫利用 51 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策划了“布加勒斯特会议”，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围攻，搞突然袭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表示：“宁可被碾得粉碎也不屈服。”之后，苏联就进一步在国家关系方面对中国加大压力，其中最严重的一个步骤是于 1960 年 7 月突然召回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和顾问，给中国建设造成严重困难和巨大损失，但中国领导人表示决不屈服于苏联的压力。1960 年 9 月中苏两党高级会谈中，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坦率地

说：“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了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影响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外贸计划，这些计划都要重新进行安排。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

此外，苏联还企图在核武器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控制，撕毁有关协定，要中国依赖它的“核保护伞”，从而听命于它。中国政府在答复苏联政府的备忘录中尖锐地指出：苏联的那一套是要“保持自己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垄断地位”，“中国人民决不承认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大国垄断世界核力量，对别的国家任意发号施令的特权”。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次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终于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核力量。

60年代初，苏联还不断挑起边境冲突，中国边防人员在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之后，苏联方面扬言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对我国进行核讹诈。中国政府于10月7日庄严声明：“中国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的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七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抵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由于我立场坚定，不为所动，迫使苏联不得不与我继续进行边界谈判。

三、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来华商谈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关系的印度代表团时，根据毛主席的思想，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6月，中印、中缅总理在联合声明中共同倡导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

准则，现在已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概括了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中的本质特征，其核心就是既保持本国的独立自主，同时也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

毛主席在对外交往中，坚定不移地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在接见来华访问的外宾时反复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不论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的异同，都应一律平等、互相尊重、友好合作、和睦相处。他特别尊重小国、穷国的来宾，对他们平等相待，热诚交谈，对他们的困难给予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力所能及的援助，使他们感到中国是最可信赖的朋友。

四、独立自主思想在新形势下的丰富发展

在新的形势下，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庄严宣告：“中国的事情要按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也指出：“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在涉及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我们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

近年来，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西藏问题、人口政策和售台武器等问题上干涉我国内政。对此，我国政府进行了坚决斗争。我们顶住了它们从各个方面对我们的压力，打破了

它们对我们的“制裁”，经受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我们的冲击，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我国不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独立自主地处理国际问题。对待国际上的一切问题，我国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国际法准则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

我国在外交工作中，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交往中，我们绝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同样，也绝不允许别的国家将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中国。

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仍然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我们在政治上相互支持，在经济上按照“平等互利、讲究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四项原则，进行卓有成效的互利合作。在国际事务中，我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磋商与协调，为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而共同努力。

我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开展国际合作。我们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维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在联合国事务中，我国一贯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原则，伸张正义，同时又不失灵活，在必要时照顾现实，作出适当妥协。

我国积极倡导建立国际新秩序。我们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国际新秩序的核心应当是不干涉别国内政，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独立自主的，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

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不是要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

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扩大与外国在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吸收外国资金、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及其他一切先进的东西，为我国的四个现代化服务。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就是对世界上所有国家开放，既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既包括西方发达国家，也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我们进一步贯彻执行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国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逐步加强，声望不断提高，影响日益扩大。不管今后国际形势如何发展，我国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外交工作新局面，争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

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建交原则 与创建新型外交的重大思想决策

黄 嘉 华

今年是毛主席诞辰 100 周年。回想中国人民革命所走过的艰难历程，回想我们的祖国怎样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破旧的中国一变而成真正独立自主、欣欣向荣的新中国，回想近半个世纪以来新中国在国际上所享有的重要地位和崇高声望，人们深切怀念毛主席，更加珍视他老人家的伟大学说和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每当我们重温它、研究它，就能从中受到很大启发。

毛主席关于新中国的建交原则，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对于创建我国的新型外交，对于 40 多年来我国的外交事业，对于当代国际关系以及现代国际法的发展，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一 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是毛主席建交原则的根本立足点

毛主席关于中国的建交原则，是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是以中国人民革命的宏伟目标为依据，提出和逐步完善的。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们都清楚，在新中国诞生之前，中国 100 余年的历史是受尽帝国主义侵略和欺侮的历史，是一部令人痛心的屈辱的历史。那时，旧中国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对内欺压人民，对外奉行丧权辱国的外交，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和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了长期、艰苦、英勇的斗争。

1945 年，正当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刻，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中国人民革命的目标和前途问题。他说：“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就是说，光明之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我们的任务是，“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而奋斗”。为此，毛主席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希望国民党政府鉴于世界大势之所趋，中国人民人心之所向，毅然改变其错误的现行政策，使抗日战争获得胜利，使中国人民少受痛苦，使新中国早日诞生。毛主席还语重心长地指出：“100 多年来无数先烈所怀抱的这一宏大志愿，一定要由我们这一

代人去实现。谁要阻止，到底是阻止不了的。”

正是基于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这一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毛主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基本原则，那就是：“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和友谊这些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同时，向全世界宣告：“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毛主席的以上论述，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渴望独立和国际平等地位，渴望和平和增进同各国人民的友谊，渴望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毛主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基本原则，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外交形成鲜明的对比。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的愿望根本置之不顾，依然坚持其独裁和内战方针，依仗美国的支持，悍然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对外大量出卖中国的权益，同美国签订了包括《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在内的一系列公开或秘密的丧权辱国条约。这时的蒋介石统治集团已是更加腐败，其所作所为受到人们的痛恨。因此，1947年10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反攻之际，毛主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同时进一步阐明了对外政策：即“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时期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1949年春，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以非常生动、形象的语言，高度概括了新中国外交方针，即：“另起炉灶”，那就是同旧中国丧权辱国外交一刀两断，不承认国民党政

府同任何外国建立的旧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那就是废除国民党时期的一切卖国条约，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残余势力，先把“屋子”打扫干净，然后再请外国客人进来，以免使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受到影响。1949年6月15日，毛主席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郑重向全世界宣告：“任何外国政府只要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这是毛主席关于新中国建交原则的核心思想，是创建新中国新型外交的重大决策。

人们可以想象，对于一个长期遭受外来欺侮、内战连绵不断、经济濒临崩溃的贫弱的中国来说，提出这样的新的建交思想和原则，是需要多大的气魄、勇气和决心！人们还可以想象，在当时那样贫困落后、疮痍满目的国土上刚刚建立的新中国，要使这一建交原则真正得以实现，又是一项多么艰巨和复杂的任务！

二 新中国的建交原则和实践是国际关系 和国际法上的一大创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实践焕然一新，以真正独立自主的姿态进入国际舞台。

毛主席关于外交政策和建交原则的思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得到完整而明确的表述。《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是，为保障本国独立、

自由和领土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

当时，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是十分严峻的。美国不仅拒不承认新中国，而且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并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目的是，对新中国在政治上孤立、在经济上封锁、在军事上包围，从而使新中国政权无法立足。关于这一点，美国在1958年8月11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曾毫不隐晦地声称：“美国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不是永久性的，它有朝一日总会取消的。通过不给北京外交上承认的做法，来加速这种消失的过程。”面对这样的形势，新中国将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国家对自己的承认问题？如何废除国民党政府的旧外交关系？如何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所有这些，既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又是复杂的国际法问题。

首先，谈第一个问题，即承认新中国的问题。

关于新中国的承认问题，无论就其政治意义和影响，还是它所经历的曲折过程和复杂性来看，在国际关系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西方传统国际法在承认新诞生的国家问题上曾盛行一种学说或主张，一是“构成说”，认为一个新国家的出现或新政府的成立，只有得到所谓“国际承认”，才能成为国际法的主体，才能享有国际法上的权利。这种学说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当时西方列强垄断了国际事务，形成一种所谓排他性的“俱乐部”，谁想进入这个俱乐部，必须得到他们的“承认”，其主要目的是排斥欧洲以外的“非文明国家”进入国际社会，享有国际法上的权利承认成为一种“恩赐”或“恩准”。另一种主张，即所谓“宣告说”，认为一个国

家或政府一旦事实上存在，也就是法律上存在，“承认”仅仅是宣告这种存在的事实。这两种主张，从理论上讲，前者是强权政治的一种表现，后者显然较为合理；从西方国家的外交实践看，这两者盛行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并被灵活运用于不同的场合和对象。但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上述“构成说”往往在他们对待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承认问题上突出地表现出来。

新中国从国家本质来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国际法的角度看，是有史以来的中国的延续，其法律人格并未改变，也不需要外国的承认。当然，新中国政府是取代旧政府的新政府，这就有个承认问题，即承认新政府问题。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因此，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是承认新中国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问题。

根据毛主席的有关论述和我国的外交实践，新中国在对待承认问题上具有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特点：

1. 承认应当是平等的。承认作为一种政治态度，是承认国或政府对被承认国或政府表示支持的一种积极姿态。根据现代国际法的主权平等原则，承认作为国际法上的一项制度，决不是一种“恩赐”，而是应当以平等为基础。当然，承认并非一项绝对的义务，你可以不承认或暂时不承认一个新国家或新政府，但是，却不能因此而否认对方根据国际法所应享有的各项权利。

早在1949年3月，毛主席就指出：“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民革命的反帝性质，使得帝国主义极端仇视这个革命，竭尽全力地帮助国民党。”它们“决不能很快就以平等态度对待我们”。毛主席的这一预断是完全正确的。

当新中国政府一成立，美国等就拒不予以承认。它们还提出种种极不合理的要求作为承认的条件，如不得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取消外国在华特权等等，实际上是企图胁迫中国以保持半殖民地地位为代价来换取它们的承认。这是新中国决不能接受的。所以，毛主席说：“对待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也不要急于去解决。”周总理曾经说过：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这就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

承认应当平等，这是新中国对待承认问题的一项重要原则。附加任何有损于国家主权的条件的承认，是违反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是新中国决不能同意和接受的。

2. 承认应当是相互的。承认作为国际法上的一项制度，并不是单方面的。它既不是什么“恩赐”，也不仅仅是个“宣告”。其含义应当是承认国与被承认国的政府之间相互愿意保持或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一种意愿。双方都有这种意愿，就有导致外交关系的建立。因此，承认无论采取什么形式，都应当是相互的。即使对承认国来说，也只有通过承认，才能在与被承认国的关系中行使其合法权利。

美国等拒不承认新中国，并对新中国抱敌视态度。既然你不承认我，当然我也可不承认你，这是符合国际法上的主权平等原则的。按中国的一句老话，叫做“礼尚往来”。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

义国家在中国的合法的地位。”周总理在新中国政府成立后的一次讲话中，对于毛主席的这一思想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旧中国政府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所以，“凡是没有承认我们的国家，我们一概不承认它们的大使馆、领事馆和外交官的地位，只把它们的外交官当作侨民看待，享受法律保护。他们犯了法，我们一样依法办事。”

3. 承认应当是真诚的。承认是相互的，这是新中国在外交和国际法实践上的一个创新。它使承认真正建立在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上，从而有利于推动正常国际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承认新中国政府，关键在于承认它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从而才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英国在1950年1月6日的照会中就曾表示，愿意与新中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它在台湾却保留了一个领事馆，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投弃权票，而且不尊重在香港的中国国家财产的豁免权。也就是说，它不是真正诚意，而是半心半意承认我们。因此，直至1954年6月7日，中英之间仅仅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即“半建交”状态。到了1972年3月20日，英国在中英联合公报中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并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中英双方才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挪威态度则不同，它于1954年在联大投票赞成恢复我国合法席位，中挪即于当年10月5日正式建交。法国在1963年戴高乐执政后，表示愿意承认新中国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但当时考虑到法方的要求和实际情况，中法双方达成先宣布建交从而导致法国与台湾当局断交的默契，中法遂于1964年1月27日宣布正式建交。

第二个问题，如何处理旧条约问题。

前面提到美国等不承认我国的所谓“理由”是：“中国缺乏遵守国际义务的意愿”，这就涉及旧条约问题。

传统国际法有一条重要原则，即“条约必须遵守”。但是，旧中国长期以来是被西方列强所侵略、控制的国家，这种控制权是以大量不平等条约为基础，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所有这些在武力胁迫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是违反国家主权原则的。如果我们全盘接受下来，新中国的主权将化为乌有，独立自主将是一句空话，中国人民也将继续陷入苦难之中。

记得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初，西方列强就曾提出这类要求，作为承认的条件，当时的南京政府为了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援，曾经表示接受上述条件。然而结果是，西方列强并未因而协助革命，反而“援助”镇压革命，历史的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新中国政府对待旧条约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根据毛主席关于“废除旧政府的一切卖国条约”的方针，我国在 1949 年 10 月公布的《共同纲领》规定：对于旧中国政府同外国政府签订的各种条约和协定，新中国政府需“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实践证明，我国政府所废除的，正是那些“已经并将继续使中国陷入内乱、丧权辱国、殖民地化和崩溃危机中”的条约。至于那些平等的、友好的条约，新中国当然予以承认，这种区别对待的方针，既维护了国际法上的主权原则，又根据中国实际状况，照顾到外国政府的合法权益，因而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联合国于 1969 年制订的《条约法公约》中就明确规定：以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订立的条约，是非法无效的。

应当强调指出：新中国政府成立后同许多外国签订了大量的条约和协定。对于所有这些条约，中国政府一向恪守信义，严格

遵守。这在国际上是有目共睹的。

第三个问题，关于重建新外交关系问题。

根据毛主席“另起炉灶”的方针，新中国政府在不承认旧外交关系的同时，提出了“谈判建交”的方针。建交要通过谈判，表明我们在外交上的严肃性，看看对方是否真有诚意和真能以诚相待，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否真的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中美两国相互承认和建交经历了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自1955年始，中美之间进行了大使级谈判，直至1970年，断断续续谈了15年。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达成协议，美国在《上海公报》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接着，在1973年双方同意在各自首都设立联络处；最后，在1978年12月16日的中美《联合公报》中，双方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同时，美国声明终止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并将在4个月内从台湾撤出其军队。至此，中美之间的承认与建交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从新中国诞生到中美两国正式建交，这中间经历了近30年，这是毛主席建交思想和原则不断取得胜利的30年，是新中国真正独立自主处理国际事务的30年，也是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重新认识中国的30年。

人们不难看出，新中国在建交问题上的原则、方针和做法，在国际关系史上是少见的，也是100多年来旧中国政府所从没有做到的。它合乎情理，合乎国际正义，符合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上都是一大创举。正是由于认真坚决贯彻了毛主席的上述建交原则，新中国才能彻底废除旧政府时期的丧权辱国外交关系，才能真正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

础上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建立了新的真正平等的外交关系，从而大大地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望。

三 毛主席建交思想的深远影响

翻开国际关系史，人们会清楚地看到，几个世纪以来，在国际关系中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现象普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一大批原来的殖民地相继取得独立。它们破天荒地以主权国家的姿态登上了国际舞台，积极参与重大的国际事务；它们为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保卫世界和平和开展友好合作进行着不懈的努力。然而时至今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当前，整个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旧的两极格局已经瓦解，而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世界仍然动荡不安。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如何建立起真的平等、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从而使世界各国都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共同发展？这是国际社会极为关注的问题。

新中国从过去的历史教训和 40 多年来的亲身经历深深体会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做到平等，只有平等才能相互尊重、友好相处；只有平等才能合作、互利和互通有无；也只有平等才能合理、妥善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和分歧。正因为如此，新中国在国际关系上特别珍视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毛主席关于新中国建交原则的一个根本特点和目的，就是要在国际上争得平等地位，就是要同世界各国建立真正平等、友好的合作关系。这对新中国来说，至关重要，对整个国际关系而言，也是意义深远的。

根据毛主席建立新型外交关系的思想，周恩来总理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五项原则，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相一致，充分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因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并在我国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等在内的建交公报以及一些重要国际文件中得到确认，实际上已成为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准则。

40多年来，新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建立和发展真正平等的友好合作关系。新中国同样真诚地希望看到，世界各国之间都能在这一新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相互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维护世界和平，才能为各国创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才能使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和繁荣。

正是本着这一立场，中国政府建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真正平等、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中国政府的这一正义立场和真诚态度，赢得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小国家的广泛支持和赞同。

当然，今日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世界，强权政治仍然在国际关系中发生作用，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不安定因素和令人忧虑的现象，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的新秩序，决非轻而易举。但我们深信，要求和平、友好、合作和共同发展的愿望和进程，是不会停顿的，人类的正义和进步事业，也是不会停顿的。新中国在这方面应当继续努力不断作出新贡献。

今天，重温毛主席关于新中国新型外交的论述，使我们对我国的外交事业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正如周恩来总理曾多次谈到的：新中国的外交传统不是旧的，而是新的。近半个世纪以来，新

中国在外交和国际法实践的许多方面都有所创新，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体会、继承和发扬，要在新的外交风格上树立一面旗帜。外交是一项复杂工作，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策略灵活，遇事要仔细分析、勤于思考，要多看书、多研究、多实践，要善于集思广益和逐步积累经验。外交又是一门综合性艺术，既要有正确立场和高度纪律性，又要有丰富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国际法知识，要在谈判和交涉中善于说理，以理服人，使我们的外交更富于吸引力和感染力，等等。在所有这些方面，周总理为我们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的榜样。

记得在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就说过：在外交方面，我们当然有些经验，但经过整理使之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学，那还没有开始。如今，40多年过去了，新中国的外交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是，如何认真进行整理，总结我们自己的新经验、新传统和新风格并在此基础上认真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知识渊博和富有外交经验的新一代的外交家，使我们的外交工作做得更好，更有成效，在国际上具有更大作用 and 影响，我想，这是摆在我们面前至今尚未完成，而是应当完成的一项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任务。

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先声

——简论毛泽东关于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主张

尹 承 德

毛泽东主席根据当代世界历史趋势和国际形势特点，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主张，主要有：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各国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实行和平共处；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各国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等。这是毛泽东外交思想和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为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原则基础，也开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先声。

一

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是建立健全国际关系的根本目标，也是毛主席外交思想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成了分别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集团。美苏之间和东西方两大集团之间政治上对抗、经

济上对立、军事上对峙，构成了战后相当长时期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也是造成这一时期国际形势持续紧张动荡的主要根源。美苏之间剑拔弩张，激烈对抗和争夺，使地区热点此起彼伏，世界多次陷于热核战争的危险边缘。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避免世界性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关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世界各国和人民面临的当务之急。对中国人民来说，建国以后，百废待兴，亟需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尤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建设的。”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的国际状况和特点，从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需要和利益出发，高瞻远瞩地提出各国“应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的主张，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规定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外交思想，中国政府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总目标。尽管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敌视和包围，威胁和挑衅，中国仍高举和平旗帜，始终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针对当时国际上关于中国“好战”、“好斗”的议论和攻击，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主席庄严声明：“我们要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世界大战，”“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行者大闹天空那样。”中国实践了毛主席的这一思想，一贯站在世界的前列，致力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保卫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

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及其侵略、扩张政策和行径是世界战争的主要根源和危险。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帝国主义争夺

势力范围和瓜分殖民地而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爆发的危及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局部战争大多也是由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和扩张造成的。不坚持反帝、反霸斗争，不反对它们的侵略、扩张政策和行径，就不能防止战争、维护和平。所以，毛主席一贯坚持反帝、反霸的原则立场，坚决支持各国人民反对侵略、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正义斗争，中国人民甚至不惜为此作出重大的民族牺牲。历史实践证明，各国人民的这种正义斗争，不但维护了本国的主权和独立，也有效地遏制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和扩张，有利于地区和平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二

世界各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实行和平共处，是确保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前提和建立正常国际关系的基础，也是毛泽东外交思想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原则。

世界各国实行和平共处是时代和历史的唯一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划时代的深刻变化。随着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世界上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和大批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如此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存在，殖民地宗主国同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同时存在，情况千差万别的民族主义国家同时存在，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迥异，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悬殊，历史背景和宗教、文化的差别，使得一些国家之间在许多问题上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分歧和矛盾。如何在核武器时代正确处理国与国关系，防止这些分歧和矛盾演变成大规模冲突和毁灭性战争，是国际社会必须和亟待解决的历史新课题。各

国只有在正确原则基础上实行和平共处，通过正确途径解决分歧和争端，才是解决这一历史课题的根本途径。毛泽东主席洞察国际风云和时代大势，在 50 年代初就提出了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思想。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在 1953 年底进一步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略、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于次年先后同印度、缅甸两国正式倡导这五项原则为处理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此后不久，毛主席明确提出“应把五项原则扩展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发展了毛主席的和平共处思想，特别强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普遍意义，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发展关系的普遍性原则”。到 80 年代后期，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率先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思想，并主张国际新秩序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和宗旨是一致的，是对当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全面、科学、集中的概括与总结，因而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理想原则。

实践证明，只要切实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有国家包括社会制度不同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都能友好相处，密切合作；如果违背这五项原则，即使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也会出现关系紧张或对立，甚至发生冲突或战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现已成为公认的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建立公正、合理、健全、稳定的国际新秩序的基础。

在冷战和两极格局结束后，建立国际新秩序成为世界各国和人民的普遍要求。这种新秩序应当同那种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特点和基础的旧秩序有根本区别，应当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新型国际关系。国际新秩序的基本内容应包括：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平等的，都有权参与解决国际事

务，反对以大欺小、以富压贫、恃强凌弱和由一个或少数几个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别国无权干涉；各国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际争端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反对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稳定，实现各国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倡者，中国始终恪守这些原则，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正常国家关系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内容。我国不但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及其他国家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还同那些曾敌视我国的西方国家友好相处。1954年毛主席曾强调指出：“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70年代初，毛主席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随后，我国先后同日本、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国热爱和平及同各国友好相处的诚意，在国际关系中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立场，博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和信任。1971年，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对外关系越来越扩大。到1976年3月30日为止，我国同108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迄今，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已达157个。我国的对外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为了消除各国实现和平共处的障碍，消弭可能产生的紧张和冲突，毛主席在50年代中期即提出了用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主张。1955年毛主席在同外宾谈话中提出，“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毛主席的这一主张指明了解决国际争端的正确途径，是

我国解决同别国一切争端的根本指导原则。正是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这一原则主张，我国同许多邻国在平等协商、互让互谅、公平合理的原则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先后解决了边界问题和其他历史遗留问题，从而为相互实现和平共处和睦邻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世界舞台上，我国政府关于通过和平谈判合理解决国际争端的一贯立场，博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

三

世界各国在国际上一律平等的原则是毛主席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基础，也是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根本要求和基本要素。

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特别在殖民主义时代，大小国家从无平等关系和平等地位可言。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以富压贫的强权逻辑横行无忌。“弱国无外交”的现象被认为理所当然。正是在这种弱肉强食的强权逻辑下，所谓的“文明”国家到处侵略、扩张，肆意征服和奴役弱小民族，把它们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和附庸。从二次大战结束到六七十年代，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蓬勃发展，殖民主义制度土崩瓦解。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新兴国家普遍要求并致力于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要求享有同其他国家同样的地位和权利。大小国家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平等的原则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和打破强权政治支配的国际旧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客观要求。

顺应时代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毛主席鲜明地提出了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思想。1954年12月11日毛主席在同访华外宾的谈话中强调说：“国家不应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

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人，但它同另外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应该是完全平等的。大国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不应该在政治上压迫小国。”真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如此明确、如此深刻、如此坚定有力地论述大小国家的平等关系，在国际关系上恐怕是第一次。这是为所有中小国家特别是新兴独立国家在国际上争取平等地位和正当权益的宣言，是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对帝国主义、强权政治是一次强烈冲击，对广大新独立国家是强有力的声援和支持。

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始终贯彻了毛主席的这一原则，从思想和行动上同高人一等、欺人压人的强权政治划清界限。中国是个大国，中国人民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之后，如何在对外交往中防止大国沙文主义、以平等态度待人，就成了必须认真解决的现实课题。为此，毛主席及时向全国人民敲响警钟，号召“中国人民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遵照毛主席的告诫，中国人民对大国、强国不亢不卑，保持尊严；对小国、弱国不倨不傲，至诚相待。中国在国际上一贯平等待人，尊重所有国家，从不作任何以大欺小、损人利己的事情。在经济上，我国一贯根据平等互利原则发展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从不损害和剥削任何别国，还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用实际行动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作出贡献。

中国反对高人一等的超级大国，反对任何国家搞霸权主义，自己永远不作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永远把自己当作第三世界的平等一员。邓小平同志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在1974年特别联大上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宣告：“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

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小平同志这一著名讲话已作为中国政府的重要外交文献载入了新中国的外交史册。这一庄重宣言代表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国际上平等待人和永不称霸的坚定信念和庄严承诺，是指引中国对外行动的永恒指针。

四

各国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是毛主席外交思想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和基本点，也是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首要条件。

主权是一个国家的生命和象征，内政则是一个国家主权的具体体现。一个国家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内外政策，完全是其内政和固有主权。任何国家无权以任何形式和借口加以干涉。这是各国和睦相处、友好合作的前提，也是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国际关系实践反复证明，国与国之间只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才能增进信任和友谊，发展持久牢固的友好合作关系；不尊重别国，随意干涉别国内政，就是损害别国的主权，就埋下不和与敌对的种子，就可能发展为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毛主席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一贯主张国际事务由各国共同来管，各国的事务由各国自己来管，特别强调大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我国在坚决维护本国的独立和主权的同时，尊重别国的独立和主权，从不做有损他国主权之事，从不干涉别国内政，并在国际上

坚决反对一国对另一国的干涉和控制，大力支持中小国家维护本国独立和主权的正义斗争。

在国家关系上，毛主席把不干涉内政原则同不搞革命和意识形态输出原则联系在一起。各国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完全是一国的内政，是各国人民根据本国情况和条件作出的自主选择，决不能由外部输入和强加。从二次大战后到五六十年代，是东西方冷战时期的形成和发展阶段。美苏进行世界范围内的争夺和对抗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试图用种种手段向别国输出本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使许多处于中间地带的中小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毛主席断然反对将本国的制度和思想强加给别国的做法，特别强调革命不能输出的原则。50年代中期，他在会见访华的一些中小邻国领导人时明确指出：“靠外国帮助，靠外国输出革命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革命不能输出。”“我们不会干涉你们的内政，在你们那儿宣传共产主义。你们采取什么样的制度、政策和宗教，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们不应去干涉。”我国政府在行动上也是这样做的，从而逐渐消除了一些国家对我们的疑虑，为我们同这些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打下了思想基础。

毛主席关于不干涉内政的主张既是基于国际法基本准则，也是基于世界多样性这一客观现实。毛主席曾引用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夫物之不齐，世之情也”的话来说明世界的丰富多采和各国情况的千差万别。1954年10月21日他在一次同外宾的谈话中说：“孟子说过，‘夫物之不齐，世之情也’。也就是说，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马克思也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的，这是同形而上学不同的地方。”既然各国的政治、经济条件，历史、文化背景，民族、宗教状况各不相同，那么，适合于一国的制度和政策不一定适合于另一国。任何国家不顾别国情况和条件的殊异而向

它们强加本国的制度、思想和政策，都是行不通的，都是要失败的。中国本着毛主席的这一思想，充分尊重别国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道路的权利，从不对别国的内部事务说三道四。在对待国际问题上，我国也本着和平协商、求同存异的原则，从不搞强加于人。

当前，世界正处于向多极化发展的过渡时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世界潮流。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推动建立和平、公正、持久、稳定的国际新秩序、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努力。

重大的历史决策

——论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的 战略决策与策略思想

木 君

打开中美关系是本世纪最重大的国际事件之一。它结束了中美交恶 22 年的历史，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1972 年 2 月 21 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首次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及随访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双方就改善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形势的格局交换了意见。谈话间，毛泽东纵论天下，谈古论今，或发战略之宏论，或探哲学之奥秘，令来访者赞叹不已，为之折服。尼克松说：“毛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则把与毛泽东的会见称为是一次与“现代史巨人”的谈话。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思想睿智的哲学家。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和对世界的精辟分析不仅为中国制定外交政策奠定了理论依据，而且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行动指南。本文即以这段不寻常的历史为题，阐述毛泽东在晚年为中华民族做出的这一重大战略决策。

一 维护民族最高利益的重大历史决策

作为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和决策者，毛泽东历来把捍卫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以其战略家深邃的历史眼光，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观察，审时度势，在关键时刻，为我国外交战略指出正确的方向。在对外事务中，毛泽东一贯倡导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基础上处理国家关系；矢志不渝地维护国家尊严、独立与安全。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在50年代为我国确立了“一边倒”（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线一边）的战略方针。即使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在中长铁路、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上，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60年代，面对美苏同时逼来的威胁，毛泽东及时调整我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正确的外交方针：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加强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团结，争取西欧、日本，着重反对美苏的霸权行径。

60年代末，正当我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趁美国深陷越南战争之机，集中力量发展军备，并且竭力推行对外扩张的霸权主义；美苏两霸的对峙态势，已由美攻苏守开始转化为苏攻美守。1969年2月，尼克松上台后，为增加与苏争霸的实力，亟欲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同时希望借助中国的力量，遏制苏联，摆脱困境。当时，中国也面临苏联侵略的极大威胁。在漫长的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集结大量兵力，不断制造紧张局势，苏军先后两次在我国珍宝岛和铁列克提地区挑起武装冲突。同时在国际上大造反华舆论，对一些亚

洲国家软硬兼施，企图建立反华包围圈。这一系列对我国家安全与民族独立的威胁，加速了毛泽东调整我国外交政策的步骤。

1969年6月中旬，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等4位老帅研究国际问题并提出书面报告。7月11日，4位老帅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报告送交周恩来。在这篇报告中，4位老帅作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的精辟论断，同时勾划出当时正在形成并在以后延续多年的国际战略格局。基于这一判断，一个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构想——探索打开中美关系，在毛泽东的思想中逐渐形成。

有人说，毛泽东指示4位老帅研究国际问题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这一判断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这正是毛泽东以维护中华民族最高利益为出发点，制定我对外方针和政策的典范，体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与美国领导人会见时，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指出中美两国改善双边关系的共同利益。当尼克松坦率承认，他是“为美国自身利益到中国来的”时，毛泽东给予了肯定。但是，当基辛格为掩饰美国利己主义立场而声称“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也无求于美国”时，毛泽东则当即指出：“我看部分是对的，部分不对。小的是台湾，大的是世界。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你们为什么要来北京，我们为什么要接待你们和总统。”在这里，毛泽东的意思是，小到解决台湾问题，大到遏制苏联扩张，是中国要改善中美关系的利益所在；而美国继续控制台湾，遏制苏联扩张，才是尼克松访华的利益需要。中美两国虽各有不同的利益追求，但在遏制苏联霸权主义扩张这一点上，双方有共同利益。因此，毛泽东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携起手来。”

外交是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意志在对外事务中的具体体现。国家的意志代表着整个民族的最高利益，也是外交政策的基础与前提。毛泽东这种坚持不懈的维护民族利益的

思想，永远是我们从事外交工作的指南。

二 政策与策略思想的完美结合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是毛泽东从他毕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他认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准则，并且表现于行动过程和归宿；而策略则是为了实施或实现政策所要采取的具体方法和步骤。政策具有一定的时效，而策略则可依时而异，适时而变。因此，毛泽东在指导革命实践时，总是注意把政策的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统一起来。

在打开中美关系的过程中，中美两国因社会制度不同，加之相互之间隔阂 20 多年，存在许多政策方面的原则分歧。所以，毛泽东在第一次会见尼克松时，尼克松原想就许多具体问题交换意见，而毛泽东指出：“这些我不感兴趣。”并仍坚持与尼克松先磋商原则问题。毛泽东多次强调：“中美之间当然有双边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国际问题。”所谓国际问题，当时主要是对付苏联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全球战略问题”。联系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构想，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之所以坚持集中谈论苏联问题，主要是为中美会谈确定一个基调，即在遏制苏联扩张问题上达成共识。

在中美会谈中，双方在对苏联战略重点的认识问题上也存在分歧。美方认为苏联的兵力主要布置在东部，因此判定苏联的重点在东方。为使美方对苏联战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同时促使美国和西欧采取协调政策，毛泽东不仅使用另一种统计方法（即统计苏联和东欧军队人数的总和），说服尼克松和基辛格，而且还引用二次大战西方绥靖主义的例子，劝告美方认清苏联的重点在西

欧，其战略特点是声东击西。另外，毛泽东还严肃指出，西欧出于和平幻想和狭隘的利己主义，企图把战火东移，把苏联引向东方对付中国、日本和美国的一部分，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自食其果。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采取毫不退让的立场，其目的在于使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得以建立，从而使中美和解取得实际效果。

毛泽东在打开中美关系的过程中，对美玩弄中国牌、牺牲中国利益的企图保持高度警惕。1971年10月，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尖锐地批评美国实用主义的伎俩，他说：“你们就是踏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基辛格闻此十分不安，再三为美辩解，并反复许诺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在毛泽东与美方的接触中，类似的坚持原则、针锋相对的事例不胜枚举。他这种坚决捍卫原则的斗争精神，有效地维护了我国的国家利益，使中美关系在有利于我国的健康框架内发展。

毛泽东在坚持原则性的同时，还表现出极为巧妙的灵活性。在中美关系大门尚未打开之前，美国曾发出许多暗示，中国也作过一些回应，但两国关系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如何才能打破僵局，双方一时均无良策。1971年4月，毛泽东机智地运用民间外交渠道，亲自做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4月6日，一项突破在极端意外的情况下发生了，在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被邀请访问中国。这个消息给我的感觉是亦惊亦喜，真没想到中国的行动竟以一支乒乓球队的形式出现。”4月14日，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说：“你们这次应邀来中国访问，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毛泽东的这次“乒乓外交”被誉为“小球转动了大球”，推动了中美关系及世界局势的变化和发展。这是毛泽东外交策略思想灵活运用的一次重要实践。

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是毛泽东原则性与灵活性完美结合的光辉典范。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来访，为尼克松访华预做安排。此次访问，谈判中最为棘手的是草拟尼克松访华公报的问题。美方本来想发表一个只强调共同点而回避双方分歧的公报，以显示尼克松中国之行的成果。周恩来看了美方草案后，表示很不满意，认为不能接受，指示中方人员另外起草对案，并提议按照过去同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办法，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分歧，同时也写出双方的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对案起草后呈送毛泽东。毛泽东仍不满意，说：“发言权不大，只有一点点，一点神气也没有。”他接着说：“国际形势我讲过多次，天下大乱嘛！世界大战的危险仍然存在，但主要倾向是革命。各说各的可以，这个办法好。他们不是讲什么和平、安全、不谋求霸权吗？我们就要讲革命，讲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讲大国不应该欺负小国。不突出这个，我看不那么妥当。”后来，中方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重新起草了一份新颖奇特、风格独具的公报草案。起初，美方认为中方的草案措辞强烈，其形式在外交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表示无法接受。经过双方反复讨论，特别是经过周恩来大量的耐心说服工作，《上海公报》终于在1971年2月28日正式发表。公报既阐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又照顾美方的需要，同时申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利益的。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被写入公报，使其成为中美双方都必须遵守的准则。

在外交实践中，如何处理好政策的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外交人员须臾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毛泽东对于这二者的完美结合，值得我们不断研究和学习。

三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光辉运用

毛泽东做出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是建立在求实精神基础之上的。他曾指出：“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的现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毛泽东把我们所处的世界看成是一个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整体。这个整体是一个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若要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做出中肯的分析，就必须实事求是地正视它，承认它，并以此做出准确的判断。

“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头号敌人”，这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都被认为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世界在变，国际形势也在变。到1967年，美国在越南投入的军队已达56万多人，消耗军费300多亿美元，而战局对它越来越不利，国内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尼克松上台后，表示愿与中国和好，以借助中国从越南脱身和抗衡苏联。而与此同时，苏联却加紧扩军备战，在世界各地炫耀武力。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不仅再次拒绝同我国改善关系的愿望，而且变本加厉地对我国进行军事威胁。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住世界发展变化了的现实，做出重新研究形势、调整外交政策的决断。毛泽东这一新思想，得到了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赞同和支持。4位老帅接到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后，陈毅首先表示：“国际问题千头万绪，首先要研究美帝、苏修对我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牵涉到世界全局。”“我们要以主席的哲学思想做武器，进行分析判断。”在研究形势变化时，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是，把世界看作是各种矛盾的统

一体，而各个矛盾和矛盾的各个方面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的。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对矛盾运动过程的认识也不会完结。4位老师正是按照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方法，从中美苏“三角关系”入手，根据矛盾各方的现实状况，勾划出当时的战略格局，并且从中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据4位老师的结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就是说，苏联已上升为中国的主要威胁；而“苏美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则说明中国有条件利用美苏矛盾来对付主要威胁自己的苏联。承认不承认这一现实，我们的主观认识要不要随之改变，这个严肃的问题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但是，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肆虐的环境中，毛泽东要做出这样的决定，需要一种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需要一种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同他的战友们敏锐的思想，开辟出一条崭新的思路：影响世界的主要矛盾已是美苏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苏联。毛泽东当机立断，决意突破坚冰，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使中国占据最有利的战略位置。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不失时机地接过美方发出的信息，并于1973年2月，第一次向基辛格提出了自己的“一条线”思想。毛泽东说：“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说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言中之意，就是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主义和霸权行径。对毛泽东这一气势宏大的战略构想，基辛格竟毫无思想准备，一时无言以对。直至同年11月再度来华时，他才就这一问题与毛泽东进行磋商。在这段历史时期，毛泽东的战略和策略贯穿着辩证法，处处闪烁着哲学思想的光辉。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纷繁复杂，有时甚至是极为困难的国际环境中，驾驶着中国外交的航船绕过一个个暗礁，闯过一座座险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当前，国际局势正在经历二战后最深刻的变化，世界格局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如何在新形势下运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认识和观察冷战后的世界及其矛盾运动，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时期，也开拓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给世界带来了巨大影响。它改变了世界的战略格局，加速了历史的发展进程，制止了当时可能发生的战争，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宝贵的和平环境。今天，当我们重温这段不寻常的历史时，不能不对毛泽东和其他为此做出贡献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表示由衷的崇敬，是他们用心血谱写了中美关系史上最富光彩的篇章。

物换星移。我们伟大的导师——毛泽东已离开我们 17 年了，但他光辉的业绩将与天地永存，他的伟大功勋将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更加缅怀这位不朽的历史巨人。他不仅为我们做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历史决策，而且给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他深刻的外交政策与战略策略思想，这是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宝库。

学习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

曹 桂 生

在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他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实现中美和解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其影响之深远直到现在仍令人十分钦佩。“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是毛主席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的一贯的重要战略思想。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就是毛主席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特点，最大限度地利用矛盾的一个光辉范例。

一 尼克松上台改变战略，调整对华政策

新中国建立后，美国对我国一直采取孤立、封锁和军事威胁的敌对政策。美国几届政府，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约翰逊，一直都是如此。到尼克松 1969 年上台，中美关系开始出现了戏剧性的急剧变化。

60 年代末，在尼克松上台前，国际关系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争夺日益激烈。苏联利用美国深陷侵越战争的泥潭之际，积极推行全球性攻势战略，大力发展核武器，军事实力大大加强，

与美国日趋平衡。苏联另一面则打着缓和的幌子加强分化西欧同美国的关系。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面目充分暴露，武力侵占捷克，不断恶化中苏关系，在中苏边境制造流血事件。美国国力日衰，在侵越战争中被打得焦头烂额，耗费巨大，十分不得人心。美国人民反战运动此起彼伏，统治阶层内部也出现分歧。同时，西欧、日本也发生较大的变化。西欧走向经济一体化，对美离心倾向逐渐发展。日本崛起，经济实力迅速增长。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许多新兴民族独立国家诞生。中国不但没有被美国的高压政策所压倒，反而日益壮大。尼克松不失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有战略家的远见和勇气。他顺应历史潮流，承认战后 25 年来国际上发生巨大变化的客观现实。他上台后不久修改了美国全球战略，把准备打两个半战争改为准备打一个半战争，调整与盟国的关系，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从越南战争脱身，收缩战线，以便集中力量对付苏联，争取在全球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

从尼克松 1969 年 1 月上台到他 1972 年 2 月访华为止，约有 3 年时间。在这 3 年时间里，中美双方经过郑重试探和反复观察，20 年的敌对状况终于出现解冻。

在 1969 年 3 月前，基辛格承认，在对华政策上，“当时美国政府并没有明确的计划”，“新政府有一个走向中国的概念，当这种想法遇到机会时，政策就形成了”。“这个机会就是发生在苏联和中国军队在边界武装冲突的时候。……开始出现了非常模糊的三角关系”。这就是说，当中苏边界于 1969 年 3 月后连续发生几次武力冲突，中苏矛盾激化的时候，尼克松决定改变对华政策，将它纳入其世界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借助中国力量加强与苏联抗衡。

从 1969 年 6 月开始，尼克松连续通过公开谈话及中间人向我

国递送信息等方式，进行谨慎的试探。7月，宣布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允许美国旅游者购买不超过100美元的中国制造的商品，取消美国公民来华旅行的禁令。从7月下旬到8月上旬，尼克松利用环球旅行向中国间接传播信息，准备同北京来往，在印尼、泰国访问时表示完全不同意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和反对苏联扩大其影响到东南亚。尼克松访问巴基斯坦时再次强调反对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美国决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希望同中国对话，请巴基斯坦领导人转给中国最高领导，在访问罗马尼亚时也向罗领导人表示了同样愿望。

60年代末，我国国际环境的形势十分严峻。苏联集结重兵于中苏、中蒙边境，与印度建立了特殊关系。苏联从中国的北面、西面和西南形成对我国的新月形包围。苏联在中苏边境挑起武装冲突，在国际上大造反华舆论，并叫嚣对我施加核威胁。美国则从东面威胁中国，它与日本、南韩、台湾勾结一起，在继续进行侵越战争的同时，侵犯我国领空、领海等事件时有发生。当时，中国面临着来自美苏两条战线的威胁。如何利用矛盾，调动各种有利因素，壮大我国力量，这是摆在我国面前的一个十分复杂的战略性课题。

二 我国决定恢复华沙会谈，观察动向

尼克松于1969年向中国发出的一系列信息早已引起毛主席的密切注视。一种新的战略构思正在酝酿形成。美国有求于我，我还需进一步摸清其意图，耐心观察，加强全局研究，寻找有利战机。

苏联领导人对尼克松上台后企图改善同我国关系的信息是了解的，也是十分敏感的。苏联担心美中接近，担心美国利用中苏

矛盾来打破美苏战略平衡，在战略上对苏不利。苏联的主要对手是美国。美苏在举行高级会谈问题上由于在限制战略武器、柏林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上勾心斗角，迟迟未能达成原则协议。苏联如能争取到先与我国领导人举行高级会谈，或者至少同意两国政府首脑短时间会晤，同我国表面暂时缓和一下关系，这对美国是个压力。1969年9月3日，越南的胡志明主席逝世。柯西金率领苏联代表团参加葬礼。其间，苏联紧急向我方提出，柯西金希望在路过北京时在机场会晤周总理。毛主席和周总理紧紧抓住谈判旗帜，认为这一会晤有利于我国缓和与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争取与苏联维持较正常的国家关系，避免两国边界武装冲突再起，并可适当利用美苏矛盾。周总理于9月11日在北京机场与柯西金进行了会谈，并宴请了他，此事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通过会谈，两国政府首脑达成谅解，同意采取临时措施停止边界冲突，维持边界现状，恢复边界谈判。双方还就恢复互派大使等其他一些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一致。两国政府首脑会晤后，1969年10月22日中苏副外长在北京重开边界谈判。中苏两国新任大使也分别到任，中苏边界局势有所缓和。

美国对中苏政府首脑会晤和中苏边界重开谈判则焦急不安。尼克松急忙找基辛格研究对策。美国估计这是苏联主动采取了行动。1969年10月，美国通过巴基斯坦向我国传话，美国将停止其在台湾海峡的两艘驱逐舰的巡逻，以表示对我友好，并希望中美关系得以解决。11月9日，美国主动表示随时准备同我国恢复华沙会谈。12月20日，美国宣布进一步放宽对华贸易限制。这是尼克松政府对苏联主动接近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已中断20多年，双方没有往来，唯一的华沙会谈也于1968年中断。尼克松想与中国接近，苦于无门，这是美国历届政府的反华政策所造成的。美国这种心情，基辛格在1971年7月秘密访华时曾经向周总理流露

过。他说，1970年在法国参加戴高乐葬礼时，他曾想与在场的黄镇大使打招呼，因担心当场被拒绝，因此不便接触。基辛格深感无外交关系国家之间建立联系多么困难。

1969年夏秋之间，经周总理提出和毛主席批准，我国决定选择有利时机，在适当时候准备恢复华沙会谈。中央认为，1969年10月22日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和以后在11月7日开始的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这两个谈判都将是长期的。美苏双方都想在中国问题上做文章，向对方施加压力，以达到各自的目的。苏联在中苏边界谈判开始的同时，同意与美国举行限制战略武器的会谈，并大造中苏边界谈判所谓有进展的舆论，企图以同我国的边界谈判来压美国，增加同美国讨价还价的资本。另一方面，苏联同意与美国谈判也是企图造成共同对我国施加压力的势头。毛主席和周总理从中苏边界谈判一开始就抓得很紧，时常提醒有关同志，苏联企图利用这个谈判作为筹码，要提高警惕，心中有数。同时，中央认为，恢复华沙会谈时机成熟，从利用美苏矛盾、进一步摸清美国意图出发，并在中苏边界谈判对苏联施加一定压力，我在策略上可加以运用。

与此同时，中苏政府首脑机场会晤，也加快了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步伐。尼克松“急起直追”，他要基辛格连发几个电报，催促美国驻波兰大使务必尽快寻找机会与中国使馆联系。12月8日，美大使在华沙文化宫举行的南斯拉夫时装表演会上想方设法特意告诉中国使馆翻译，要求同中国使馆接触。12月11日，美大使拜会我国代办；1970年1月8日，我国代办回拜了美大使。华沙会谈终于恢复。美方在会谈中第一次向我方提出，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去北京或接受中国政府代表到华盛顿直接讨论一些有关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新动向。我方表示，如美国政府愿派部长级代表或总统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问题，

中国愿予接待。苏联对中美重开华沙谈判十分注意。据基辛格回忆，当时苏联驻美大使曾向基辛格表示，“这是一个使莫斯科感到神经痛的问题。”这说明，我恢复华沙会谈对增加苏联的疑虑和当时对苏联的斗争是有利的。3月18日，美国策动柬埔寨右派发动政变，朗诺上台，4月底美国悍然出兵柬埔寨，扩大了对印度支那的战争。我国坚持原则，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5月18日，我国宣布，鉴于美国侵略柬埔寨，原定5月20日举行的会谈已不适宜，华沙会谈又暂告中断。1970年6月，美国被迫从柬埔寨撤军。7月，美国宣布取消禁止在国外的美国石油公司给装载非战略物资运往或运出中国的船只加油的禁令。10月，美国又发出信号，要求恢复联系，尼克松还向记者放风想到中国来。

三 两霸中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

毛主席对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和几种力量的消长变化进行了长期的观察考虑和深入的研究。他以敏锐的战略眼光站得高，看得远，紧紧抓住了主要矛盾。在彼强我弱的情况下，他历来主张集中力量，打击主要对手，反对分散力量，四面出击。他说，“两霸中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这就是我们的政策”。这是毛主席在国际统一战线中在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为我所用的高度概括。

毛主席对美苏等国联合起来对中国发动一场战争的可能性作了认真的研究。他从根本上持否定的态度。他说，“中国是块肥肉，谁都想吃。三、四方面都一起来，那也可以，两霸之外再加上日本、印度。他们要一起来，就是铁板一块了。哪有这回事！从来没有！”这个论点完全符合历史发展事实。毛主席曾对尼克松说过，

“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苏联要扩张，就要触及美国的“利益”，美国既阻止不了，但又不会听任苏联扩张。美苏在世界上既相互勾结，又相互争夺。以后局势发展，到70年代中期和后期，苏联在世界上采取攻势，特别是企图从南线突破，插手安哥拉，大力扩展在东北非的活动，入侵阿富汗，大大加强苏联在红海地区的战略地位，并向地中海和印度洋扩张。美国处于守势，美苏矛盾愈为激烈。

当时西方政界和舆论界都在议论苏联的战略，出现一股所谓祸水东流的思潮。不少人认为苏联的战略是向东，向中国，有的则想把苏联这股祸水引向东方，西方可以高枕无忧，太平无事。毛主席综观全局，阅读了大量的西方国家回忆录、文章和报刊报道，对照苏联军队部署的实际情况，运用辩证唯物的观点，深刻总结了两次大战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毛主席曾对基辛格说过，希特勒野心太大，力不能及，资源不够，又分散打仗，不该打莫斯科，打基辅，特别失策的是敦刻尔克以后没有渡海。当时西欧国家一些领导人和反对党领导人访华时，如法前总统蓬皮杜、前部长德姆维尔、舒曼、贝当古、西德前总理施密特、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英前首相希思、比利时前首相廷德曼斯等，毛主席总是劝说他们注意，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苏联声东击西，口头讲要打中国，实际上想要吞并欧洲，希望西欧加强团结，大团结小吵架。毛主席也对外交部某些同志说，西方人从一次大战起就想推德国人向东；而德国人在慕尼黑会议一年半之内，偏要向西。毛主席认为，苏联现在也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会犯历史错误，欧洲是美苏激烈争夺的重点，苏联的战略是向西，不会战略东移。毛主席说，西方就是要苏联向东，我的看法，苏联是声东击西，灵不灵，5年10年后看分晓。事实证明，毛主席对苏联的战略估计是正确的。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美苏争霸，东西方激烈对峙，同时又出现西方舆论称之为中美苏大三角的关系。美国要求与我国和解，企图利用中苏矛盾，拉我压苏。尼克松推迟美苏高级会谈，以后坚持先访华、后访苏，既有拉拢我国的意思，更有挟访华的有利优势去苏联进行交易。基辛格一再强调，美国应同苏、中都发展关系，这种三角关系将对美国提供巨大的战略机会。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它担心打中国后兵力陷于东方，东欧后院空虚，进退两难，美国可从中渔利。苏联对我搞战争威胁，摆出一副真要打的架势，企图麻痹美国和西方，以便于在西欧施展活动，损害美国的“利益”，一面又制造中苏和缓假相压美让步。中国反对两霸，对中国来说，苏联对我威胁最大，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对美国来说，美苏矛盾大于美中矛盾。中美矛盾可资苏联利用之处则远小于我利用美苏矛盾。毛主席紧紧抓住美苏中三方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那就是三方都力图避免自己处于两面作战的局面。因此，我就有可能集中力量对付苏联，在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基础上改善中美关系和进一步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毛主席对美苏的战略意图可谓之洞若观火、了如指掌，从容不迫、驾驭自如。

四 解决中美间问题要同尼克松谈

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结合实际，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这是毛主席制定政策和策略的一个重要依据。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和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发展，尼克松当政，美中在战略上又互有所求，要打开中美关系和解决中美间的重大问题，非尼克松莫属。毛主席和周总理

亲自做尼克松的工作，可以说工作做到了家。请美右派头子尼克松访华，这在当时中国国内情况下也是十分难以想象的。毛主席高瞻远瞩，作出邀请尼克松访华这个重要决定是十分正确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针对不同条件，运用不同做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灵魂。毛主席找尼克松当面谈，这与我国对日本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先从增加人民往来推动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作法有同工异曲之妙。

从时间推论，毛主席作出要同尼克松面谈的决定，估计与邀请美国记者斯诺访华有直接联系。1970年9月间，中央通知我驻法使馆尽快联系寓居在西欧的斯诺，邀请他前往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2月18日，毛主席与斯诺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谈话。毛主席在谈话中对斯诺突出强调了请尼克松到中国来的问题。他说，“为什么让右派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间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游者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跟他吵架。”“我欢迎尼克松上台。”毛主席亲自向斯诺作了这一番谈话，其用意已是十分明白不过的。这充分表明，毛主席在斯诺访华前早已胸有成竹，考虑了要与尼克松当面谈的问题。

毛主席还对斯诺谈了“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他说，“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是不是正确，外交部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这是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决策。这对支持美国人民、加强中美人民友好、利用美苏矛盾和扩大我国影响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在当时新形势下的一种新的斗争方式。从此，我国开始有选择地、

有步骤地同意许多美国人来华，改变了过去长期以来与美国不相往来的作法，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不断增加。

五 乒乓外交，小球转动大球

中国乒乓球队邀请美国乒乓球队于1971年4月访华。这是毛主席发出“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的重要指示后我国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也是继斯诺访华后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向尼克松连续发出的第二个重要信号。毛主席和周总理紧紧抓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第十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个时机，指挥自如，灵活主动，充分发挥高超的外交艺术才能。“乒乓外交”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团结了美国人民，扩大了我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国外舆论对中国这一行动为之赞叹。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说，“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把大家都惊呆了”，“比通过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分量”。“由于选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种政治倾向，这一做法更具有吸引力”。

在此形势下，华沙会谈已不适应需要。尼克松作了调整，决定由白宫直接掌握，避免受国务院的干扰，并建立一条中美双方都信得过的保密的通信途径，即主要通过巴基斯坦秘密渠道。1970年10月下旬，尼克松曾向我表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美国绝不会与苏联共同反对中国，愿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华。11月14日，周总理通过巴基斯坦作了答复，提出了我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如尼克松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派特使来北京商谈，1971年1月尼克松又通过巴基斯坦传话，美国认为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是有益的，它不仅限于台湾问题，而应包括解决其他问

题的步骤。6月2日晚，尼克松收到周总理的口信，欢迎基辛格来北京举行秘密的预备性会议，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对此，尼克松如获至宝，与基辛格共同举杯祝贺这个历史事件。基辛格认为，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从以上情况发展可以看出，华沙会谈谈了15年没有解决问题，如果从尼克松上台到访华算起也有3年时间。但是从打乒乓球到尼克松访华只不到10个月，其间秘密渠道通讯往返，在会谈升级和会谈范围问题上有实质性进展，中美联系来个飞跃。毛主席曾对找到打乒乓球这个方式和打乒乓球之后中美联系发展迅速表示满意。周总理则生动地誉之为“小球转动了大球”。

六 中美关系解冻，我乘胜扩大战果

基辛格1971年7月秘密访华，7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报。尼克松亲自向全国电视广播网宣告公报全文。1972年2月尼克松抵达北京，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周总理在讲话中称赞尼克松访华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尼克松访华回国后对他的内阁说，在我一生中大概不会有别的事能超过这次经历了。中美关系新的开始，对整个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美在战略上互有所需，通过尼克松访华，中美各有所得。毛主席邀请尼克松访华的英明决策，在充分利用矛盾、分化两霸和壮大自己等方面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美国从不承认新中国到尼克松亲自访华，这标志着22年来美国过去历届政府对华政策的总破产。美国接受了过去长期拒绝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认国际争端应该在此基础上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双方

同意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并共同发表四点声明。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并且承担了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义务。这是积极成果。同时也需看到，达成的协议还是属于纸面上的，能否完全履行和履行到什么程度还要看美国的实际行动。

尼克松访华也达到了他预定的目的。同年美国大选，尼克松连选连任，赢得了绝对多数，扩大了在国内外的影响。这说明，与中国和好，既是美国重大的战略转变，又是人心所向，符合美国人民的意愿。访华之后，尼克松于1972年5月访苏，进行高级会谈，美国处于较有利的谈判地位，双方达成限制战略武器第一阶段协议等文件。1973年1月，美国签署巴黎协定，结束侵越战争。美国舆论认为，1972年春夏之交，尼克松的时运达到登峰造极，他洋洋得意，在外交上赢得不平凡的成就。这是美国自二次大战以来在国际关系中最大的转折点，就连对总统最严厉的批评家也不得不称赞他高超的政治手腕。

苏联表面故作镇静，内心甚为不安。它怕亚洲局势缓和，美国腾出手来，在欧洲、中东加强同它争夺；怕西欧国家利用苏联的不利处境对苏联强硬起来；怕东欧有的国家对苏联的离心倾向发展，后院不稳。美苏尔虞我诈，争夺更加激烈。

毛主席从战略全局出发，善于抓主要矛盾，抓关键。中美关系出现解冻后，乘胜扩大战果，进而推动全局，为打开整个对外工作的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公报发表后第三个月，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于1971年10月25日得到了恢复。不少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缓减了来自美国的压力，70年代初期出现了西方国家同我国建交的高潮。到70年代末，我国已同西方2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全世界120个国家建交。从60年代到70年代，我国对内对外都经受了十分严峻的考验，我国的

外交仍然大踏步地向前发展。

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外交战线上的战略、策略思想和指挥艺术是我国十分丰富的宝贵财富，是我们需要认真学习和继承发扬的。毛主席以敏锐的战略眼光对影响全局、掌握全局的关键问题看得准，抓得紧。他善于抓主要矛盾，从而促使其它次要矛盾顺利解决，进而推动全局。

毛主席认为，国际形势是不断变化和不断发展的运动过程，不能用静止、孤立、片面的观点来观察和处理错综复杂的外交斗争。他力求主观认识不断符合客观实际。他反对一成不变，墨守陈规，提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毛主席把对美苏等国的调查研究放在重要位置。研究和正确掌握美苏的特点是毛主席对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国际斗争领域中的运用和发展。他强调用心分析思考，透过现象看本质，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反复推敲引证，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毛主席对外宾的谈话充满哲理，风趣诙谐，知识渊博，而又深入浅出，令人再三回味。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的。

回想 1972 年之前中美间 20 多年处于隔绝状态，敌对情绪很深，相互没有信任；中美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分歧十分深刻，这比现在要大得多了。自从尼克松访华以来，两国间无论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和教育等领域都有较大的发展。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确实来之不易，维护中美关系双方都有责任。有远见的政治家可以看到，发展中美关系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美间今天和将来都有着广泛而又重大的共同利益，当然也有不少分歧。中美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也是自然的，这是完全可以通过加强接触，交换意见，来增进相互了解。双方可以在三个联合公报基础上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求同存异，为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而共同努力。

毛泽东高屋建瓴的 策略思想和斗争艺术

——学习中美大使级会谈策略运用的点滴体会

赵 祥 龄

1955年8月1日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136次会议，历时长达15年之久，是中美关系史乃至国际关系史上一场特殊的谈判和斗争。一方面，它作为我国对美进行外交斗争的场所，在揭露美国的侵略政策，打击美国的种种阴谋，配合和推动对美斗争全局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中美当时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它又成为保持双方直接联系的一种渠道，对于后来打开中美关系有着深远的意义。

翻开这一时期的历史档案，不难看出，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斗争自始至终都是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从会谈的决策和指导方针，到每一个阶段的谈判部署、具体方案，乃至重要发言稿、声明稿等，都是经他最后审定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总揽全局，运筹帷幄，以他们指导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生动实践，为我们树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外交斗争的典范。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泽东谋略之深远，决策之英明和斗争艺术之高超。

一 高瞻远瞩的英明决策

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国际形势总的看来出现了相对的缓和，世界人民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呼声日益高涨。由于朝鲜停战和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远东的局势也开始有所缓和。但是，美国却不甘心它在朝鲜战场和日内瓦谈判桌上的失败，继续推行其敌视中国的政策。为了永久霸占台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事业，美国政府于1954年12月与盘据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使台湾海峡的军事对峙变得格外突出。针对美蒋公开的军事、政治勾结，党中央及时提出了“解放台湾”的战斗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5年1、2月份先后解放一江山岛和大陈岛，在美国的军事讹诈面前表现了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而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

美国政府的侵略好战政策，不仅与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背道而驰，而且在其国内和盟国当中也引起越来越大的矛盾和不满。当时，美国公众舆论对于美国还有一批在中国犯罪的人员被关押在中国一事反应强烈。他们认为，这些在押的美国人“完全是美国政府僵硬的对华政策的牺牲品”。美国政府既想要回这些人，又不愿同我直接接触，生怕造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成事实。因此在国内受到很大的压力。美国代表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通过英国代表提出愿与我方就遣返人员一事进行商谈，就反映了美国政府的这一处境。

党中央、毛泽东在对上述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国的矛盾处境作了精确的分析之后，认为我们可以抓住美方希望其在华人员得到遣返的迫切心情，提出我愿与美方就台湾局势举行会谈的建议，

开辟中美两国之间的直接接触渠道。

1955年4月，正在出席亚非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按照中央决策的精神发表重要声明，宣布：“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愿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问题。”声明发表后，立即在国际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在美国政府拒绝后，英国、印度和印尼等国官员纷纷表示愿意从中斡旋，劝说美国，争取这一会谈早日实现。在这种内外都希望中美进行接触的压力下，美国政府的态才不得不有所转变，遂于1955年7月13日对我方的倡议作出回应，同意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事实证明，中央这一适时的决策，在当时对于进一步消除一些亚非国家对我国的疑虑，真诚表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愿望和争取一个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都起到了积极的、深远的作用。

二 策略运用的光辉实践

1. 既有原则的坚定性，又有策略的灵活性

首先，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决策本身，就是策略灵活性的体现。美国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干涉我国内政，是造成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本原因，也是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对于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必须组织力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根据条件、时间的不同，也可以和它进行谈判，谈判则是另一种方式的斗争。用陈毅同志的话来说，这叫做“武戏文唱”。

我方谈判代表本着中央制定的“既要有坚定的立场，也要有协商的和解的态度”的精神，从会谈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系列主动

行动。为了给会谈创造一种良好的气氛，我国司法机关在会谈开始的前夕提前宣判释放了一批美国间谍。

虽然中美谈判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美国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问题，但为了使会谈能早一些开起来，我方也同意先从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开始进行商谈，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以便为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创造有利的条件。

然而，当会谈进入实质性问题讨论时，美方别有用心地提出要双方就“放弃使用武力”发表声明，我方当即明确指出，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问题，绝对不能同中国通过和平方式还是使用武力来解放台湾这一内政问题混为一谈。中美双方关于放弃使用武力的声明，必须导致美国在台湾地区的武力威胁的解除，而绝不能被用来诱使中国承认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尔后，美国竟然又在它提出的声明草案中，提到美国要在中国的领土台湾行使所谓“单独或集体的自卫权”，企图以此为借口继续保持其在台湾地区对中国使用武力的权利。对此，我不得不指出，中国一贯支持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但这决不能被荒谬地解释为美国在中国的领土台湾有这种自卫的权利，以此来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这是中方绝对不能接受的。

在整个会谈中，我方一方面坚持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另一方面，为推动会谈向前移步，争取中美关系有所松动，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积极性的建议，主要问题谈不拢，改谈次要问题；这个建议不接受，改提那个建议，表现了极大的灵活、耐心和诚意。尽管会谈终因美方顽固坚持敌视中国的立场和无理纠缠而陷入僵局，我方既灵活又坚持原则的做法，在世界人民面前有力地表明中国政府是怀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和通情达理的，同时也充分暴露了美国政府敌视中国的蛮横态度，

使我们始终处于主动的地位。

2. 针锋相对和有理、有利、有节

要使美国接受谈判，达成某种协议，并且使这些协议得到执行而不被破坏，必须经过针锋相对和坚持不懈的斗争。

(1) 义正词严，迫使美方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1957年12月12日中美大使举行第37次会谈，美方以其原代表约翰逊大使调任为由，擅自委派非大使身份的代表出席会谈。我方代表当即严肃指出，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中美双方协商的结果，美国一方不能任意加以改变，降低会谈级别。但是美方迟迟不派新大使，采取拖延伎俩，致使会谈从僵持发展到中断。

针对美方这种恶劣无理的态度，中央和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愿意谈判，并积极争取成果。如果美国不愿意谈，我们也可以中断谈判。我们不愿破裂，但我们也不怕破裂。美国如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我国外交部于1958年6月30日发表声明，要求美国政府15天内派出大使级代表，否则中国政府就不能不认为美国已决心破坏中美大使级会谈。第二天，美国国务卿连忙表示，如果中国愿意改变会谈地点，美国将指派驻波兰大使参加会谈。但他又说不会向中国的“最后通牒”低头。7月14日，即我方所提限期的最后一天，美方不得不表示，将在15天限期届满后的几天内派出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对此，我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表示：美国要点面子，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美国既然愿意迅速恢复会谈，推迟几天也无不可。这种既针锋相对又有理有利有节的做法，不但没有削弱我方所提限期的力量，反而更能暴露美方破坏和中断会谈的用心，有利于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争取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2) 炮打金门，粉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1958年

7至8月间，发生了美国入侵黎巴嫩的事件。蒋介石也趁机叫嚣要“反攻大陆”，加强了以金门、马祖为基地对大陆的骚扰破坏。美军方还扬言要进行像在黎巴嫩登陆那样的军事行动。为了严惩蒋帮的猖狂活动，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打击美国的嚣张气焰，也为了配合中东人民的反美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8年8月23日开始炮轰金门、马祖。这一下，美国慌了手脚，急忙从国内和地中海抽调来大批兵力，一时使美国集结在台湾海峡的兵力达到其历史上海外兵力集结从未有过的程度，光航空母舰就有6艘。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先后发出战争威胁。形势顿趋紧张。针对美国政府这一扩大侵略的行动和“战争边缘”政策，9月4日我国政府宣布我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9月6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重申解放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主权，任何外国不得干涉。声明严厉谴责了美国的战争挑衅，并强调“如果美国政府悍然不顾中国人民的再三警告和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在我国坚定的态度面前，美国退缩了。金门的炮声震动了全球，美国却不敢发动战争，反而几次三番要求同我恢复会谈。待我表示同意恢复会谈后，美国才如释重负，很痛快就同意派出大使恢复会谈。这再一次暴露了其纸老虎的本质。中国人民敢于针锋相对地同它斗争，并有理有利有节地掌握主动，极大地鼓舞和教育了全世界人民。

3. 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当美国看到无法使我宣布放弃对金门、马祖必要时使用武力的权利，而它自己要在中国沿海地区为蒋军护航又有很大风险，可

能同中国发生直接武装冲突时，当它看到大批美舰滞留台湾海峡，对其全球战略又很不利时，便想采取“退一步”的做法，企图出让出金门、马祖，换取我同意不对台湾和澎湖使用武力，以实现其“划峡而治”，搞“两个中国”，然后搞掉蒋介石，托管台湾，把台湾变成美国的永久殖民地的阴谋。蒋介石不满美国这一做法，担心美国会搞掉他，而代之以更为忠实于美国的奴才。美蒋之间矛盾日渐突出。

考虑到这一情况，为挫败美国永久分裂中国的阴谋，中央和毛泽东决定让金门、马祖暂时留在台湾当局手中。10月6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以中国国防部长名义《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对金门停止炮击7天，让国民党部队补充给养。10月13日，国防部命令对金门炮击再停两周。但是，10月19日，当杜勒斯和美国防部长一起跑到台湾去压蒋由金、马撤兵时，我又决定恢复炮击，使蒋可以此为由，顶住杜勒斯的压力，拒不从金、马撤军。毛泽东后来风趣地说，我们这是帮助蒋介石守好金、马。结果，美国“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没有得逞，而我们却利用美蒋矛盾为美国在台湾海峡套上了一条绞索。

1962年，蒋介石集团趁苏联恶化同我国的关系及我国3年严重自然灾害之机，蠢蠢欲动，准备大规模进犯大陆。中央和毛泽东在认真研究形势以后认为，蒋介石这一次反攻大陆下了很大的决心，但他还存在一些困难，其中最关键的是要看美国支持不支持他这样干。为此，中央在作好福建前线的军事部署的同时，想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渠道摸清一下美国的态度。

当时，美苏争夺激烈，东西方关系相当紧张。美国从其全球战略部署考虑，并不希望蒋介石在这个时候大规模反攻大陆。在王炳南大使向美大使谈了蒋介石准备窜犯大陆的情况，并强调美国应对蒋的冒险行动承担一切责任后，美大使表示他将立即上报

美政府，并向我方保证，美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决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并将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由于摸到了美方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态度，对当时中央的决策和部署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三 深邃的思想，远大的眼光

中美大使级会谈可以说是在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一种特殊的接触形式。

那个时候，美国是对我国最大的威胁，它以世界霸主自居，到处侵略扩张，干涉别国内政，并且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它趾高气扬，不同我方平等交往，甚至连承认也不愿承认。因此，当时同美国举行谈判并不能指望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在同美国的关系上，毛泽东当时一再指出，“我们不怕美国的封锁，也不要急于同美国建交。我们反正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对外政策。我们有一天把事情办好了，美国就会后悔的，那时也是悔之晚矣。”他还说，“迟几年跟美国建交比较有利。让美国政府在国际上显得不讲理，这样把它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使其反华政策陷于孤立，以后总有一天会建交的。”毛泽东的这些话充分体现了他的不怕压、不信邪，坚持独立自主，立足于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争取中华民族自主、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外交思想。同时，他的这些话还包含了深刻的辩证法。他告诉我们，矛盾是可以转化的。随

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假以时日和斗争，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将会由不承认转化为承认，中美关系也会由不建交转化为建交。后来的历史发展恰恰证明了毛泽东关于中美关系的预见。

党中央、毛泽东之所以重视中美大使级会谈，除考虑到当时对美斗争的需要外，很重要的也是着眼于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中美两国都是大国，不能没有接触。要接触就要有一定的渠道，中美大使级会谈正是这样一种渠道。通过这条渠道的接触，两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相互增进了了解。况且在当时，美国政府能坐下来和我们谈判，实质上就是对新中国人民政权的承认，是它长期孤立中国政策的破产。中美两国人民是友好的，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我国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中美两国总有一天会建交的。对于新中国的人民政权来说，时间在我们方面，正义在我们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调整，随着我国的不断发展壮大，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一天终究会到来的。

1969年12月3日，即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两年以后，发生了美国驻波兰大使奉命在波兰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追着向中国驻波使馆译员表示要与中国驻波兰代办会见的一幕。1970年1月20日双方恢复会谈。美方郑重表示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去北京或接受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直接讨论一些问题。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最后一次会议，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基辛格—尼克松踏进中国大门的前奏。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所预言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毛泽东关于反对美国武装 干涉台湾的决策

沈 智 焕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谋求自己的全球战略利益，变中国为其附庸，不遗余力地出钱、出枪、出人，支持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打内战。然而结果非但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经过3年多的解放战争，国民党政权被人民推翻，其残余力量退据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布成立。这是美国扶蒋反共、插手中国内战政策的失败。当时的美国政府本来可以从中国内战的泥潭中拔出来，但是它没有这样做，反而越陷越深。美国政府执意与中国人民为敌，不顾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利用侵朝战争之机，在对朝鲜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的同时，公然以武力侵占我国领土台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破坏中国的统一，并进逼鸭绿江，轰炸我国东北边境地区，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面对这一严峻局势，毛泽东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反对美国武装干涉台湾等重大决策。

毛泽东领导中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始

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坚决反对美国武装干涉台湾和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他高瞻远瞩，充分表现了一个伟大领袖的非凡胆识、决心和勇气，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反映了共产党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也反映了共产党人能驾驭形势的高超才能和气魄。可以说，整个反对美国武装干涉台湾的斗争过程的每一个重要环节，都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一 坚决反对美国武装侵占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美国十分仇视新中国，不仅不承认新中国，而且执行了一条禁运、封锁、孤立新中国的政策，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制造“两个中国”，以实现其长期霸占台湾、分裂中国的目的。

为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违反《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他自己1月5日的声明，公然宣布：“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8月，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所属第十三航空队进驻台湾，建立了所谓“台湾前进指挥所”。1951年5月，美国在台湾设立了“军事顾问团”，公然以武装力量庇护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

美国公开武装干涉台湾的行动，不过是美国长期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明确指出：“杜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美国这样地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这对于中国和亚洲人民很有利益。”“帝

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因为它没有人民的支持。”他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反对美国武装干涉台湾的思想，并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日，中国政府的声明也明确提出：“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二 精辟分析帝国主义的本质

二次大战后，美国发展成为头号帝国主义。毛泽东早在解放战争开始的时候就明确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我们过去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作了公开的批评和揭露，这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揭穿它。”还指出：“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

毛泽东认为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肯定是要失败的，他们“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原因“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

在美国武装干涉台湾后，毛泽东又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指出“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1958年12月1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说：“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

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毛泽东对美帝国主义本质的精辟分析为我们反对美国武装干涉台湾的斗争提供了理论基础，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解决了敢于和善于斗争的问题。

三 分清侵略与被侵略是反侵略的原则问题

美国帝国主义在武装侵占台湾后，依仗实力，开动宣传机器，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散布了大量诬蔑新中国的言论，为其侵略进行诡辩。毛泽东以他长期斗争的丰富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一开始就察觉到美国的图谋和国际上出现的混乱思想，集中从美国武装干涉所造成的台湾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中，反复阐明了美国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者以及反侵略斗争的正义性。

毛泽东在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严厉谴责美国侵略我国领土台湾后，又决定向联合国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罪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在联合国讲坛上同美国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毛泽东非常重视，派遣政府特别代表出席安理会，义正词严地谴责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罪行，彻底驳斥了美国炮制的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安理会虽然由于美国的操纵，致使我国要求制止美国侵略的建议被无理地拖延和拒绝，但是我国的控诉却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坚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的普遍同情、支持和欢迎，达到了表明立场、申张正义及弄清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目的。

毛泽东为了反复阐明美国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者，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他指出：“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

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美国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在这些地方留得越久，套在它脖子上的绞索就越紧。”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讲话深刻地揭露和谴责了美国的侵略，有效地澄清了国际社会的某些模糊认识，有力地争取全世界爱好和平、反对侵略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为我们反对美国武装干涉台湾的斗争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四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决策

新中国为了保卫自己的独立、主权和安全，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一方面不得不奋起反抗侵略，另一方面又力争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以便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

中美大使级会谈，是毛泽东试图以和平方式解决中美之间争端的一个决策。

通过在朝鲜战场和台湾问题以及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等问题上的较量，毛泽东认为美国有可能同意坐下来同中国谈判。他分析了台湾问题的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情况，从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维护远东及世界和平与安全这两个目标出发，就反对美国武装干涉台湾这一问题的解决途径提出了如下的基本原则：国内问题和国际争端分别解决。国内问题通过同蒋介石集团的和平谈判解决，他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政策主张，但由于美国的干预等原因，使得这些主张无法付诸实践；国际问题通过同美国的谈判，解决中美间的争端，他说“美

国侵占台湾和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根据他的决策，周恩来总理于1955年4月23日，在亚非会议期间发表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这一声明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美国被迫于4月26日由国务卿杜勒斯做出不排除同中国谈判的表示。由于中国大力争取同美国坐下来谈判，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又要求美国作出响应，美国才于1955年7月13日通过英国向中国提出了中美双方各派一名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议的建议。经过磋商，中美双方确定将原在日内瓦进行了将近一年的领事级会谈升格为大使级。

根据毛泽东审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方针，我国谈判代表在会议一开始就提出了各种合情合理的方案，既表明立场，又有协商和解的精神，但美方无谈判诚意，在台湾问题上坚持要干涉中国内政，顽固地拒绝讨论中方建议的实质问题，即协商解决和缓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之后，美国又以美方代表约翰逊大使调任为由，企图单方面降低会谈级别，从而使会谈由僵持发展到中断。

美国在谈判桌上无法实现其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于是1958年7月以后在台湾海峡地区对我国进行战争挑衅。美国这一侵略行径不但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而且在它的盟国中引起了强烈的不安，甚至在美国国内也很不得人心。

9月6日，周恩来总理发表了《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重申解放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主权，任何外国不得干涉，再一次划清中美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国际争端同中国解放自己领土台湾这一内政问题之间的界限。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战争挑衅，强

调指出，如果美国政府悍然不顾中国人民的再三警告和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谴责了美国侵略中国的行为，同时重申了中国同美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彼此争端的愿望，对中美华沙大使级谈判寄以希望。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9月9日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准备随时恢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级会谈。

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9个月后，终于9月15日在华沙复会。但美方在会上又搬出了“停火”问题。中国代表当即指出，中美之间没有打仗，根本不存在“停火”问题。毛泽东批驳说：“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由于毛泽东巧妙灵活地指挥了这场斗争，使美国打算要在台湾海峡划一条永久停火线的阴谋最终未能得逞。

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延续进行，但由于美国仍坚持其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会谈除双方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外，没有在和缓与消除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这个关键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实际上中美大使级会谈只是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两国保持某种接触，交换一些意见的途径，因而会谈长期拖而不断。至1970年2月，历时15年，总共举行了136次会议。

五 炮击金门、马祖

炮击金门、马祖，是毛泽东亲自指挥以军事斗争为表现形式的政治外交之战，反对美国划峡而治的阴谋，坚持统一。

毛泽东常说：“金门炮战，意在击美。”这八个字，言简意赅，

概括了这场炮战的实质意义。也指出了美国是制造海峡两岸危机的罪魁。

1958年7月，美国帝国主义出兵侵略黎巴嫩的同时，在远东台湾海峡地区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它一方面怂恿国民党蒋介石部队加强对中国大陆的骚扰，企图捞取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得不到的东西，即凭借美蒋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蛮横地要在中国领土上拥有对中国进行“单独和集体自卫”的权利。蒋介石跟着叫嚷要“反攻大陆”，加紧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骚扰和破坏活动。另一方面，更甚的是，由美国海军参谋长于8月8日扬言，随时准备像在黎巴嫩那样在中国登陆。

毛泽东认为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指出要以实际行动支持当时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国的侵略斗争，同时为了惩罚国民党的蒋介石部队对大陆的骚扰和破坏活动，他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前线部队从1958年8月23日开始炮轰金门、马祖。

炮声一响，美国就着了慌。8月27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重申，美国将不放弃它已经承担的以武力阻挠解放台湾的“责任”，匆忙从地中海等地调集海军到台湾海峡支援第七舰队；9月4日，他又授权杜勒斯国务卿发表声明，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等中国沿海岛屿，并宣称已经为此作出了军事上的部署。这就进一步暴露了当时美国政府决心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的侵略面目。

为了反对美国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相继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其中包括宣布本国领海的宽度为12海里。9月7日，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就美舰侵入中国领海提出第一次严重警告。

“八·二三炮战”后，大、小金门等蒋占岛屿，全被我人民解放军的炮火封锁，截断了金门与台湾的海上通道。金门不但弹药

补给中断了，粮食、燃料的补给也中断了，储备的粮、弹都消耗将尽，频频向台湾告急。蒋介石即请求美军护航，以恢复金门海上补给线。当美蒋军舰的联合大编队抵达金门的港口料罗湾时，毛泽东下令，按预定的方案：一、照打不误；二、只打蒋舰，不打美舰。没想到我人民解放军一开炮，美舰丢下蒋舰及运输船只于不顾，立即掉头向台湾方向逃去。美舰一走，蒋舰及运输船只孤零零地暴露在我解放军炮火前，遭到猛烈打击，损失惨重。此时，急得蒋军向台湾联络时，连密码也不用，就在报话机里大骂“美国人混蛋”。

毛泽东亲自指挥的这场同美蒋联合编队的较量，不在于击沉、击伤蒋军多少艘舰只，而在于把貌似凶恶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的底摸清了。在全世界到处横行霸道、不可一世的美帝，其实是只纸老虎。只要涉及美国自身利益，要冒和我人民解放军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它就不干了，就只顾及自己，不顾别人了，如此而已。

金门炮战是一场以军事斗争为表现形式的政治战，也是外交战。它不仅是国共两党的国内政治，更是一场中美蒋之间三角关系惟妙惟肖的矛盾表现。这场炮战，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在处理中美蒋三角关系中的智慧和妙策。

美国对台湾海峡地区的军事冒险遭到打击后，又在中断了9个月后恢复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玩弄所谓停火的把戏，再次遭到中方的揭穿和坚决的反对而未能得逞。但杜勒斯之流仍不甘心其失败，为实现其搞“两个中国”的计划，杜勒斯在9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放风说，如果中国愿意在台湾海峡地区停火，美国可以劝蒋军撤出金门、马祖。其意仍然是要在台湾海峡划一条永久停火线，所不同的是这次把金门、马祖划在这条线以西。美国想要以这种“退一步”的办法，在中国沿海岛屿地区从“战争边缘”政策转为“脱身”政策，因为把大批美国军舰滞留在台湾海

峡地区，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很不利。而且这样停火可以使美国武装干涉台湾、澎湖群岛的行为合法化，以实现它永远占领台湾、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

毛泽东及时洞察了美国的阴谋，调整了部署，决定让金门、马祖暂时留在蒋军控制下。10月6日发表的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国防部长《告台湾同胞书》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湾和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中美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

10月13日，中国国防部发布命令，对金门炮击再停两星期。毛泽东在命令中指出：“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金门海战，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美国硬要把中国军队所采取的这一措施，同美国的停火阴谋混为一谈。10月19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国防部长麦克耳罗伊跑到台湾与蒋介石会谈，要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兵，为蒋介石所拒绝。

10月25日，毛泽东又以中国国防部长名义发表《再告台湾同

胞书》，指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商议”；劝告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要提防“皇姑屯事件”再演；“我们两党的事情很好办”，“化敌为友，此其时矣”；“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

在围绕着炮打金门、马祖而进行的这一场军事和外交斗争中，美国是输家，它企图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被毛泽东粉碎。整个斗争过程中，毛泽东审时度势，高屋建瓴，着眼于战略全局，灵活地运用斗争的策略，有理、有利、有节，牢牢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

六 打开中美关系

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由于在国际战略形势中愈益处于不利地位，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对华政策。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68年竞选总统期间和1969年入主白宫之后，都一再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对美国放出的种种外交信号，中国方面都不失时机地作了反应。毛泽东凭着他特有的政治敏锐，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魄力，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历史性的机遇，冲破障碍，推动历史前进。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美国朋友斯诺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游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同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他还向斯诺阐明了“左、中、右都让来”的政策，指出：要解决中美在

台湾问题上的争端，就得同尼克松谈。

尼克松对欢迎他来中国访问的信息感到鼓舞。1971年2月，尼克松向美国国会提出的第二个外交报告中说：“在今后一年里，我要仔细研究我们应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中美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以及怎样消除实现这些机会的不必要的障碍。”

1971年4月，毛泽东决定邀请在日本名古屋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一“乒乓外交”推动了整个国际局势的发展，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来往的大门，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周恩来后来生动地描述毛泽东的决策是“小球转动了大球”。

4月21日，中国政府给美国政府一个口信：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谈。尼克松于5月中旬答复说，为解决两国之间的那些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的重视，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他还建议，由基辛格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议。中国同意这一建议的信件于6月初传到白宫尼克松手里时，尼克松总统兴奋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这就导致基辛格7月间的秘密访华。

周恩来根据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的会谈方针，着重同基辛格谈了台湾问题。我方从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原则问题和正确解决这一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出发，坚持美国必须承认台

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因而不容外人干预，美国必须确定撤走驻台美军的期限，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这实际上是根据毛泽东反对美国武装干涉台湾的决策思想，从一开始就提出了断交、撤军、废约这三个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原则问题。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毛泽东当天就会见了尼克松，并就世界局势和战略问题进行了交谈。毛泽东的谈话是高瞻远瞩，实事求是，态度真诚。它为周恩来同尼克松的会谈定了基调。至于发表尼克松访华联合公报，根据毛泽东的主张我方提出的草案，既列出双方的共同点，也摆明双方的分歧所在。这使美方大感意外，认为这种公报是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对此，周恩来做了大量的耐心说服工作。美方对我方的认真态度难于拒绝，终于接受了建议。

就这样，经过双方反复讨论，一个独特的、别具风格的公报终于达成了。公报首先列出了双方各自的立场和态度，包括对国际问题的各项原则主张。在台湾问题上，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军必须从台湾撤走，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活动。美方则声明，它认识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公报还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这实际上驳倒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承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欣赏基辛格巧思所得的上述表达方式，双方遂较快地取得了一致。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于1972年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著名的《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公报为两国以后建交谈判奠定了基础。

围绕台湾问题，毛泽东同美国进行的政治、外交、军事相结合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其所体现的战略和战术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毛泽东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美国武装干涉台湾、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要求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这就从根本上维护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及民族的尊严，对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对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毛泽东关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 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思想

张立淦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不仅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相当长时间里曾经是我国对外关系的一个主要方面。因此，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便成为毛泽东对外政策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40多年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特别是中国和苏联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不平坦的道路。毛泽东在处理这个复杂问题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所应遵循的原则作了系统的、创造性的论述，其基本思想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也应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

毛泽东关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处理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思想是在同苏联的大国主义的斗争中产生的。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联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被称为“全世界劳动民众的祖国”。因此在一个长时期内，各国共产党实际上把苏联的利益同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等同起来。如果说这种现象在当时有其历史合理性的话，那么当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时，就失去了客观依据。每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论其大小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先后，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具有平等的地位，是国际社会主义总体的一部分。苏联虽然第一个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一个国力最强大、经验最丰富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国际社会主义中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但终究不能再如战前一样，把自己一国的利益完全等同于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

但是苏联领导人在战后却继续坚持苏联的利益高于一切，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为其战略利益服务，忽视它们的主权和平等。这种政策伤害了别国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也使得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很好地按照本国的历史情况和特点来建设社会主义。1956年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事件进一步暴露出苏联的这种政策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派刘少奇和邓小平去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就此交换意见，指出斯大林时期的大国主义尚未彻底克服，并转达了毛泽东的建议：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甚至超过这些原则。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应当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思想。在此背景下，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苏联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方面“不是没有错误的”，表示愿意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相互关系中的问题。同年11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宣言的声明》，对苏联政府的宣言表示支持。声明指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

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相互关系的准则。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同时又是以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团结在一起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二

毛泽东关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思想，其核心是要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确立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

针对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存在一党一国说了算的不正常情况，毛泽东为坚持和捍卫这一原则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52年2月14日，“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写入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6年波、匈事件期间，我党代表团访苏时，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强调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独立原则和平等原则。同年11月1日，毛泽东通过我国政府有关支持苏联政府宣言的声明公开指出，忽视各国平等的错误，“就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特别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对于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共同事业，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损害。”这一声明还指出苏联政府表示愿意根据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来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解决相互关系中的各种问题是一个“重要步骤”，希望它能“有助于消除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隔阂和误会，并且可以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友好与合作”。

但是事实表明，苏联领导人当时承认错误是迫不得已，言不

由衷的。在渡过波、匈事件的难关后，大国主义故态复萌。他们不接受毛泽东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应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思想，认为和平共处原则只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强调“由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推广到了国际方面，使它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的国家政策的基础”，实际上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解释成一条凌驾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其他各项原则之上的总原则，用它来限制和否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作为要求它们随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的论据。苏联领导人的这种错误观点和作法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我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坚决抵制和反对。70年代中期，苏联领导人公开表示，既然中国方面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苏联方面也同意“在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处理两国关系。80年代初以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苏关系逐步得到改善。1989年，中苏两国领导人举行高级会晤，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在具有历史意义的“中苏联合公报”中首次载明，两国“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这是中国同苏联、后来的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相互关系中最重要、最重要的指导原则。

在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毛泽东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十分注意尊重对方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他经常教导我们：“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他常常亲自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使节做一些说服工作，解释我国某些做法的原因，消除过去因不了解情况而说错的话的影响。他不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允许别人保留自己的意见。例

如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南共联盟拒绝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毛泽东当时表示：“他们说有困难，我们想也可以，我们不能强加于人，南斯拉夫不愿意签字就不签字好了。”

三

毛泽东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过程中提出的意识形态同国家关系分离的思想，是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键。

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共产党所领导。党与党之间的思想分歧往往容易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纠缠在一起，特别是苏联领导人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使得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严重扭曲。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及时提出了意识形态问题应该同国家关系分开处理，坚持党与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不应该影响国家关系。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初期最明显地表现在我国同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上，中南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早在两国建交之前就已存在。1954年毛泽东决定同南斯拉夫建交，这就是把意识形态的分歧同国家关系分开处理的作法。1956年，由于批判《南共纲领》，中南关系十分紧张，国家关系处于破裂的边缘。毛泽东又及时指示同南斯拉夫的“国家关系还得保持。……我们一万年也不要断”。1964年，我国主动采取了措施，调整了中南国家关系，双方在外交礼遇上转为正常。1971年6月南外长特帕瓦茨访华时，双方都表示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应影响国家关系的发展，并在联合公报中写明双方将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中南关系。

这之后，双方都严格遵守公报的内容，两国关系日趋正常，终于在1977年铁托总统访华时实现了中南关系的全面正常化。

5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对于国际形势，对于国际共运的路线和策略，对于对方的国际和国内政策产生了不同看法。这一分歧从一开始就不幸地影响到两国的国家关系。1957年毛泽东曾以内部商谈的方式向苏共领导提出了我党对苏共二十大若干问题的不同意见。当时中苏两党协调了立场，共同提出了《莫斯科宣言》并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所接受。尽管如此，中苏两党的分歧还是逐步激化了。两国的国家关系开始紧张起来。1960年6月，赫鲁晓夫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策划了几个国家的共产党会晤，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突然袭击，遭到我党的反击。7月份，苏联突然宣布撤走在华帮助工作的专家，撕毁了两国之间的几百个协议和合同并挑起中苏边界冲突，使得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与此同时，苏联方面开始通过决议、声明、文章等等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并不断采取了恶化两国国家关系的措施。

尽管如此，我国政府仍然真诚希望维护中苏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不愿意看到意识形态的分歧使国家关系恶化，并为阻止国家关系因此而逆转不断作出自己的努力。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路过北京时，毛泽东会见了。柯提出停止两党公开争论，毛泽东说：公开论战就是打笔墨官司，也死不了人。原则争论还要继续下去，但国家关系应该改善。1969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会晤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时，再次指出原则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关系的正常化。1970年5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中苏两国“应好好谈判，谈出个友好睦邻关系来”。1979年9月，在我国政府的建议下，中苏两国开始举行中苏国家关系谈判。1982年3月，当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中表示出有就“改善中苏关系的措施达成

协议”的意愿时，我国又通过外交途径向苏联建议双方就消除障碍、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磋商。同年10月，中苏两国政府特使开始磋商。1985年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开始加快。1989年戈访华期间，双方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对“某些问题上的分歧不应妨碍两国关系的发展”终于达成了共识。

在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我国也注意把意识形态问题同国家关系分开处理。在中苏争论时期，我国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区别对待的方针。在涉及意识形态分歧方面，我只原则表态，不予纠缠。在国家关系方面，在可能的情况下适当给予照顾，使得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不至于过分紧张和冷淡。

四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学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一个新事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的答案，也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供借鉴。恩格斯曾经指出：“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的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这一论断未免语焉不详，过于抽象，特别是独立自主只是被当作国际主义概念的一个部分，还未升华为一个独立的原则。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提出了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原则，即争取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他没有也不可能探讨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

系的问题。相反，列宁认为，在只有苏联一国取得革命成功的条件下，“不管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或者是从国际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保卫这个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和国是高于一切的。”这就是说，苏俄一国的利益就是国际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一个增加到许多个的情况下，这一断言显然是过时了。毛泽东根据战后出现的新情况，特别是针对苏联利益高于一切在实践中所产生的大国主义消极后果，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的思想，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的思想，而且为社会主义各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抵制和减少大国主义倾向对这种关系的危害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关于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基础的思想，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为我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发展，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建立一种健康、成熟的关系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规定了借以遵循的准则。回顾过去，应该说，在用和平共处原则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是逐步形成的，经历过反复，在处理某些问题上也并不是没有过失误和教训。不过可以相信，今后只要社会主义各国在彼此关系中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可以建立和发展良好的国家关系以及正常的党的关系，避免过去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曾经有过的那些忽视各国平等原则、把党与党之间的思想分歧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混淆在一起等错误。

其次，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正确对待前苏联东欧地区各国的变化，妥善处理我国与它们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众所周知，1989年以来，东欧中亚地区发生了战后最为深刻的历史性变化。苏联解体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五，捷克

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在这些国家，共产党不再掌权，原来的社会主义已被放弃。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由于我国同原苏联东欧各国的关系在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已经纳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轨道，在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的情况下，我们对这些国家的变化采取了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方针，及时承认这些国家的新政权；接着，我们又提出了以“三超越”（超越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异同）原则处理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我们的这些主张和做法得到了这些国家和人民的普遍欢迎和积极响应。根据这些原则，我们同前东欧国家保持和发展了关系，同新独立的国家迅速建立了关系，巩固了原有的外交阵地，拓展了新的外交空间。

第三，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的一个更深层的现实意义在于，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广运用于不论何种制度、何种类型的一切国家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在当前国际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两极格局终结、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时候，毛泽东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可靠基础。世界是多样性的，各个国家是有差异的，但又要在同一地球上长期共存和发展，因而需要一个各国都能遵守的国家关系基本准则，这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少数几个国家垄断和操纵国际事务是行不通的。中国人民将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争取早日建立国际新秩序，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学习毛泽东关于西欧联合自强的思想

高 存 铭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杰出的战略家，新中国外交的总设计师。建国后，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十分严峻复杂。毛泽东高瞻远瞩，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以极其丰富的革命经验，结合每一时期国际关系的特点和中国的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战略思想以及一些具体的方针政策，对我国的外交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开创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外交的新局面。毛泽东的外交思想非常丰富，富有独创精神。本文仅就毛泽东关于西欧联合自强思想的某些方面作一个初步的探索。

—

毛泽东关于西欧联合自强的思想主要产生于 60 年代初期，到 70 年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世界格局变化的角度看，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受到巨大冲击，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出现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世界格局开始趋向多极化。毛泽东英明远见，迅速地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以

非凡的革命胆略和智慧，向美苏两极格局提出挑战，推动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毛泽东提出西欧联合自强思想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出现并力图保持两极格局，它们在全球范围内争夺世界霸权，严重威胁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和独立。

二次大战后出现了两个超级大国。德、意、日战败，英、法被严重削弱，美国是唯一没有遭到战争破坏的大国，它凭借其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控制了西欧盟国，成为西方世界唯一霸主，并企图进一步独霸世界。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战后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发展了经济，加强了苏联军队的建设并大量驻军东欧，经济和军事力量都大大得到加强。苏还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并使核武器具备了一定的威慑力量。赫鲁晓夫上台后，苏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同美争夺霸权，期望实现苏美合作、主宰世界。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致力于扩军备战，在常规武器方面超过了美国，在核军备方面赶上了美国，苏对外战略更具明显的进攻性质，推行霸权主义，演变而成另一个超级大国。

美苏互为对手的局面在初期表现为两大阵营的对峙，到50年代中期，随着两大军事集团的建立，这种对峙达到鼎盛阶段。进入60年代，由于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资本主义阵营分裂，两大阵营的对立过渡到美苏争霸的格局。美苏从欧洲、地中海、中东、波斯湾到印度洋，甚至亚洲、太平洋都在进行激烈的争夺，而欧洲则是它们的争夺重点。它们争夺到哪里，哪里就不得安宁，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与独立受到严重威胁。第二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这些美苏之间的直接对抗曾一度使世界濒临战争的危险。到了70年代，苏联的侵略扩张更富有冒险性，成为最危险

的战争策源地。因此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成为中国和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迫切任务。

(二)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公开的和潜在的侵略和军事压力，捍卫中国的安全、独立和社会主义事业成为中国在国际关系问题上考虑的中心。

建国初期，对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国。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1950 年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同时派遣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在 60 年代对越南的侵略战争逐步升级，从三条战线威胁中国的安全。

从 50 年代后期至 60 年代末，中国受到美苏两个方面的压力。除了美国的威胁外，中苏关系由分歧到逐步恶化，直到最后两党关系破裂，苏联不断在边境挑起事端，在中国新疆地区策划大规模的骚乱，支持印度对中国的武装挑衅。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的驻兵从 1964 年的十几个师增加到近百万人。1969 年 3 月苏联在珍宝岛挑起武装冲突，中国军队被迫自卫反击。苏联还企图拼凑军事包围中国的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向美国试探它如袭击中国核基地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做好抵御苏美入侵的各种准备。

到了 70 年代初，美国为扭转同苏争霸的不利局面，开始同中国接近。1972 年 2 月尼克松访华开始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来自美国的威胁和压力逐步缓解，苏联便成为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

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中国在加强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友谊的同时，注意改善和发展同西欧国家的关系，以扩大反霸的国际统一战线。

(三)西欧联合自强的倾向有所发展，这种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当时特别令人瞩目的事件有：

1. 1958 年 10 月法国戴高乐重新上台执政，执行独立的外交

政策，向美国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1959年3月，法宣布撤回受北约指挥的法地中海舰队；6月法宣布不同意美在法建立核导弹基地和储存武器；7月，法又把美国驻法的战斗轰炸机赶了出去。法优先发展核武器，搞核独立。1960年2月，法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1963年7月，法国又拒绝签署莫斯科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6年3月，法国正式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10月北约理事会离开法国。1967年3月，驻法美军撤出法国。法国还不顾美国阻挠在1964年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2. 欧共体的形成和发展使西欧联合不断取得进展。欧共体的形成既有西欧国家的内部需要，也是外部压力的结果。1951年4月，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签订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1957年3月六国又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式成立。1958年4月，六国又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该条约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合并为一个共同体，统称为“欧洲共同体”。1973年1月，英国几经周折加入欧共体，丹麦、爱尔兰也正式被吸收为成员国。在苏美激烈争霸的形势下，以欧洲共同体为中心的西欧国家为了获得生存和发展、改变受制于苏美的局面，努力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朝着联合反霸的方向发展。

到70年代，面临苏联日益增长的威胁，西欧要求互相支持的倾向有进一步发展，并希借助欧洲以外的力量以加强其抗衡地位。加强同中国的联系与合作对西欧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个时期有不少西欧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相继来华访问。

二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毛泽东在会见一些西欧国家领导人时阐明了中国支持西欧联合自强、共同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重要思想。

1960年，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访问中国时，毛主席对他说：“我们不感到英法是个威胁，我们希望英法强大起来。”

在戴高乐上台后，毛泽东指出西方世界不是铁板一块，称赞戴高乐将军有勇气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强调对西欧和美国要有区别。1964年1月，毛泽东向法国议会代表团表示，“我们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还是可以合作。”“在我们之间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一是不许有哪一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二是两国在经济和文化上加强来往。”

英国加入欧共体后，1972年7月毛泽东接见法国外长舒曼时说：“你们现在跟英国搞好，我赞成，要团结起来才好，有时吵架是难免的，但总应该大团结、小吵架。”还说：“我们不希望你们那么乱。你们还要注意，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的，口里讲要打中国，实际上想要吞并欧洲，危险哟。”

1973年，毛泽东同法国蓬皮杜总统会晤时说：“英国加入共同体是件好事。”

1974年5月，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希思说：“如果欧洲是软弱的，俄国就有可能实现对中国的企图。因而一个强大

的欧洲是很重要的，它可以使俄国发愁。”毛泽东说：“你们欧洲强大起来，我们高兴啊！”还说：“美国人呢，就是手伸得太长了。你看，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台湾、东南亚、东亚、伊朗、土耳其、中东、地中海、欧洲。”

三

毛泽东关于西欧联合自强的思想源于毛泽东国际战略的思想，主要是“中间地带”思想，以及后来发展为“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的思想早在1946年就提出来了。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在这个“中间地带”的概念中就包括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

50年代末、60年代，世界经历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过程，毛泽东分析了新的世界形势和各种政治力量，对“中间地带”的概念做了许多新的补充。1962年他将“中间地带”界定为社会主义阵营和美国之间的广大国家，将“中间地带”划分为四个层次：有殖民地的国家，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垄断资本的国家，真正获得独立的国家，名义上独立、实际上仍然是附属国的国家。到了1964年，当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法美矛盾越来越尖锐的时候，毛泽东又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新思想，最初他将“两个中间地带”概括为一个亚非拉，一个是欧洲，以后又明确第二个中间地带是指欧洲、北美、大洋洲及

日本。毛泽东认为，两个中间地带（其中包括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与苏、美之间存在矛盾，他们都反对美国或苏联的控制。

60年代末到7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世界各种政治力量重新组合过程基本完成，国际关系出现了新的战略态势，形成了三个世界的格局，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从“两个中间地带”发展为“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1974年2月毛泽东对一位非洲总统谈话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为建立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指出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谁是可以依靠的革命力量，谁是主要的敌人，谁是可以争取、联合的力量。

无论是“中间地带”的思想，还是“三个世界”的思想，毛泽东总是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把资本主义世界当成铁板一块，而是加以区别对待。毛泽东把西欧国家同美国区别开来，归入“第二中间地带”或“第二世界”，指出西欧国家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对被压迫民族进行压迫剥削，另一方面又受两个超级大国的控制、欺侮或军事威胁，它们同苏美之间存在矛盾，在反对霸权主义斗争中是一支能同美苏抗衡的国际政治力量，一支可以争取、联合的间接同盟军，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支持西欧联合自强的思想。

建立最广泛的反霸国际统一战线是毛泽东根据长期国内政治斗争的丰富经验将统一战线理论模式创造性地运用到国际政治斗争上。毛泽东曾总结中国革命战胜敌人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其

其中之一就是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毛泽东又英明地解决了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即具有两重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说，“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毛泽东还指出，我们的策略原则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在国际反霸斗争中，毛泽东的上述光辉战略、策略思想再一次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四

毛泽东关于西欧联合自强的思想有其客观依据：

（一）西欧同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美国在战后执行的是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为达到这个目的，美竭力要控制西欧盟国。因为西欧拥有发达的科学技术，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处在美苏“夹缝”中的战略位置。美控制了西欧，便可增加同苏争霸的势力，进而可以独霸世界。此外，美国在西欧具有重大的利益，战后40多年来西欧一直是美国的重要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美国垄断资本每年从西欧获得高额利润。战后美国通过抛出马歇尔计划、拼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经济、政治、军事上控制西欧。美还力图在世界一些地区取代英法老牌殖民主义。西欧由于实力削弱不得不处于从属于美国的地位，但西欧为了自身的利益，并不甘心受美国的控制。随着西欧经济的发展，欧美矛盾日益发展。50年代的苏伊士运河战争明显地暴露了英法同美国之间的矛盾；60年代法国向美国“领导地位”提出挑战，联邦德国搞“新东方政策”；70年代的头几年里，美元贬值严重冲击西

欧经济，欧美在中东问题上的不同立场，西欧对美苏交易的疑虑以及对美核保护的动摇等都反映了欧美矛盾的不可调和。

苏联对外政策演变为霸权主义后，制定了同美国争霸世界的全球战略。该战略包括三个方面（西线、东线和南线），而以欧洲为战略重点。苏在加强控制东欧的同时，同美国争夺西欧，其主要手段是加强针对西欧的军事力量。苏将其70%的兵力部署在它的欧洲本土和东欧地区。华约同北约形成了重兵对峙的局面。西欧安全受到苏联的严重威胁。

2.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

战后初期，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中占有绝对优势，西欧由于受到严重削弱，只好在经济上接受美援，军事上依赖美国，政治上屈从于美国。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50年代后资本主义各国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到处搞侵略扩张，先发动侵朝战争，后又打了十多年侵越战争。这两次战争耗资巨大，相当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争费用的78%，经济开始相对衰落下来。这个时期西欧的经济却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德法发展得更快。从1950年至1972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6%，英国为2.9%，法国为5.9%，西德为7.9%，除英国外，法德两国工业发展速度都比美国快。西欧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其同美国闹独立提供了条件。西欧不再甘心受美国的控制、欺侮，要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呼声越来越高。西欧谋求打破两极格局，发展一个多极世界，使自身成为其中独立的一极。

五

毛泽东关于西欧联合自强的思想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推动了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并给中国外交带来了十分积极的变革。西欧一些主要国家过去都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五六十年代大多数西欧国家追随美国发动的反苏、反共的“冷战”，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50年代同中国建交的西欧国家只有7个（瑞典、丹麦、瑞士、荷兰、英国、芬兰、挪威）。中国最初对西欧国家的联合持有一定的看法。随着国际形势的新发展，毛泽东从理论高度对这些国家重新评价，指出它们具有两重性，在反霸斗争中可以成为我们的同盟军，这就极大地扩展了我国的外交回旋余地，打击了超级大国孤立中国的图谋，使我国在同自己的主要敌人之外的所有国家发展关系，以抗衡自己的敌人，维护世界和平和本国的独立和安全。

在毛泽东光辉思想指导下，中国对发展同西欧国家的关系持积极态度。在60年代中期中国同法国谈判建交，沉重地打击了美国孤立中国的图谋，在西欧打开了一个缺口，为我国同更多的西欧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提供了可能性。1964年，中国还采取了逐步前进的做法，先后同意大利和奥地利达成了互设贸易机构的协议，双方互派了商务代表。到了70年代，由于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和西欧国家关系有了突破性发展，中国同大多数西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十分重视中国同联邦德国的关系并亲自关心，1972年10月双方正式签署了建交公报。这是继中法建交后的又一个重大的外交行动。此外还有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冰岛、马耳他、希腊、卢森堡、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

相继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英、中荷的外交关系也从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圣马力诺同中国建立了总领事级的外交关系。从支持西欧国家加强联合的基本立场出发，中国对欧共体的发展作了积极的评价，并于 1975 年 5 月同欧共体正式建交。

中国积极开展同西欧国家的高层往来。西欧一些国家主要领导人，如法国总统蓬皮杜（1973 年 9 月），丹麦首相哈特林（1974 年 10 月），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1975 年 4 月），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1975 年 10 月）等先后来华访问。邓小平副总理访问了法国（1975 年）。通过这些访问，中国领导人向西欧国家领导人阐述了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指出两个超级大国在加紧争夺世界霸权，造成国际紧张局势，希望西欧能加强联合，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中国同一些西欧国家在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方面也发展了合作关系，中国从西欧引进资金和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

六

1989 年以来，东欧剧变，德国统一，苏联解体，支配战后国际关系长达 40 多年的两极格局已经结束，世界加速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在新形势下，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的基础也有所变化，但毛泽东关于西欧联合自强思想的基本精神对开展对西欧的工作，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同 60 年代、70 年代已大不相同。由于苏联解体，美国相对衰落，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争霸的紧张局面以及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情

况不复存在，世界大战的危险已大大减少。虽然由于国际力量失衡，引起国际局势发生新的动荡，地区冲突、民族宗教矛盾、领土争端等充分暴露出来，发生了海湾战争、原南斯拉夫地区的战争等，但这种动荡不致酿成新的世界大战。对西欧来说不再面临苏联的军事威胁。对中国来说也消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中国同西欧联合抗苏的基础已不再存在了。

（二）但中国同西欧国家之间仍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而且在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重要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与西欧之间的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因此，我们仍要重视和发展同西欧的关系。

1. 为争取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冷战结束，世界大战危险减少，但世界并不太平。为维护世界和平，需要继续推动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使世界上各大政治力量互相平衡，互相制约，不再像过去那样让一两个超级大国来威胁世界和平。而西欧联合有利于世界多极化的加快发展。西欧在欧洲形势的变动中受益最大，以欧共体为核心的西欧联合发展使西欧成为世界政治和经济事务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地位和作用明显增强。西欧联合进程中目前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欧共体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都获得了好处，经济上相互依赖很深，它们是不会让一体化进程停顿下来；在国际上为了有效地同美日竞争，也只有继续推进联合。

2. 在国际关系中可以扩大外交回旋余地。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欧国家追随美国对我国实行制裁。东欧苏联剧变后，对我进一步施压。但在西方国家中，中国同西欧之间的利害冲突较少，欧共体对华制裁仅保留了两个“尾巴”，双方关系正朝着全面正常化方向发展，高层访问增多，经贸关系日益发展，特别是中德关系有较大发展，南欧国家对华态度也比较积极。中国可以发展同

西欧关系来扩展自己的外交回旋余地。西欧国家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也需要发展同中国的关系。

3. 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经贸关系和科技合作大有可为。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中国人民正集中精力从事经济建设,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中国可以从西欧引进四化建设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资金和先进的管理经验。西欧由于内部市场趋于饱和,看好中国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特别是西欧近年来经济严重困难,为摆脱困境,更急于向欧洲以外地区开拓。而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政治稳定,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对西欧各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当前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重要,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大国,西欧是西方发达国家集中的地区,是世界最大的经贸集团,双方在经济上有互补性,双方发展经贸关系和科技合作对双方都有利,而且前景要比过去的年代更加广阔。

(三) 西欧对华政策仍有消极的一面。

西欧国家随着本身实力的增强,在国际事务中强权政治的色彩日益增强。它们打着“人权”、“民主化”的旗帜干涉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还把援助同所谓人权挂钩,作为施压工具。西欧在对华关系上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化,在人权、西藏和对台关系上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特别是法国售台武器问题、英国在香港问题上抛出所谓“政改方案”,欧共体在贸易上采取保护主义等都反映了这一点。因此我国主张西欧联合应有利于欧洲和世界和平与稳定,有利于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经济与合作,有利于西欧国家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将按照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四项原则发展同西欧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试论毛泽东关于中法关系的战略思想

曲 星

1964年中法建交曾震动了整个世界。在当时世界两大阵营严重对立，美国竭力孤立、敌视新中国的背景下，作为资本主义大国的法国不顾美国压力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对美国的反华政策不啻为一沉重打击。中法建交这一行动本身，又是战后世界政治力量分化、改组的一个重要标志，对战后国际关系两极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对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改善中国的国际处境，都产生过积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建立之初，法国曾是西方大国中追随美国最紧、一直拒不承认新中国的国家。由紧密追随美国拒不承认新中国到与美国闹强烈独立性而率先与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一巨大变化是怎样发生的？毛泽东是怎样抓住法美矛盾而加以利用的？毛泽东在决定与法国建交时的战略指导思想是什么？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与中法关系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相继完成后，中国共产党

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已成定局。怎样处理新政权的对外关系，便提上了中央领导的议事日程。1949年春夏之交，毛泽东提出了外交领域的三个重要政策思想，即“另起炉灶”、“一边倒”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其中“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包括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其一，“不急于与帝国主义国家建交”。毛泽东在1949年3月的西柏坡会议上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这是因为“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就以平等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他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在中国以合法地位”。其二，在与帝国主义国家建交之前，必须先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毛泽东1949年2月在西柏坡会见米高扬，谈到新政权对外关系总方针时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统统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来。”后来周恩来在解释毛泽东这一思想时更明确地指出：“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思想反映了毛泽东对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判断，即百余年来帝国主义习惯了与“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历届中国旧政府打交道，它们决不会很快以平等原

则来对待新中国，中国人民要想真正挺起胸膛办外交，就必须首先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真正把自己家里的事情办好。从这种思想出发，毛泽东 1956 年 9 月 30 日曾对外宾说过：“英国、美国、法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我们迟一点给他们合法地位，就好一些。”新中国建立初期，美国、英国对华政策已为人所熟知，美国先是要求中国新政府“承担一切国际义务”，即保证西方国家继续享受旧条约所赋予的特权，继而公开声明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竭力把新中国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英国虽然宣布承认新中国，但又拒不撤回在台湾淡水的领事馆，在联合国不投票支持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实际上是搞“两个中国”政策。美、英对华政策已经证明毛泽东上述判断的正确性。那么资本主义世界另一大国法国当时的对华政策又是怎样的呢？

中国解放战争辽沈战役结束后，法国政府认为“无论如何，共产党的影响在华北、华中都将占主导地位”。为了应付这一局面，法国外交部有关部门曾经设想通过鼓动中国南部分裂主义势力来抵抗共产党的影响。1949 年 1 月 4 日，英国政府就中国局势问题致函法国外交部，指出蒋介石政府的消失及共产党制度扩展到全中国已不可避免，因此应研究这一局面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法国外交部经济与金融事务司在分析英国政府备忘录时提出：英国人对中国局势过于悲观，蒋介石引退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消失，情报表明一个南方政府将在广州组成，即使国民党军队重新集结已不可能，难道不能设想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的分裂主义势力对共产党的推进形成强有力的阻碍？“这些省份与法属印支毗邻，其产品出路依赖法国的有关政策，只要法国能了解这些地区领导人的心态，并向他们提供某些经济便利，比如帮助他们建设已被中国中央政府放弃的成渝铁路计划等，法国就可以对中国这一地

区始终很活跃的分裂主义势力加以利用。”法国外交部采纳了这一意见，一方面派法国驻华经济代表前往这些地区活动，另一方面回复英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应忽视中国一分为几的可能性。应在经济关系中鼓动很可能在中国南方成气候的地方主义。”法国当时驻中国广东代表雅克·鲁还会见了国民党驻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答应向他提供物资援助以抵抗共产党的进攻。

1949年4月解放军一举打过长江，以风卷残云之势向南方推进的事实打破了法国政府“利用南方分裂主义势力阻碍共产党南进”的构想。法国政府内部开始讨论是否承认新中国问题。法国当时的驻华大使麦里耶与法国驻印支总督皮涅在这一问题上意见尖锐对立。麦里耶认为，由于法国与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不同，因此法国对远东政策也应该与美国有所区别，一俟中国新政府宣告成立，法国就应立即给予完全承认。原因有二，其一，从法国对印支的统治着眼，“一旦双方相互承认，这一承认便产生法律义务，迫使中国共产党人承认并尊重其邻国的合法边界。”即不支持印支共产党活动。其二，从法国在华利益着眼，如果法国不承认中国，那么“法国在华的文教事业、企业及殖民地将失去使领馆的保护。法国将在几个月内失去直到目前它在中国所得到的一切”。然而驻印支总督皮涅坚决反对立即承认新中国，他认为“过早承认一方面会使中国共产党政府享有国民党政府根据中法1946年条约在印支享有的行动手段，另一方面也会被越南舆论认为是法国软弱的表现，而且外交承认还意味着共产党中国的领事将常驻印度支那，给印支共产党运动以有力支持。”法国外交部亚太司长雅克·巴延认为应该采纳皮涅的意见，“法国在华利益固然重要，但法国在印支的利益更为重要，因此法国政府应根据法属印支的利益来确定对华政策。”法国迟早要承认中国新政权，但是法国没有任何理由急于给予这种承认，巴延把这种政策称之为“等待与保留”

政策。

在法国的“等待与保留”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0月31日，法国政府收到了英国政府的又一份备忘录，英国政府正式通知法国它将于近期承认新中国。在回复英国政府的备忘录中，法国政府“提请英国政府注意，国民党政府尽管已大败在即，但却仍然控制着与印支毗邻的边境地区。在此情况下，不应该在政治上采取任何可能削弱国民党军队在南方省份抵抗共产党进军的措施。法国政府要求英国政府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以避免过早承认中国新政府。”法国外交部长罗伯尔·舒曼还亲自要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英国不急于作出承认新中国的决定。1950年1月19日，联合国安理会投票表决苏联关于驱逐蒋介石代表、接纳新中国代表提案时，法国投了反对票。英国政府认为安理会的一票是它“在将与共产党中国进行建交谈判时所唯一可打的牌”，因而这张牌不应过早打出。而法国的反对票却是十分关键的，因为安理会表决苏联提案前，挪威和埃及都曾向法国表示，它们投什么票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法国的态度，而英国对此案投弃权票也主要是因为英国事先已了解到苏联提案不可能通过。因此，如果法国投赞成票，并带动挪威、埃及及英国投赞成票，苏联提案将不是以6票反对遭否决，而将以7票赞成获通过。

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中法关系有一定改善，双边民间往来增多，两国外交代表也在日内瓦进行接触，商讨建立两国政府间“联系渠道”事宜。但是，在中国政府最关心的台湾问题上，法国第四共和政府仍然不敢违背美国意志，而只是想搞“两个中国”。日内瓦会议后，中国政府为了进一步改善中法关系，曾作出过一些姿态，例如1954年“十·一”前夕，中国驻外使馆曾致函法国驻各驻在国大使，邀请他们出席中国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但

是法国外交部亚大司在研究中国邀请函时认为：“中国首次向我们驻外使节发来这种邀请，不应被视作中国政府对我们的好感或愿意缓和的表示，这不过是一种策略，其目的是影响法国舆论，通过讨好法国来分化西方阵营，有意侮辱台湾，并使法美关系处于难堪。”因此，法国外交部向其驻外使节发出指令，除个别例外，不得参加中国使馆的国庆招待会。法国政府认为其对华政策应服从其“大西洋政策”的需要，“法国有不容忽视的盟友，它们在保卫法国根本利益方面所起的作用使法国负有某种义务，大西洋方面的团结必然在远东地区产生影响。例如，法国参加了东南亚条约组织，而该组织是以共产党中国为主要敌人的，法国既然要与该条约其它成员国保持一致，就不能因与该组织的潜在敌人的关系而受到牵连。”具体到台湾问题上，法国政府认为，“不论美国对北京的态度可能会有何种松动，但毫无疑问美国对福摩萨的支持还将是长期的。福摩萨的政治和法律地位将得到确认，因此，应该把福摩萨作为远东政治地图上的一个持久因素来加以考虑。”“法国应该尽可能持久地保持与福摩萨政权的现有关系，甚至有必要给该政权以利益上或面子上的满足，以尽可能平息由于法国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而引起的台北方面的不满。一旦联合国和西方国家正式认可福摩萨和北京两个政权的并存，——这并非不可能——我们就将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从我们现在就向国民党政府作出的姿态中获得额外好处。”这是法国“两个中国”政策的起源。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法国政府决定在不改变与台湾当局关系实质的情况下发展与中国的“事实上的关系”，即把双边关系局限在经济文化领域并争取在北京派一常驻领事。1955年8月22日，法国外交部亚大司新任司长雅克·鲁前往日内瓦会见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提出了要在北京派常驻领事的请求；同时他又表示

法国目前无法接受中国领事常驻巴黎。这种明显的“两个中国”的作法和不平等的要求当然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9月2日，当雅克·鲁再次前往日内瓦会晤王炳南时，王炳南奉命向他指出：“中国目前不能考虑接受法国官员常驻北京。原因是：法国继续与台湾当局保持关系，法国还在联合国追随美国反对恢复中国席位”，王炳南特别强调，“有些人总抱着两个中国的幻想，请法国政府切记，中国政府永远不会接受类似方案。”

在考察了新中国建国初期法国对华政策走向后，我们不难作出下述判断：1. 新中国成立之初，法国政府内部确实存在承认与不承认两种意见，但法国当时的当政者作出了对华政策应服从于对印支政策的决定。新中国无论从政治、经济或军事上来说都是一个有影响有潜力的大国，法国政府没有把与新中国发展关系作为其远东政策的重心，而把政策重心放在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注定要失败的印支殖民政策上，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短视的政策。2. 印支战争结束后，在中国政府作出改善两国关系姿态的情况下，法国政府又作出了对华政策应服从大西洋政策，即对美政策的决定。这就决定了当时法国政府寻求的只能是在不违背美国意志的情况下执行一种“两个中国”的政策。这不是一种平等待人的态度。还应该看到，即使是主张立即承认新中国的麦里耶等人，也仅仅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法国在华利益”。而当时法国在华利益主要集中在文化、宗教领域，而不是在经贸领域。下面的数字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直到1949年，在西方国家在华投资中，法国仅占4.5%，1949年以前中法贸易额从未超过两国各自外贸总额的1%，法国常常排在中国外贸伙伴的第二十名之后。但法国作为天主教在华保护国，宗教文化势力却相当大。在外国在华总主教和主教人数中，法国分别占了37.5%和46.7%。法国在华开办的大中小学分别占了外国在华所办大中小学总数的17.6%、19.4%和

15.9%。法国宗教文化势力这种大规模渗透中国的作法，早就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尖锐对立，尤其是这种渗透是与西方列强对华炮舰政策紧密相连的，中国社会一直存在强烈的反洋教情绪。过去历届政府执行的恃外压内政策是外国宗教文化势力得以在华存在并发展的重要原因。怎么能够设想，遭受了西方列强百年凌辱的中华民族，在经历了一场以推翻亲帝国主义的腐败政府为目的的社会革命后，继续容忍这种状况的存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这种历史要求。在这里，中国社会的历史要求与西方国家对华政策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华民族要求在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之后再与这些国家建立正常关系，而西方国家则把中国保护其在华特权与势力作为承认中国新政权的前提。姑且不论法国政府当时能否顶住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对法国所施加的压力，也不论中法两国在印支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仅就法国力图保住其在华特权与势力而言，当时的中法关系也是无法正常展开的。毛泽东“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思想极其鲜明地体现了“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的特点，与历届旧政府对西方列强的奴颜媚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掌握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主动。应该说，建国初期中法关系的实践再次证明了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深刻性。

二 不拿法属殖民地人民争取 民族解放的利益作交易

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之时，正是印度支那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而与法国殖民主义鏖战之时。显然，支持印支人民抗法势必影响中法关系。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否有过为了中法

关系而不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斗争的想法呢？还是用事实来说话。中国与越南的共产主义运动几乎是同时兴起的，胡志明与周恩来等人早在1922年就在巴黎相识。20年代中叶，胡志明曾作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的翻译在中国活动。在此期间他建立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特别政治培训班，该班与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有密切联系，刘少奇、李富春等未来的中共领导人都应邀到该班讲过课。30年代末胡志明从苏联返回越南途经中国西安、延安、重庆等地时，与叶剑英、周恩来等又有频繁联系。1947年，当中越两国解放战争都到了关键时刻时，中越两党建立了直接电台联系。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胡志明派出了两位特使携带给周恩来的亲笔信前来北京“寻求最紧急的援助，以便尽快战胜对手”。10月5日，这两位特使回到越南，向胡志明汇报了与中方达成的三点原则协议：1. 中方允诺新政权成立后将在外交上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并尽一切力量帮助其获得国际承认；2. 军事上，新政府将向越盟提供武器、物资援助及派遣军事干部，支持越南抗法斗争直到胜利；3. 两国将在边境地区实行共同防务，以对付可能出现的美国、法国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相互勾结进攻中越革命力量的情况。为了使这些原则协议具体化，胡志明又于1950年1月秘密访问中国和苏联，与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等就印支革命问题进行会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向越南派出了以罗贵波为首的政治顾问团，继而又派出了以陈庚和韦国清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大批中国军事和技术专家奔赴越南，大量军援物资运往越南。中国的援助是越盟取得边界战役和奠边府两个关键战役胜利的重要原因，也是法国能够接受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关键所在。

以上事实说明，还在新中国宣告成立之前，中国援越抗法的大政方针即已确定，新中国一宣告成立，这一大政方针就立即付

诸实施。中国领导人不是不知道援越必将影响法国对华态度。实际上，法国政府屡屡放出风声，声称法国对中国新政权持什么态度取决于中国对印支的态度。法国驻北京前总领事伯亚乐也曾有意向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透露法国正在考虑与中国新政府建立关系，以期影响中国的印支政策。但是，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中央认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正义斗争。援助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对越南抗法斗争的支持是建国初期法国不承认新中国的主要原因。1954年日内瓦会议恢复印支和平后，法中关系的主要障碍似乎已经消失，中法关系也有所缓和。但紧接着法国的另一个海外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又打响了民族独立战争的第一枪。法国曾希望中国出于中法关系的考虑，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不再采取在印支问题上那样的立场。法国参议员密特朗1961年访华时曾说：“中法建交必须在阿尔及利亚问题解决之后。”言下之意是：中方如果不改变目前支持阿尔及利亚抗法战争的政策，中法建交问题是无法提上议事日程的。对此，中方以同样鲜明的态度表示：“我们对中法建交可以等待，但我们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将一直持续到他们的独立斗争取得最后的胜利为止。”事实上，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一打响，中国就给予了义无反顾的支持，中国政府很早就承认了阿尔及利亚人民自己的临时政府。毛泽东本人多次会见这一政府派来的各种代表团，表示对他们的支持，鼓励他们必胜的信念，并提出斗争策略问题供他们参考。毛泽东是从反对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高度来看待阿尔及利亚战争的。1958年12月11日他对阿尔及利亚朋友说：“你们正在斗争着，在反帝国主义的形势下，我们这里也算是一条前线，是东方的前线，是在太平洋的西边。你们是西方

的前线”，“我们应该支持你们，因为你们在反对帝国主义，跟我们的斗争一样。这是我们的国际义务。”1960年他又对阿尔及利亚朋友说：“你们的斗争支持了我们，你们牵制了很大一部分帝国主义力量，你们在北大西洋的后方开了一个战场。”至于中法关系，毛泽东说：“我们与法国没有关系，只要有可能就会支持你们，不仅在道义上，而且在物资上”，“法国不承认我们，还有蒋介石代表在巴黎，那么中国为什么不支持你们，为什么不同你们往来。”毛泽东特别说明，中国不会为了与法国建交而不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如果有一天法国政府找我们，我们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要同蒋介石断绝外交关系；一个是不能干涉我们援助你们，如果它把干涉我们援助你们当作一个建交的条件，我们不干。”毛泽东的思想很清楚，支持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事业高于与殖民宗主国的双边关系，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不能建立在放弃对正义事业支持的基础上，而正义事业一旦取得成功，西方国家早晚也只能面对现实。1964年在谈到中国对印支人民和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支持与中法关系时，毛泽东曾说：“法国过去和越南的胡志明作战，后来又和阿尔及利亚作战，我们都帮助过这两个国家的斗争。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我们和法国就没有纠纷了，我们发生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对胡志明反对法国的侵略，对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的侵略，我们是公开支持的，这样岂不要得罪法国政府吗？不，胡志明胜利了，本·贝拉胜利了，法国承认了中国。”毛泽东的这种思想不仅有利于在健康的基础上发展中法关系，而且从根本上说也是符合法兰西民族利益的。历史已经证明，正是在法国被迫先后承认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后，法国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长期的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经济停滞的局面中摆脱出来，进入了稳定发展阶段。

三 美法之间的矛盾应该利用

毛泽东很注意分析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早在 1946 年提出“中间地带”理论时，毛泽东就指出：欧、亚、非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都是美国在进攻苏联之前而必须压服的对象。这里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当然包括法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大国。进入 50 年代，法国与美国在印支和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暴露出的矛盾也很快就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曾对富马说过：“现在法国忙于非洲，顾不上这儿，美国不但在越南，而且想在非洲代替法国人。”苏伊士运河事件的发生加深了毛泽东的这种看法。1956 年 7 月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后，持有大量运河公司股票的法西斯与英国一起采取了强硬态度，直到武装侵犯。而美国的立场却耐人寻味。埃及收回运河本来是以美国宣布撤销其“阿斯旺大坝”投资计划为发端的，反美情绪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事件发生后，美国一方面在背后向英法表示美国“不排除使用武力”，一方面又在公开场合声明：“美国不打算以武力为自己打开通过运河的道路。”在整个事件中，美国的态度十分含糊，似乎是在支持英法，似乎又有很多保留。从这些迹象中，毛泽东敏锐地看到：美国暗中纵容英法进攻埃及，既削弱英法，又将阿拉伯世界的敌对情绪引向英法，而美国自己则在公开场合持貌似公允的态度，以获取阿拉伯世界的好感，进而取代英法在这个地区的地位。毛泽东分析道：“表面上美国是在帮助英法，但实际上并不如此，因为美国人很喜欢运河那个地方。”“运河还是交给埃及好。英国、法国想夺取运河，结果美国反而插进来了。英国、法国是整了自己。”“这次英国、法国遭受了很大损失，同美

国比较起来，英国、法国已是二等国家了。”“如果英法早些靠拢纳赛尔，不要去打埃及，倒会对英法有利，而现在自己被逐出，把美国引进了（中东、近东）。 ”

印度支那战争，苏伊士运河，阿尔及利亚战争等一系列事件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法国的地位在下降。毛泽东多次指出：“法国现在在困难中。法国不肯缩小，也怕缩小，想维持现状，但是它今天还是在缩小。”“法国当时可神气了，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弱了，站不住了。”既是殖民帝国，现在又在衰落，美国就必然力图取而代之，这样美国与法国的矛盾就必然上升，利用美法矛盾也就成为可能。1960年5月17日毛泽东对阿尔及利亚客人说过：“美国给戴高乐提供军火飞机侵略阿尔及利亚，是要把你们消灭掉，把我们灭掉，甚至把戴高乐也灭掉，只剩下它。戴高乐同美国又合作又有矛盾，在斗争中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1962年1月3日他在会见外宾时又说：“英国和法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但是，是大帝国主义美国想吃掉的中等帝国主义国家，它们也很难混，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者，因为他们同美国也有矛盾。”“可以利用的一点是，英法在亚洲和非洲有殖民地和附属国，或者有些国家形式上独立了，但英法在那里还有强大的投资，美国想把英法从这些地方挤出去，用新殖民主义来代替旧殖民主义。”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签署“埃维昂协议”，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后，1963年毛泽东就此作出分析：“法国现在和你们停战，这对法国统治者也是有利的，他们可以和美国讲价钱。现在戴高乐要的价钱比较高了，不那么十分服从美国的命令，不那么听话，说明帝国主义发生裂痕，这种情况你们也可以利用。”1960年毛泽东曾对英国客人说：“我们希望你们强大一些，希望法国强大一些，希望你们发言权大一些，那样事情就好办了。”法国戴高乐上台后坚决执行对美独立政策，在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之后，中法关系

的突破有了可能。

四 珍视独立自主是中法两国最大的共同点

戴高乐自 1946 年从法国政坛隐退至 1958 年复出期间，曾对法国的国际地位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认为法国世界大国的地位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恢复，根本原因是法国第四共和历届政府总是在“两极格局”世界中扮演“小弟弟”的角色。因此他主张通过“欧洲联合自强”来提高法国及欧洲的地位。这种想法与毛泽东关于“第二中间地带”的分析是有共同之处的。关于法美关系，戴高乐深感法国的安全靠美国来保障是靠不住的。他清醒地认识到：“谁能保证法国一旦遭到侵略美国就能保护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是在法国受到进攻 3 年后才有所行为，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在几乎遭到灭顶之灾的情况下也没有得到美国的有效援助。”因此戴高乐在 1958 年重新执政后，把国防与外交的独立自主作为立国之根本。他退出了北约军事组织，赶走了北约司令部，收回了法国对其海陆空三军的完全指挥权。尽管当时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与中国有严重分歧，但在中国关心的某些问题上，戴高乐却并不完全附和美國。如 1958 年 8 月中国炮轰金门、马祖时，美国一面对中国发出战争叫嚣，一面调集大量军舰到台湾海峡，大有与中国一战之势。当时法国并没有附和美國攻击中国“侵略”，而只是含糊地表示“不要诉诸武力”。又如 1960 年刚果事件发生时，中国严厉指责美国借联合国之手干涉刚果内政，而法国在安理会表决向刚果派遣联合国部队提案时却投了弃权票，在联合国关于刚果的特别大会讨论时，法国代表明确指出：“在刚果组成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完全是刚果的内政，不应该受到任何外来干涉，包

括联合国的干涉。”再如在1961年至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中国主张只有以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为基础并排除一切外来干涉，老挝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而法国也主张“回到1954年日内瓦协议是解决冲突的首要步骤。”美国没有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会议，与法国的这种态度是有关的。特别是，在保持自己核防卫力量独立这一点上，中国与法国的立场完全一致。

毛泽东把戴高乐执政后与美国闹独立作为1958年世界上发生的重要事件之一。1959年3月13日他在会见外宾时指出：“北大西洋集团四分五裂，主要是由于美国、英国、法国、西德之间的利害冲突，这种冲突在年底明朗化了。”毛泽东同时也开始注意戴高乐性格的两面性：“我们对戴高乐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说他不错是因为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性。他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棒，他不准美国在法国建立空军基地，他的陆军也由他而不由美国指挥。法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原由美国指挥，现在他也把指挥权收回来了。这几点我们都很欣赏，另一方面他的缺点很大，他把他的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使他的手脚被捆住。”

在戴高乐与美国闹独立，力图摆脱美国控制的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正在与苏联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坚决斗争。在当时国际关系的背景下，中法两国各自与自己的主要盟国进行斗争，捍卫本国主权独立的行动引起了举世瞩目。毛泽东对中法两国的这些共同点有充分认识，“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1964年1月30日他在会见法国外宾时说：“我们之间有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侮我们；第二，就是使两国相互往来。还有一条跟你们共同的，什么三国条约，我们不参加，那是一种欺骗、讹诈，是压我们的。事先我们并没有交换过意见，你们不参

加，我们也没有参加。”

由于中法两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接近，更由于戴高乐能够执行对美独立政策，因此法国在台湾问题上突破美国禁令便有了可能，而法国如果能在台湾问题上接受中国的立场并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都将是一个沉重打击。从此时起，毛泽东更密切地注意戴高乐对华政策的动向，决定超越中法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发展两国关系。毛泽东1961年会见法国参议员密特朗，当密特朗提到中法之间被一堵墙隔开了的时候，毛泽东说：“墙有各种不同的墙，有意识形态的墙，有社会制度的墙，有外交关系的墙，有经济关系的墙，这是暂时的现象，人民终究是要把墙拆掉的。意识形态的墙和社会制度的墙只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拆掉的。”毛泽东在1964年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也强调过这一点，“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

当戴高乐经过认真思考，终于决定派出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持其亲笔信来华谈判建交时，毛泽东果断地决定抓住这一时机，与法国达成建交，而且一定要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正如他在会见富尔夫妇时所说，“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关系建立起来”，“你们要派就派个大使来，不要学英国那样，搞了十几年，还是个代办，不要钻美国的圈套。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在谈判中法国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并表示法国可独立作出决定，不需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只是在如何表示法国在台湾问题上立场的方式上有自己的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表现了策略上的灵活性，提出了公开声明与内部默契相结合的方案，使中法建交谈判迅速达成协议，双方于1964年1

月 27 日正式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法国承认中国的这一行动有如在西方阵营中扔下的一颗炸弹。华盛顿痛苦地感到“戴高乐在美国背后捅了一刀”。伦敦担心“法国既没有军事手段,也没有财政手段,却要在远东与美国作对,整个西方阵营将因此而削弱”。西德强调它曾多次提醒法国“保持西方团结的必要性”,“现在只好寄希望于法国走出的这一步不损害自由世界的利益及西方各国的协调了。”在美国的右翼报刊上,戴高乐的决定更是被攻击为“背叛”、“粗暴”、“武断”、“严重错误”等等。西方阵营对戴高乐的这种攻击从反面说明了毛泽东关于中法关系战略思想的成功。

中法建交至今已 30 年。30 年前,中法这两个在两大阵营中分别有影响的大国同时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形成了战后国际关系中一种新的气象。毛泽东从世界和平和中法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克服两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两国关系,使中法关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楷模,两国经济关系也因此而有所受益。

毛泽东关于睦邻友好政策 的思想和实践

马 行 汉

一 睦邻友好政策是毛泽东和平外交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就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1949年7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又指出：“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成为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建国以后在《共同纲领》和《宪法》中肯定了下来，并且在实践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我国和周边国家在历史上有着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压迫的共同遭遇，在争取和维护国家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等方面有

着相同的目标与任务。但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和帝国主义的挑拨，某些邻国对新中国有一定疑虑。基于这种情况，毛泽东把搞好同周边国家关系放在了新中国外交的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初期，除苏联和东欧国家外，朝鲜、蒙古、越南、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相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有的邻国在美国的压力下不敢承认我国，有的只搞些民间往来。对于这些国家的困难处境，毛泽东采取了谅解的态度，并主动和耐心的工作。1955年10月间毛泽东在接见某国国会议员访华团时表示：“你们现在难以承认我们，我们是谅解的，我们不会责备你们。我们彼此间可以先搞些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以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一步一步的就会建立起邦交。按照你们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做，如果暂时不能承认我们，我们可以等待，有误会的可以慢慢解释。”毛泽东向外宾揭露美国的谎言时说：“美国说我们是殖民主义，讲我们的坏话，说我们争夺他们的市场。这是不对的。因为第一，中国没有抢夺各国市场，而是美国人在抢夺各国市场；第二，不是中国在各国建立军事基地，而是美国在建立军事基地；第三，中国没有派军事顾问团到各国去，而是美国派军事顾问到各国去，中国没有同各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并附有政治条件。”由于毛泽东所制定的包括睦邻友好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正确的外交政策，促使同中国建交的周边国家逐年增加。

二 支持邻国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 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国际主义和 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崇高精神

新中国建国初期，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国。要维护和巩固

中国的独立和安全，不能不主要同美国作斗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当时反美斗争中最伟大的战略决策。它突出地体现了毛泽东在对外关系中支持邻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国际主义和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崇高精神。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朝鲜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随着美国侵朝战争的升级，美国对中国的挑衅更是有增无减。在中国安全受到极其严重威胁的时刻，为援助朝鲜人民，为保卫刚诞生的新中国，毛泽东毅然发出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命令。他作出这一重大决定，是从当时中国、朝鲜、亚洲乃至世界战略形势出发的。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我们采取积极的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是极为有利的，而不出兵，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中国东北更不利。”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的决策是正确的。经过针锋相对，打谈结合的斗争，美国被迫同意于1953年7月27日签订朝鲜停战协议。抗美援朝，产生了震惊世界的影响。

美国在入侵朝鲜的同时，加紧干涉印度支那。中国政府 and 人民，从一开始就全力支持印支三国人民的抗法、抗美援朝。毛泽东把这种支持视为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毛泽东曾对越方领导人说：你们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们的事就是你们的事，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越南领导人很感激中国的援助，说：我们的人民和军队情绪这么高，打得这么英勇，就是心里时时刻刻都想到后面有中国的支持。

对坚决执行和平中立政策、敢于反对外来侵略的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亲王，毛泽东一直是同情和支持的。1970年3月18日美国乘西哈努克亲王出国访问之机，策动柬埔寨右派发动政变，

推翻了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在西哈努克亲王困难的时刻，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地站在西哈努克亲王一边，当西哈努克亲王3月19日从莫斯科到达北京时，中国政府仍以国家元首的规格欢迎他。毛泽东让周恩来告诉他：中国已发表了亲王作为柬埔寨国家元首抵达北京的消息。中国支持你们的立场是清楚的。只要亲王有决心斗争到底，中国一定支持你，中国决心支持亲王直到亲王胜利回国。对美国于1970年4月悍然入侵柬埔寨的事件，毛泽东于同年5月20日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庄严声明。对于中国的支持，西哈努克亲王甚为感激，他在1975年8月27日对毛泽东主席说：“我认为我们的胜利是两国人民的共同胜利。”他特别提到毛泽东的“5·20”声明说，全体柬埔寨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历史性的声明，柬埔寨的实践证明了毛泽东主席在声明中所作出的小国只要敢于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就可以战胜强国的论断。

三 巩固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团结，打破美国孤立和封锁新中国的图谋

为了打破美国孤立和封锁新中国的图谋，毛泽东制定了争取亚非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一系列政策。他多次指出，我们要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

“强调求同存异，找共同点”，是毛泽东争取和团结包括周边国家在内的亚非国家重要政策思想。他在1954年10月19日同印

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指出：“所有我们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中国人民有爱国的感情，有对印度人民和其他东方国家人民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尼赫鲁当时对毛泽东的论点表示同意并说：“自古以来中、印两国就有许多共同点，现在的问题也是共同的。如果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付诸实施，就能消除恐惧。”为了改善同印度的关系，恢复传统友谊，毛泽东1970年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说：“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印度人民是一个伟大的人民。中印两国人民总是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嘛！请问候你们的总统和总理。”不久，印度使馆临时代办向中国政府转达了印度政府准备开始同中国对话的口信。至1976年中印双方又互相派出大使，结束了15年间两国事实上只维持代办级外交关系的局面。

巴基斯坦同中国建交较早（1951年5月），但在建交初期，中巴关系比较冷淡。毛泽东本着求同存异精神，为加强中巴友谊做了大量工作。他多次对巴基斯坦朋友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都是东方国家，东方国家有许多共同点，都受西方国家的压迫；中巴之间从来没有战争，现在也没有任何争执，中巴间有贸易往来，因此中巴应成为好朋友。中国愿意看到巴基斯坦的事情办好，人民幸福，国家富强。”1962年以后，巴基斯坦进一步改善对华关系。中国政府做出了相应的反应，决定发展和加强对巴基斯坦的关系。此后两国政府领导人多次互访，就国际形势、发展两国关系交换意见。1972年2月巴基斯坦总统布托访华时对毛泽东表示：“巴基斯坦不想做任何使中国为难的事，因为使中国为难，就是削弱巴基斯坦的力量。”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和巴方领导人

的共同努力，中巴关系逐步密切。

四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消除邻国对中国的疑虑

为了增进了解，减少邻国对中国的疑虑，发展友好关系，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毛泽东外交思想对国际关系的杰出贡献，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列宁关于两种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主张。在毛泽东的对外活动中，他不断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出这些原则是我国同各国尤其是同周边国家相互关系的指导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不干涉别国内政。1954年某国政府领导人曾要求中国对该国反政府党派做做工作，说几句话。毛泽东当即婉拒其要求并指出：“中国希望你们国内和平，至于具体地如何取得国内和平，那要你们自己处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表示态度是不妥当的。中国只能以每一个国家的政府为对象来解决问题。”毛泽东还强调了中国不输出革命的立场。该国领导人听后很受感动，说：“我把毛主席对我的建议，看成是大哥哥对一个小弟弟提的建议。大哥哥比小弟弟更有经验。当我相信对我提建议的人是诚实、真诚而且是为他们的人民献身的，我就像小弟弟对大哥哥一样的谦恭，听取建议。”

五 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本着互谅互让精神， 解决中国同大多数邻国的边界问题

毛泽东一再指出，在对外关系中必须保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态度，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必须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他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中说：“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他还多次指出国家不应该分大小。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

在强调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同时，毛泽东还鼓励小国在反帝反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他称赞阿富汗是一个英雄的国家，历史上从来没有屈服过，曾三次打败外国侵略者；阿富汗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是同中国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的。

毛泽东这种平等待人和尊重小国的态度，使一些小国领导人颇为感动。阿富汗国王查希尔在60年代初期曾称赞毛泽东是世界上杰出的人物，说毛泽东在国际事务中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待人接物方面也很合情合理。他感到同中国相处，中国是平等对待别国的。

中国同邻国存在着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能否公平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边境的安宁以及边境居民的和平生活，而且关系到同邻国的关系。因此，毛泽

东、周恩来对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是极其慎重的，主张通过和平谈判，互谅互让，求得友好解决，而不应诉诸武力。本着上述精神，新中国同一些邻国解决了边界问题，签订了边界条约。中国和尼泊尔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就是一个例子。毛泽东对中尼边界存在的珠穆朗玛峰问题，照顾了双方的民族感情，使问题得到顺利解决。尼国王在中尼边界条约签字后说：“条约的签订是我们日益发展的友好关系的另一里程碑”；“在我们同我们伟大友好的邻邦中国的整个谈判过程中，指导我们的原则是和平和友谊、尊重彼此的权利、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我们高兴地告诉你们，我们这种心情得到了贵国领导人的充分响应。我们必须像两个理想的友好邻邦那样生活下去。”

综上所述，毛泽东所制定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睦邻友好政策，为中国的睦邻外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继续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这是中国外交事业的无比宝贵的财富。在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进一步发扬毛泽东关于睦邻友好的光辉外交思想，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必将使我国同亚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一个新时期。

毛泽东关于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 和黎巴嫩、约旦、伊拉克 反抗外来干涉的决策

郁 兴 志

万隆会议为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有力地促进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1956年7月26日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和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人民推翻费萨尔王朝统治使帝国主义异常震惊。它们采用经济制裁、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甚至发动侵略战争进行阻挠和干涉。但埃及和伊拉克依靠内部团结和阿拉伯及亚非各国人民的支持，经过英勇斗争，挫败了帝国主义军事侵略和武力干涉的阴谋，取得了胜利。

一 毛泽东的决策

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开

幕词中郑重宣布：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埃及进行武装干涉的企图。9月17日，毛泽东在接受埃及首任驻华大使拉加卜呈递国书致答词时说：中国政府 and 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并且相信在这一斗争中，埃及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十分关心运河的战局，认为军事上固守西奈颇为不利，提出关于埃及反侵略战争的军事布署和战略方针的建议，由周恩来总理转告埃及政府。毛泽东对拉加卜大使说，中国的援助没有条件，可以是无偿的。埃及方面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力所能及，就一定办到。8月16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长篇声明，毛泽东的批语是：“似应有几句劝告英、法政府不要作出违反世界人民和平意志的事，不要过于激动和走极端，致使事态扩大，不利于世界和平，也不利于英、法。”根据毛泽东的批语，声明中增加了相关内容。中国政府还发表声明，坚决反对美、英、法炮制的国际共管运河的方案，谴责英、法对埃及的武装侵略。中国政府决定向埃及提供2000万瑞士法郎无偿外汇援助，还拟派领航员去运河公司协助工作。北京50万和全国上亿人连续3天游行，支持埃及抵抗英、法侵略。各党派和群众团体成立支持埃及反侵略委员会，负责全国的声援活动。群众纷纷捐献财物、写慰问信。中国红十字会向埃及捐赠了医疗器械。

1958年8月1日毛泽东在同外宾谈国际形势时指出，伊拉克事件第二天，美军就在黎巴嫩登陆，英军也占领了约旦，那是一种侵略，一种干涉。这次美国非常惊慌失措，认为如不尽快采取行动，中东就完了。美国出兵黎巴嫩，想先吞掉伊拉克，然后吞掉整个中东。在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下，它们后来才被迫撤退。1958年7月1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承认伊拉克革命政权，强调中国将尽一切可能支援伊拉克人民的正义斗争。陈毅副总理

兼外长还约见亚非国家驻华使节，就支持伊拉克事进行磋商。全国数百万人游行示威，反对美、英军队占领黎、约，威胁伊拉克和其他阿拉伯国家。

毛泽东关于支持埃及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支持伊拉克反抗外来干涉，支持黎巴嫩抗击美军和约旦抗击英军入侵的决策，是继抗美援朝后，新中国外交上又一重要战略举措。

二 毛泽东强调中东两大事件具有国际意义

1956年9月17日，毛泽东对埃及大使说，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埃及团结了8000万阿拉伯人民，组成了坚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线，埃及处在这条战线的最前哨。帝国主义攻击纳赛尔，但我们认为他是亚非地区的民族英雄。1958年8月1日，毛泽东谈到英、美出兵黎、约时指出：它们为什么这样急？是怕跟着伊拉克，许多国家要解放。美国没有料到世界舆论不在美国方面，想不到世界掀起了反美浪潮。中东事件中出现的某些人物推动了和平运动，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浪潮是对帝国主义的威胁。后来毛泽东接见伊拉克一个代表团时说，伊拉克获得解放，中国人民很高兴，认为这是有世界意义的事情。

埃及收复运河和伊拉克革命胜利具有国际意义：挫败了美、英、法腐朽的炮舰政策，瓦解了巴格达条约，打击了艾森豪威尔主义，破坏了帝国主义在中东的经济战略利益，打乱了它们在中东的战略布署，从根本上动摇了英、法在西亚北非地区的殖民统治，揭穿了美帝的新殖民主义面目，推动了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二次大战后，亚非拉人民在相当长时期内未能摸清美帝的底细，是有复杂的历史原因的：美帝

长期注重精神文化侵略，善于搞两面政策，手法比较隐蔽；战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斗争的主要矛头是指向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者；不少亚非新独立国家还寄希望于美国提供经援。毛泽东对中东两大事件揭穿美帝新殖民主义面目一事十分重视。毛泽东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高唱自由、平等；第二次大战，反法西斯，别人打了两年多，它才来。这次中东事件中，美国不得不自己冲上去。美国说它自己不是侵略者，世人说是。美国的行动有利于动员人民。

埃及宣布将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后，美国与英、法一起宣布不承认埃及的国有化措施，参加英、法对埃及的经济制裁，包括冻结埃及的资产，停止进口埃及的棉花，限制向埃及出口粮食和军工物资，削减对埃及的石油供应等。美还伙同英、法策划召开伦敦会议，共同压埃及接受它们抛出的“国际共管运河方案”。1956年10月底，英、法发动侵略埃及的运河战争，美国声称不赞成英、法武力重占运河，但又明确拒绝苏联提出的苏、美合作使用武力阻止英、法侵略埃及的建议，实际上纵容英、法武装入侵埃及。在埃及浴血抗战迫使英、法停战后，美国在撤军问题上向英、法施加了一定压力，企图讨好埃及，捞取某些政治资本。在伊拉克革命胜利已成定局，连巴格达条约成员国都较快地予以承认后，美国于8月下旬也承认了伊新政权。但美国纵容英、法侵略埃及，企图通过以美国为主体的国际共管或建立运河使用者协会取代英、法控制运河，在停战后又提议“由美国公司以10亿美元租用运河10年”，承认伊拉克新政府的同时又保持驻黎美军的种种行动，在阿拉伯和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美国的新殖民主义面目，这客观上对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起到推动作用。

三 毛泽东的决策体现了新中国 外交的基本立足点

毛泽东从在全世界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高度看待阿拉伯民族的解放斗争，把支持这一斗争看成是已获得独立国家应尽的义务，同时也是打破帝国主义势力对我封锁、扩大我外交回旋余地、提高我国国际地位的战略行动。毛泽东指出，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力量，中国应给予积极支持。中国和亚非拉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独立后又都面临着建设自己国家的相同历史任务。毛泽东在接见陆续访华的一些阿拉伯代表团的谈话中先后指出，阿拉伯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给中国人民很深刻的印象。我们支持阿拉伯民族，我们也很需要阿拉伯民族的支持。阿拉伯人民是我们可靠的朋友。中国人民很感谢阿拉伯各国人民对我们的援助。阿拉伯民族很大，而且有斗志。如果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阴谋就不能得逞。1958年5月4日毛泽东在给埃及总统的复信中说：“不管帝国主义者怎样敌视贵国和整个阿拉伯人民，它们也决不能阻止贵国和整个阿拉伯人民的前进。”“我的心向着阁下和贵国人民，向着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全体人民。”

中国支持埃及收复运河和伊拉克反对外来干涉的斗争，赢得了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称赞，为中国同更多的阿拉伯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埃及、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它们和其他亚非拉国家是1971年联大通过2578号决议的生力军。中国能够挫败帝国主义的封锁是与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亚非拉国家的支持分不开

的。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支持埃及、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的决策是英明的，这一决策体现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

中国、阿拉伯友谊是同毛泽东、周恩来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和周恩来基于这一决策提出的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为中国发展同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牢固基础。近年来，中东和国际形势发生剧变，中国的中东政策也及时作出了相应调整，但指导中阿关系的基本原则决不会改变。中国人民、阿拉伯人民都不会忘记毛泽东当年的决策和他为中阿友谊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毛泽东关于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 和维护民族独立斗争的决策

曾 涛

站在自求解放的被压迫民族和国家一边，积极支持其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是毛泽东外交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愿以在阿尔及利亚当首任大使的实践来说说这方面的问题。

阿尔及利亚是非洲北部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被法国殖民主义者统治了 130 年。阿尔及利亚人民历尽苦难，曾经有过数次抗法起义，都被镇压下去了。1954 年 11 月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奥雷斯山区发动武装起义，斗争烈火逐渐发展到全国，法国进行残酷镇压，未能扑灭革命怒火。1958 年 9 月 19 日，在开罗成立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当天，法国政府的发言人就以威胁的口吻向世界各国宣称：任何国家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就是对法国的不友好态度，将影响法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中国政府不理这一套，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外长于 9 月 22 日分别向阿有关领导人发出热烈的贺电，并且电示我国驻开罗大使陈家康拜会阿临时政府外长，表示中国政府愿与阿临时政府早日商谈两国建交问题，1958 年 11 月 20 日两国正式建交。此后，我国从道义

上、物质上不断给予他们支持。

1958年12月，阿临时政府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毛泽东热情地会见了他们。当对方谈到很多国家还不承认阿临时政府时，毛泽东说：“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承认法国，不承认你们，在这些多数国家面前你们是非法的，但是，这是暂时的因素，我国在大多数国家面前也是非法的，81个国家中只在31个国家面前是合法的。我们不承认英国完全合法，是半合法（当时是代办级关系），而承认你们是合法。我们看你们同看英国完全不同，因为你们是革命的。”这番话对阿临时政府和阿人民是很大的鼓励。

1960年5月，阿临时政府副总理兼外长克里姆来中国访问，毛泽东会见他时说：“我们同法国没有关系，只要有可能就支持你们，不仅在道义上，而且在物质上，如果武器能够运到也可以支持。”还说到：“我们对所有反帝力量都支持，同时他们也支持了我们，这是世界反帝力量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我国是努力支援阿尔及利亚武装抗法的。随着我国自身情况的好转，对阿物资上的支持逐渐增多起来，阿战斗人员开始用上了中国制的武器、弹药、通讯器材、毛毯、军衣等等。

1960年9月阿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来中国访问时，毛泽东对他说：“我们没有找过法国政府，它也没有来找我们，也许有一天它要来找我们，我们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要同蒋介石断绝外交关系，一个是不能干涉我们援助你们。如果它把干涉我们援助你们当作一个建交的条件，我们不干。”

毛泽东说这段话是有所指的，因为1960年7月27日，法国议员德洛纳在瑞士同我驻瑞士大使交谈时曾提到：如果中国没有和叛乱分子（指阿尔及利亚革命者）的关系，法国对中国的态度可能不同，那种关系是阻碍法中建交的因素。他并试探：如果中国能在援助阿叛乱问题上让步，法国将放弃台湾，以打开法中关

系。我大使根据中央早就明确的方针，向这位议员作了解释，顶了回去。

这些都说明在毛泽东的对外政策中，支持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50年代、60年代的中国并不富裕，并且自己也有很多困难，但是为了支持阿尔及利亚的解放斗争和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巩固独立，我国在经济上也是尽了很大努力的。

我国对阿尔及利亚独立斗争的真诚支援，对阿人民的斗志是起了鼓舞作用的，也奠定了两国人民之间深厚友谊的基础。我在阿工作期间，到处可以感受到共同战斗的友情。向本·贝拉呈递国书时，他就说：“十分感谢中国对我们的斗争给予支持的一贯立场，我们对此将永远不会忘记。”到各地访问，会见各级领导人时，虽然都是初次见面，却总像会见了老朋友。他们几乎都是参加过游击战争或者进行过地下斗争的老战士。他们向我叙述抗法战争中英勇斗争的故事时，常常会谈到在他们极端困难的时期，中国红军长征的故事如何对他们的战士起了积极的鼓励作用。中国的物资和军援又如何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特别使人感动的是，我到群众家中去访问时，很多参加过抗法斗争的群众和老战士拿出用旧了的来自中国的军毯、军衣、鞋子等等，说这些东西是在他们极端困难时得到的，当时激动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他们说，要保存这些东西作为珍贵纪念品。

在对待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的政策和实际行动方面，苏联的赫鲁晓夫执行的是另一条路线。他屈服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的压力，为了保持和法国的外交关系，迟迟不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1960年赫鲁晓夫访问法国时甚至还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有千百万的利益，苏联承认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个省。直到1962年3月阿法在埃维昂达成协议的次日，苏联才匆忙宣布承

认阿临时政府。苏联对阿尔及利亚的援助也是从1962年初才开始的。

苏联的错误政策，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受到了报应。苏联派驻阿尔及利亚的大使先我两个月到了阿尔及尔，但一直不安排他呈递国书。后来礼宾司官员告诉他，要等中国大使来呈递国书后才能安排他呈递国书。因阿政府决定，除阿拉伯国家外，其他国家的大使要按承认阿临时政府的先后安排呈递国书。结果，苏联大使在我和南斯拉夫大使之后才呈递了国书。

不仅在官方，在阿人民中也有强烈反应，1962年5月，我国记者和苏联记者一起从阿尔及利亚东部进入阿尔及尔，路上走了5天，中国记者到处受到欢迎和优待，而苏联记者则到处向阿人民道歉，承认苏联过去没有看到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力量是一个错误。

我国把支持各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斗争看作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从不附加条件，也决不据此而干涉别国内政，这也是毛主席对外政策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对其他国家是如此，对阿尔及利亚也不例外。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周总理去进行两次访问，和本·贝拉总统建立了很友好的关系。可是，1965年6月19日阿总理兼国防部长布迈丁发动军事政变，成立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自任主席，逮捕了本·贝拉。次日，国内就指示我约见布迈丁，向他转达我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的支持，表明中国从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我们对于一切有利于阿人民，有利于反帝、反殖的事情总是支持的。布迈丁一再向我表示，阿尔及利亚和中国是友好兄弟，他将继续为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而努力。以后的事实也证明，布迈丁执政期间，中阿两国仍保持了很好的关系。

我本人的一点实践，可以说明毛泽东外交政策英明、正确的一个方面。

毛泽东关于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 以色列扩张主义斗争的思想

闻兆祥 王小庄

中东地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历史上向为群雄逐鹿之地，战后是国际上多种矛盾的交汇点。1955年万隆会议成功举行之后，毛泽东日益关注中东问题，翌年开始同阿拉伯朝野人士接触，逐步形成了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斗争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确定了对中东问题的原则立场，制定并不断完善了对中东外交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策略。30多年来，我国对中东问题的原则立场和政策赢得了阿拉伯国家及其它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赞誉，提高了我国国际声望，巩固、发展了我国同该地区国家的关系。这里还应强调指出，毛泽东这一思想对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建立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打破西方对我封锁、扩大我外交回旋余地，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毛泽东关于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的思想涵义深刻，内容丰富，本文只是对这一思想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 毛泽东这一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战略考虑

19世纪末期，在英帝国主义的纵容和支持下，犹太复国主义在欧洲兴起，世界许多地方的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同世代居住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发生摩擦，矛盾日深，酿成多次流血事件。194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分治巴勒斯坦的181号决议，阿拉伯人因反对该决议而不屑建国，犹太人则于翌年成立了以色列国家。以色列立国后，先后于1948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同阿拉伯国家发生四次大规模的战争。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以色列不仅侵占了181号决议所规定的阿拉伯国的领土和整个耶路撒冷，而且在1967年的战争中鲸吞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横遭剥夺，阿拉伯国家一些领土沦陷，安全受到威胁。毛泽东正是根据这一历史背景和客观现实，对阿以争端的性质进行了分析，把握了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斗争的实质，作出了这一斗争和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是世界范围反帝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论断。他在会见阿拉伯宾朋时说：“问题不是一个以色列，而是谁站在以色列背后的问题，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是个美国的问题。”“全世界要组成统一战线来反对帝国主义，因为帝国主义正在组织起来反对我们。譬如，他们正在利用以色列反对你们。利用以色列只不过是一种方式，还有很多别的方式。”由此可见，毛泽东是从当时两大阵营的对峙，美国到处扮演“世界宪兵”角色，妄图扑灭亚非拉方兴未艾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烈火这一国际斗争的全局出发，把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的斗争提高到建立世界范围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战略高度来考虑的。

二 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基本精神是支持各国的正义斗争，履行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

毛泽东作出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斗争的决策，既是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战略考虑出发，也是为了履行已获独立的国家支持仍在进行正义斗争的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正如他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所宣布的那样：“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他基于对阿以争端实质的认识，充分肯定了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侵略扩张斗争的正义性，认为大力支持这一斗争并向阿方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从而决定了这种支持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正义斗争是个原则性的问题，因而这种支持是真诚的、坚定的，不附带任何条件。毛泽东在同一位约旦朋友谈论阿以冲突问题时强调，“我们不赞成你们就是犯错误”。1956年发生苏伊士运河事件之后，他在同埃及驻华大使谈援埃问题时说：“我们的帮助没有任何条件。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能力所及，一定帮助。”他在会见另一位阿拉伯外宾时指示在座的我国其他领导人，要好好地研究一下援助问题，“现在没有的，将来要给他们”。（二）支持是相互的。毛泽东一贯认为，中国人民同亚非拉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休戚与共，命运相关，必须互相支持。他在会晤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和朋友时，反复强调这一主张。他说：“我们在两条战线上，你们在西，我们在东，而敌人是一个。我们相互支持，你们支持我们，我们支持你们。”他认为，亚非拉人民的反帝斗争“分散了敌

人的力量，使我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相反，如果他们的斗争遭到挫折，“对我们也是很大打击”。因此，可以说我们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的斗争，既是履行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也有利于打破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扩大我在国际斗争中的回旋余地。

三 研究和帮助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 扩张主义斗争的健康发展，是毛泽东 这一思想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坚定地站在阿拉伯国家正义斗争一边，不仅表现在他对这一斗争给以极大的政治支持和物质援助，而且表现在他以极大的注意力关心这一斗争健康发展上。他以战略家的眼光关注着中东的风云变幻，利用会见阿方宾客的机会研究斗争形势的发展，对阿以争端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见解，并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对如何推进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斗争的问题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树立必胜信念，坚持长期斗争，40年代末期以来，阿拉伯国家的反以斗争曲折发展，军事上一直处于劣势，能否以弱小的力量战胜有帝国主义撑腰的气势汹汹的以色列，就成了坚持斗争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阿方在与以的战争中伤亡惨重，失地丧权，有些人复仇心切，急于求成，缺乏坚持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会见阿拉伯人士时反复强调，既要在战略上蔑视敌人，又要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既要坚信正义事业最终必胜，又要准备进行艰难困苦的持久斗争。他在1965年3月对来访的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说：“帝国主义就是怕人民，以色列怕你们

更多一些……我看你们这些难民大有希望。”他曾向阿拉伯客人指出，历史证明，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但又多次提醒，“胜利的道路上会有曲折，你们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无论合法或武装斗争，都要遭受困难的。要准备遭受困难，也要准备付出时间，可能要较长时间”。（二）加强内部团结，争取胜利主要依靠自己。毛泽东衷心希望阿拉伯国家以大局为重，摒弃内部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强调中东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要依靠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团结和坚持斗争。他1960年5月会见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时语重心长地说：“要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人民……总之，保持团结就好，尽可能争取更多的人。”他表示相信，只要阿拉伯人民团结起来了，帝国主义的阴谋就不会得逞。（三）要讲究斗争策略。他特别强调三点：第一，“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在谈到埃及取得苏伊士运河斗争的胜利时，他赞扬埃及“巧妙地利用了帝国主义国家间、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间、帝国主义和民族独立国家间的矛盾”。他在先后会见法共代表团和埃及副总统时说，要对犹太人采取分化政策，把以色列分成两部分，亲帝的部分，人民和共产党的部分，不分上下层，通通反对，对反帝斗争不利。第二，发挥自己的优势，采取灵活的策略。他向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建议，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打法。第三，视形势发展变换斗争手法。他称道埃及总统纳赛尔在苏伊士运河斗争中“做法很聪明，他有时硬，有时软，有时用一种很和平的办法”。（四）在斗争中学习斗争，既要总结打胜仗的经验，也要总结打败仗的教训。

四 正确处理我国同以色列的关系，是毛泽东这一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既然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正义斗争，反对以色列的扩张主义，就不可避免地面临如何处理我同以色列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既坚持原则，又实事求是，为我国解决这一敏感的问题确定了指导原则。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色列政府即于次年1月予以承认，并在此后一再试图同我国建交。鉴于以色列当时受美国袒护，侵犯阿拉伯国家领土和民族权利，支持美国武装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我国从国际反帝斗争的全局出发，并着眼于广大的阿拉伯国家，经毛泽东批准同意，决定对以色列采取在一定时期内不承认不建交的方针，但不作永不承认、永不建交的承诺。毛泽东认为，我们反对的是以色列统治集团推行的扩张主义，不是犹太民族；支持的是阿拉伯国家恢复民族权利的正义斗争，不是笼统的排犹思潮。他在同众多的阿方人士的交谈中，从未表示赞同否定以色列生存权的说法，从未许诺永不同以建交。对毛泽东外交思想领会最深最透的周恩来1956年5月对一个阿拉伯代表团说：“任何一个民族总有短处和长处……从前途来看，总会变化的，侵略者总会最后失败，主张和平、独立、自由的人总会胜利的。人类仇恨宜解不宜结。因此，我们不能说中国永远不承认以色列。现在我们与以色列无外交关系，因为它侵略你们，但不能说将来以色列不进行侵略的时候，我们也不承认，那就被动，就没有理由了。”1965年3月，他更加明确地向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提出，中国不能承担不承认以色列、否定以色列整体的义务。

毛泽东提出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的思想至今已 30 多年了。尽管在此期间，中东形势发生很大变化，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国逐步对中东政策作出相应调整，1992 年 1 月同以色列建交，从而使我国在中东的外交步入全方位发展的新时期，但认真学习毛泽东这一思想，对保持我中东政策的连续性，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开拓对中东的外交工作仍具有现实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深入研究这一思想，学习、掌握毛泽东同志观察、处理国际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更好地执行中央对外工作的方针、政策，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为 中非友好合作关系 奠定坚实基础

钟 非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型外交的最高决策者和主要奠基人。在周恩来的参与和协助下，他所主持制订的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大政方针，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高度统一的原则。他把支持世界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作为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并以此作为观察世界形势、识别国际敌友、处理对外关系和进行外交决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他“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在不同时期的国际斗争中均力求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正是在毛泽东这一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经由周恩来创造性地主持的外交实践，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从诞生之日起就以独立自主、热爱和平、伸张正义、反对强权的崭新风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并在世界人民反帝反殖反霸事业中始终昂首于历史潮流的前沿，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日益觉醒，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迅猛发展，强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新中国的诞生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她顶住美帝纠合一些西方国家所推行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乃至军事威胁而巍然挺立，又进一步鼓舞了被压迫民族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意志，有力地推动着亚非拉广大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高涨。而亚非拉人民的英勇斗争所给予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日益沉重的打击，对于革命甫胜、百业待兴的中国人民，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有力支持。面对这一形势，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亚非拉地区正在掀起直接打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革命风暴。毛泽东向以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为毕生己任。他坚信“受压迫的人民自己总是要起来的”，“帝国主义总是要被打倒的”，并据此殷切地期待“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人民，在争取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共同努力，争取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基于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性质和任务的科学分析，他还深刻预见到，正在从这场革命风暴中崛起的第三世界必将成为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有生力量和可靠同盟军，并进一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认定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与之有着兴衰与共、唇齿相依的紧密关系。这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作出“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我们都必须给予积极的支持”这一战略决策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为此，中国人民不吝

作出必要的民族牺牲。在这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得到了有机的结合。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毛泽东历来认为“帮助是相互的”。他对来访的亚非拉朋友坦诚表示，“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相反“因为你们站起来了，我们就得到了帮助”。因此他大力主张，并领导中国人民认真实践“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这些毛泽东所一再强调并贯彻始终的正确原则，不仅成功地指导了中国的外交实践，而且在亚非拉各国得到广泛传播和积极响应，成为他们相互支援、团结战斗、克敌制胜的有力武器。

60年代，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亚非拉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空前高涨，许多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取得独立，走上和平中立的道路，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并随着自身的发展壮大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70年代的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重大变化。美苏争霸加剧，且其总的态势已由美攻苏守变为苏攻美守。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从国际斗争的实际出发，为了适时调整国际统一战线的内涵，对“三个世界”及时作了新的战略划分。他在1974年2月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毛泽东的“三个世界”战略及其发展，在我国当时的外交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推动了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蓬勃开展，对于阻遏超级大国的争霸野心和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遵循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正义斗争，给予了热诚的支持和力所能及的援助，同亚非拉绝大多数新兴国家建立了团结战斗的友好合作关系。

二

在战后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不断高涨的形势下，特别是1955年亚非会议以后团结反帝的万隆精神广为传播，深入人心，受尽奴役、压迫、掠夺和屈辱的非洲人民也进一步觉醒了。各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政党、各种政治组织、群众团体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为了尽早挣脱殖民枷锁，它们积极组织群众，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斗争，有的还被迫拿起武器，毅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并彼此呼应，相互支持。被称为“黑暗大陆”的非洲，终于真正地破晓了。战前的非洲大陆，只有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3个独立国家。1951年，利比亚成为战后第一个赢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到了万隆会议以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则由北至南涌向高潮。先是北非的摩洛哥、突尼斯通过武装斗争迫使法国殖民当局相继承认它们独立，而阿尔及利亚的武装斗争则发展到非洲最大的规模。与此同时，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苏丹，也冲破半个多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迎来了独立。随后便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加纳、几内亚等国率先赢得独立，并推动了60年代初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全面高涨。到1963年非洲统一组织成立之际，非洲已有31个独立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和代表得以聚集一堂，共商本大陆进一步团结反帝的大计。非统组织成立伊始，就以根除非洲大陆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为根本宗旨和首要任务，并在随后30年的战斗历程中，为促进非洲团结统一，完成非洲大陆非殖民化历史任务，反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和帮助非洲新兴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政治独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对于非洲大陆这种可喜的形势发展，毛泽东先后多次给予高度评价，高兴地指出，“整个

非洲大陆现在都处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浪潮中”。他对来访的非洲朋友说：“你们非洲很有希望，全世界人民都注视着你们起来。”“把非洲国家当作势力范围，这种过去的老规矩，不行了。”“不管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或者还没有获得独立的国家，总有一天是要获得完全彻底的独立和解放的。整个中国人民都是支持你们的。”毛泽东支持非洲民族解放事业的鲜明态度和坚定立场，给予斗争中的非洲人民以极大的鼓舞。随即，周恩来受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人民的委托，于1963年底至1964年初，作为中国总理首次集中地对一系列非洲国家进行了正式访问。他出自实地观察的感受，情不自禁地为非洲的觉醒发出了由衷的欢呼：非洲已是一个觉醒的大陆、战斗的大陆，在非洲大陆的辽阔土地上，自由的晨曦已经升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在这次历史性的非洲之行期间，中国总理还庄严宣布了我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①和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②这些原则，总结了多年来我国对非工作的经验，符合非洲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及发展经济、建设国家的需要，赢得了非洲国家广泛的赞赏和欢迎，并作为我国对非外交的指导方针，在长期的执行过程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些原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联合反帝战略在处理中非关系中的正确运用和全面体现。

帝国主义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非洲各国人民争取解放、捍卫独立的道路并不平坦，他们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以至鲜血的代价。在前进的道路上，非洲人民所面对的，不是宗主国设下的种种政治欺骗陷阱，就是敌人残酷的军事镇压。历史的进程还表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既曾面对老殖民主义者的垂死挣扎，同时又受到新殖民主义者乘虚而入的威胁，而对后者尤需提高警惕，认真防范。战后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曾力图取

代老殖民主义者。继后，苏联出于同美帝争霸的需要，披着“天然盟友”的外衣，也在非洲到处伸手，攫取势力范围。地处非洲心脏的刚果（今扎伊尔），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和得天独厚拥有丰富的战略资源，尤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各种势力为之垂涎。仅这个国家的人民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统一和主权的进程中先后所经历的种种遭遇，就典型地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在非洲为非作歹及非洲人民奋起抗击的全景缩影。其他非洲国家也都或多或少遭受两霸争夺之害。然而，正如毛泽东所预见和期待的那样，作为第三世界重要组成部分的非洲大陆各国，在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始终以其坚毅的意志和团结战斗的精神，历经艰险而不屈，终为世界人民联合反帝反殖反霸的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非洲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进程，再次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世界是被压迫人民的，压迫者是没有前途的”，“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等光辉思想无比正确。他在接见非洲朋友时热情鼓励说，“非洲各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他们正在一天天觉醒起来，决心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尽管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甘心失败，会继续破坏、捣乱，但是非洲人民的斗争前途是光明的，整个非洲是一定会取得彻底独立和解放的。”同时也谆谆告诫他们“没有困难不能前进，不要被困难吓倒，特别是困难来的时候要顶住。”这些精辟论述，被斗争中的非洲人民所深刻理解，对于激励他们面对强大敌人坚持斗争，总结经验，提高斗争水平，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三

遵循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非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始终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必要的支持。特别在非洲有关国家人民的斗争处在关键阶段或面临困难的时刻，中国总是满腔热情地给予政治上、道义上的同情和声援，及时有效地予以外交上的配合和支持，而且随时尽力地满足他们为开展斗争所需的种种要求，通过各处渠道提供实实在在的物质援助，克尽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1956年在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抗击英法武装侵略的斗争中，中国政府严厉谴责英法侵略行径，给予了埃及有力的声援。毛泽东对此曾亲自过问，并指示：我们在经济上援助埃及的方针应该是大力的、无偿的，它需要什么，凡是我們办得到的，一定要送去。对阿尔及利亚人民抗击法国殖民者的武装斗争，毛泽东于1960年5月接见阿临时政府代表团时明确表示“我们只要有可能就支持你们，不仅是在道义上，而且在物质上，如果武器能运到也可以支持。”根据这一方针，在阿尔及利亚七年半的武装斗争期间，尽管我国自身建设任务十分繁重，经济并不富裕，仍向其先后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武器装备和一般物资等无偿援助。1962年，为解阿尔及利亚刚刚赢得独立后的燃眉之急，除原定应对方要求允供的其他物资外，毛泽东还毫不犹豫地指示，将9000吨进口小麦直接转拨阿方。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人民反对殖民统治和白人种族主义的斗争，中国同样予以深切的同情和积极的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曾严厉谴责和揭露新老殖民主义者合伙谋害刚果（利）民族英雄卢蒙巴及颠覆其合法政府的罪行；协同众多非洲独立国家一起有力地声援了几内亚反击雇佣军

的入侵。为了支持非洲人民反对白人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歧视政策，中国于1960年7月就作出了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发生任何直接间接往来的决定。随着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逐渐向南转移，7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和人民重点加强对葡属殖民地和南部非洲人民武装斗争与群众运动的支持，向几内亚比绍、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纳米比亚以及南非等国民族解放组织无偿提供财力、物力、武器装备乃至人员培训等多方面的援助，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地区民族解放事业的发展，为非洲大陆最终完成非殖民化历史任务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取得政治独立以后，长期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畸形经济结构仍严重束缚着非洲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更有甚者，它们还继续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控制、剥削和争夺。因此，摆脱对原宗主国的依赖，抵御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以“援助”为名进行的渗透和扩张，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和捍卫独立成果，并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便成为非洲国家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没有经济独立，政治独立是“不完全的”、“不可靠的”。不少非洲国家领导人对此深有感触。出于支持非洲民族解放事业的真诚愿望和反帝反殖反霸的战略需要，毛泽东对非洲国家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也十分关注，就非洲国家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针坦诚地发表意见，并主张积极提供必要的援助。他一再告诫非洲朋友，“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帝国主义还是要整你们的。”他还指出，“有暂时困难时，搞点外援也是必要的，但主要来源和依靠是国内人民”，“自己为主，外国援助为辅”，中国提供援助也只能“解决部分困难，而且这种解决是临时性的，不是基本性的”。为了切实有效地帮助非洲国家发展民族经济，毛泽东亲自确定我国的援外方针，规定了平等互利、不干涉内政、不谋求特权、不附带政治条件、不造成受援国依赖等

一系列体现国际主义援助的基本原则。毛泽东还强烈反对把援助当成单方面“恩赐”的错误观点，一再告诫我们的同志要警惕和防止大国主义。为此，他还诚恳地请求受援国领导人帮助严格督促我们的援外人员。为了增强非洲国家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能力，他一贯主张不仅要帮助友好国家完成建设项目，而且一定要使受援国人民学会掌握全套技术和经营管理，训练好当地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我国援外“八项原则”就是在毛泽东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发展而形成的。在“八项原则”的指导下，长时期来我国帮助非洲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主要方式是，提供长期无息贷款，为有关国家援建社会经济发展所急需的项目，并且充分体谅它们的困难，到期贷款如无力偿还，还可视情协商延期，或改变偿付方式，从不逼债。即使在中国自己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也总是从非洲人民的需要和国际斗争的全局出发，从不推卸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援建坦赞铁路就是突出一例。这是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求助于西方大国和苏联均遭拒绝以后，毛泽东亲自拍板由我国毅然承担的项目，也是中国援外耗资最多、规模最大的项目。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协同坦赞两国员工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施工，中方 59 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这条铁路的建成，对坦赞两国经济发展和支援南部非洲尚未独立国家的解放斗争，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作为中非友谊的象征受到非洲人民的一致赞颂，并被亲切地赋予“自由大铁路”的誉称。毛泽东援外思想在非洲的长期实践，不仅有力地加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团结与合作，促进了双边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而且也为发展中国家相互开展南南合作树立了典范，为它们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反对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联合斗争，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四

中国和非洲国家同属第三世界。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共同的斗争任务，使我们在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中始终利害一致，命运相连，一贯相互同情，彼此支援。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援助总是相互的。中国在克尽国际主义义务、责无旁贷地支持了非洲的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的同时，也同样得到了非洲国家有力的支持。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怀，广大非洲国家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毛泽东曾风趣地说：“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们也不会忘记，对于我国平息 1989 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西方国家乘机大肆向我国施加政治压力，实行经济“制裁”，而非洲国家则普遍持同情、理解和支持的态度。当时不顾西方压力首先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和外长都来自非洲。在最近几次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我国接连挫败西方国家借口人权问题提出的反华提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了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近几年来，非洲国家在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经济困难加剧，台湾当局则乘机施展“弹性务实外交”，频频向非洲各国发动“银弹”攻势，力图用金钱换取所谓“国际生存空间”，并以此破坏中非关系，但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能深明大义，顶住诱惑，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支持中国统一大业，维护在长期共同战斗中同我国结下的深厚友谊。1993 年 1 月，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萨利姆就中非关系发表评论说：中国同非洲国家有着悠久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中国一直站在非洲国家一边，给它们以具体的物质支援。在发展经济的事业中，中国

同样给非洲国家以必要的支持。中国一直理解独立的非洲国家战胜困难的愿望。他的这番评价表达了非洲人民的共同心声。无论是非洲国家在国际斗争中对中国的真诚支持，还是非洲领导人对中非关系的称颂，都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毛泽东关于联合反帝反殖反霸的战略思想及据此制定的有关方针政策，在我国对非外交的实践中的确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为培育中非友谊和发展中非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随着国际、国内和非洲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政府在坚持贯彻毛泽东外交思想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不断从实际出发，就对非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充实，使之符合非洲现实和中非关系健康发展的需要。我们在原有对非关系“五项原则”和援外“八项原则”的基础上，又相继于1983年和1992年，在我国领导人访问非洲国家期间，进一步宣布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四项原则^③和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处理同非洲国家关系的六项原则^④。“六项原则”和“四项原则”，作为对60年代初提出的“五项原则”和“八项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同样体现了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有关对非工作的基本精神。政治上依然首先着眼于“支持非洲各国为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和发展经济所作的各种努力”。与此同时，针对西方大国露骨干涉非洲国家内政、力图通过强加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模式把非洲纳入西方轨道的霸权行径及世界向多极化格局发展的形势特点，还突出强调“尊重非洲各国根据自己国情选择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及“支持非洲国家作为国际社会平等的成员，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努力。”经济上，则在继续根据援外“八项原则”力所能及地向非洲国家提供必要援助的同时，大力倡导和积极开拓经贸关系的多样化，通过贯彻“四项原则”开展互利合作，着眼共同发展，为中非支好合作关系在经济领域里

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自 80 年代末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战后最深刻的变化。旧的世界格局已被打破,新格局的形成尚需时日。在新旧世界格局转换过渡的动荡时期,广大非洲国家面临着新的严峻挑战,但仍然是一支重要的国际力量。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面对国际上出现的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和非洲国家依然休戚与共。为了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权益,争取建立一个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我们更需要相互同情,相互支持,更需要紧密团结在一起。加强同包括非洲在内的第三世界各国的团结与合作,将永远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在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实践中必将得到继续和发展,并继续指导我国的对非工作,确保中非友谊永葆青春,推动中非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注

① 我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

一、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二、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三、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四、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五、主张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② 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

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

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③ 我国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四项原则：

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

④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同非洲国家关系的六项原则：

一、中国支持非洲各国为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和发展经济所作的各种努力。二、中国尊重非洲各国根据自己国情选择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三、中国支持非洲国家加强团结合作，联合自强，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四、中国支持非洲统一组织为谋求非洲大陆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以及实现经济一体化所作的努力。五、中国支持非洲国家作为国际社会平等的成员，积极参加国际事务和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努力。六、中国愿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非洲各国的友好往来和形式多样的经济合作。

毛泽东关于发展中拉关系的 外交思想与实践

蔡维泉 杨万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相距遥远的拉丁美洲各国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民间到官方，艰辛而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从建国初期到他逝世的1976年，对拉丁美洲地区和人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给予了相当特殊的关注；在促进中拉关系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历史奠基作用。回顾他在推动中拉关系发展过程中的思想与实践，缅怀他和周恩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外交家共同开拓新中国与拉丁美洲各国外交关系所做的杰出贡献，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毛泽东开展“人民外交”的思想
推动了新中国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
经济文化联系的蓬勃发展

美国对新中国采取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的敌视政

策。1950年4月，美国曾照会受它控制的拉丁美洲国家，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要与美国保持一致，并威胁它们不得先于美国承认。尽管当时有一些拉美国家的官方人士曾通过不同渠道表示有同我国建交的愿望，但终因它们的政府未能完全摆脱美国的控制，加上它们内部在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的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都没能下决心与中国建交。

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拉美各国受美国控制的困难处境是十分了解的。因此，他们对拉丁美洲国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外交方针和政策，这就是：“积极开展人民外交，争取建立友好关系，发展经济、文化往来，逐步走向建交。”

为了开展人民外交，中国政府1953年就派李一氓、陈定民二人组成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席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第一次美洲大陆文化大会。此后，中国又不断地向拉美派出了文化、艺术、贸易、新闻、医学等十几个代表团访问8个拉美不同的国家。从1950年起，毛泽东就决定邀请拉美民间和各政党友好人士来北京参加国际会议或访问。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亲自同来华访问的拉美知名人士交朋友，做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从50年代初到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他亲自接见过的拉美民间友好团组及个人达55次之多。据一些老同志回忆，每次会见谈话，时间都在1小时左右，有时还长达2—3小时。在会见中，毛泽东总是无拘无束地交谈，态度坦诚，平易近人。在一次与巴西朋友的交谈中，毛泽东说：“我们见到三个地方的朋友最亲，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同你们见面，我们就感到平等。”这些话，使来访的拉美朋友感到十分亲切和友善。1958年9月，两名巴西记者访华。这是毛泽东首次接见来自拉丁美洲的记者，毛泽东想通过他们的采访，向拉丁美洲人民传递信息。毛泽东说：“只要巴西和其它拉美国家愿意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一律欢迎。不建立外交关系，做生意

意也很好；不做生意，一般往来也很好。”毛泽东的这番话，反映了他对中国与拉丁美洲人民外交关系的建立十分关注，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与拉美各国发展关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绝不强人所难的思想。正是在毛泽东的这种思想指导下，周恩来明确提出，发展同拉丁美洲国家关系要“细水长流、稳步前进”，要相信拉丁美洲人民的觉悟，谅解他们的处境和困难，从拉美的实际情况出发，不使拉丁美洲友好人士受到伤害和感到为难。为了打消一些访华的拉美朋友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与中国不同而难以与我交往的顾虑，毛泽东指出：“你们信仰你们的，我们信仰我们的，但是我们有共同点，可以合作。”

由于毛泽东亲自制定政策和做工作，加上周恩来的具体布置和领导，1950—1958年，尽管美国对华封锁禁运，中国同拉美各国的贸易仍在进行。8年中，中拉贸易额累计为2325万美元。在建国的头10年里，有19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文化团体、青年、妇女以及各界名人约1200多人先后到我国访问。他们回国后，多数都为中拉关系的发展作了大量工作，有的在报刊杂志上撰写文章，介绍新中国；有的则领导创建了对华友好组织。为了更好地推动同拉美各民间友好协会和组织的交往，1960年3月，中国和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准下，在北京成立。这个时期，中拉民间的经济文化往来呈现了一派勃勃生机。它不仅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独创，是毛泽东建国前后一贯倡导的“要把各国的统治阶级同他们的人民相区别”、“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的思想在外交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和运用。新中国同拉丁美洲各国关系正是遵循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开展起来的。

毛泽东支持拉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思想促进了中拉人民之间的理解和信任

1956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庄严宣布：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我们都必须给予积极的支持。当时，古巴人民为推翻美国豢养的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展开了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毛泽东对古巴人民的斗争表示了特别的同情和支持。1959年1月，古巴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当时在会见来访的墨西哥前总统卡德纳斯将军时说：“我们认为古巴事件是当前一个重大事件，亚洲人应该支援他们反抗美国。”毛泽东的谈话大大鼓舞了古巴和拉丁美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信心，也促进了中古友好关系的发展。1959年4月，《北京日报》社长姚溱率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古巴和拉美其它国家，他带回了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希望中国派一位比较重要的干部到哈瓦那，以作为非正式的中国官方代表与古巴政府进行联络的请求。毛泽东亲自做出决策和指示，提出“派一位公使去”。不久，曾涛被派往古巴任新华分社社长。从此，中国和古巴建立了官方联系渠道。双方互访代表团日益增加。1960年7月，中国和古巴签订了贸易和支付以及科技合作协定。同年9月28日，古巴和中国正式建交，几乎是同时，古巴宣布同台湾当局“断交”。古巴是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它对于中国同拉美各国关系的开展具有重大意义。毛泽东在促进中古友好关系的发展和中古建交中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具有历史意义。

1964年初，巴拿马人民因在运河区升起巴拿马国旗，遭美国

军队枪击，许多群众被打死。巴拿马人民展开了一场反对美国侵略，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主权的声势浩大的爱国斗争。毛泽东对这一事件再次给予了密切的关注。1月12日，毛泽东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表示“巴拿马人民正在英勇地进行的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是伟大的爱国斗争。中国人民坚决地站在巴拿马人民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主权的正义行动”。1968年10月，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巴拿马国民警卫队司令托里霍斯出任政府首脑。他执政后，继续同美国进行收回运河区的谈判和斗争。为使美国让步，争取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1973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应巴拿马的邀请，在巴拿马城举行了特别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黄华大使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在会上作了发言，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关于运河区领土和主权不容侵犯，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正义立场。由于巴拿马运河问题在当时成为拉丁美洲国家共同和优先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当时发表的谈话在拉丁美洲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各国政府和进步人士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巴拿马政府首脑托里霍斯将军后来曾多次对毛泽东的谈话以及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巴拿马人民收回运河主权斗争的支持表示感谢。

1965年4月，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推翻亲美的卡夫拉尔独裁政权的武装起义，美国悍然派出3万多人的部队，到多米尼加进行镇压。5月12日，毛泽东发表了《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严厉谴责美国的武装侵略，坚决支持多米尼加人民的爱国斗争。

从以上事例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十分关心拉丁美洲人民的景况和斗争，并在不同时期均给予了斗争中的拉丁美洲人民必要与可能的声援和支持，这不仅是贯穿新中国同拉丁美洲关系发展史

中的一个基本事实，也是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支持民族独立和解放，维护世界和平的整体国际战略思想的生动体现。毛泽东为支援和声援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而发表的谈话和声明在巴拿马、多米尼加、乃至整个加勒比和南美地区人民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增进中拉人民之间的理解、信任，发展中拉关系具有重大作用。

毛泽东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合法经济权益的思想 为中拉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 60 年代开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水平蓬勃发展。毛泽东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第三世界的崛起在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反霸、反殖斗争中以及在维护世界和平运动中起着中坚作用。60 年代末，70 年代初，拉丁美洲国家越来越重视利用本国海洋资源，发展民族经济。在拉丁美洲 33 个独立国家中，除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为内陆国家外，全濒临大海。拉丁美洲大陆海岸线长达 4.5 万多公里。在沿海的海域里，不仅有丰富的水产资源，也蕴藏着各种矿产资源。然而，美国和其它工业大国凭借着技术力量，称霸海洋，严重威胁和损害了拉丁美洲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国家采取共同立场，掀起了维护 200 海里海洋权的斗争。毛泽东又从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合法经济权益的共同利益出发，对拉美国家的集体行动再次给予了坚决的支持。1973 年，毛泽东在会见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时，特别赞扬了他在联合国所倡议制定的含有维护海洋权等内容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表示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 1973 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中国代表

郑重宣布：我国一贯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和争取 200 里海洋权的斗争，支持它们关于建立 200 里专属经济区的正义主张。1974 年，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第六次特别大会上明确宣布，坚决支持拉丁美洲国家和第三世界其它国家“彻底改变建立在不平等、控制和剥削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关系，为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所开展的斗争。至 1978 年，拉美国家带头兴起的保卫 200 里海洋权的斗争持续发展，共有 21 个拉美国家投入了这场斗争，其中有 8 个国家先后宣布实行 200 里专属经济区。在此后的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南北对话、根据商品综合方案设立共同基金的谈判等国际会议上，拉美国家同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并肩战斗，为维护民族经济利益，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继续作出积极努力。

毛泽东维护第三世界包括拉美各国经济权益的思想赢得了拉美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赞同和钦佩。同时也为中拉加强团结合作、拓展关系奠定了政治基础，为中拉关系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活力。

毛泽东关于搞外交“要虚心学习”、“搞好调研， 切实掌握情况”的教导是我们工作的指南

毛泽东在接见拉美各界友好人士的外交实践中，曾多次提醒参加会见的外交工作人员要“虚心学习”，要注意“搞好调研，切实掌握拉美情况”，以更好地开展工作。1962 年，毛泽东在会见古巴军事代表团和歌唱家维亚的时候，对在座的外宾和中方工作人员说：“要虚心学习别国的经验。”“要注意两条：一、外国的经验不可不知道；二、不可硬搬。”1963 年，毛泽东又说：“每个国家

的具体情况不同，必须用自己的头脑去想。”毛泽东不仅希望搞外交的同志做到以上要求，他自己在会见拉美友好人士时，也非常注意学习、了解和掌握别国情况。他的提问很多，从来访者国家的地理、面积、人口、气候等自然状况，到该国的历史、文化、工业、农业、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情况等他都详细询问。他就是这样以言传身教为我们的外交实践做出榜样。

1973年，他在会见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时，对我驻墨西哥大使熊向晖说，外交人员要搞好驻在国的调查研究工作，掌握那里的情况，“不要老住在大城市，到乡下跑跑，中国的乡下，墨西哥的乡下，研究社会情况和社会问题。”毛泽东还风趣地对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和墨西哥驻华大使安基亚诺说：“你们也要多跑跑，多看一些真实情况。”埃切维里亚在以后的访问途中，多次要求中途下车，与群众交谈，成为访问中的趣话。毛泽东在外交工作中重视调查研究的作风给当时每一位参加接待工作的外交人员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结 束 语

毛泽东关于发展中拉关系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活动，是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家、战略家在国际交往中整体思想与实践活动的一部分。1978年以后，我国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外交思想和外交路线的基础上，从新时期工作中心的需要出发，调整了我国外交政策并迎来了中拉关系目前的重大发展。但毛泽东一贯支持各国人民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维护发展中国家经济权益的思想以及为发展中拉关系所奠定的工作方针和原则，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毛

泽东关于要“虚心学习”、“搞好调研，切实掌握情况”的工作要求和教导，更是我们今天在拉美地区工作的中、青年外交人员的座右铭。

新中国华侨工作的指路人

张宏喜 何 锦

毛泽东主席领导我们制订了正确的华侨工作方针政策，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解决了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为我国与其他国家友好协商妥善处理好华侨问题指明了方向，给我们开辟了一条成功之路。

关怀海外赤子，制定海外侨务工作方针政策

对华侨怎么看，这是关于华侨工作的一个首要问题。这个问题不明确，就无法确定应如何对待广大华侨。毛泽东把华侨看成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支援国内革命、建设和统一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我们制订华侨工作方针政策的一个重要出发点。1945年11月8日毛泽东赞扬陈嘉庚先生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949年6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中，毛泽东与党中央确定与会代表中要包括华侨代表，请他们与国内各党派、各阶层人士一起共商国是。毛泽东在讲话中赞扬华侨响应中共中央召开新政协的号召，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这是符合华侨的实际情况的。

华侨移居海外的历史悠久，人数众多，足迹遍及全世界，其中95%以上集中在东南亚诸国。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军阀混战和自然灾害频仍，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我国沿海地区每年至少有10来万人离乡背井，流落他国。很多人是作为廉价劳力像“猪仔”那样被卖到外国的，处境极为悲惨。所以，我国人民向国外移居同西方殖民主义者向外扩张、开拓殖民地有着本质的区别。不仅出发点和动机不同，而且华侨到了侨居地之后毫无占领他人家园之意，而是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共同生存和发展。无论环境多么艰难困苦，勤劳、智慧、善良的华侨总能手胼足胝开辟出一条自己的生活道路，既解决了自己的生计，又为当地的开发、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发生外国入侵时，他们就同当地人民并肩战斗，为侨居国的民族独立作出贡献和牺牲。华侨的这些重大历史贡献，至今仍被许多国家人民所称道，不少地方建有纪念华侨历史功绩的纪念物。当然，华侨也与当地人发生过冲突。没有冲突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但如果把所有这些事件都考察一遍的话，人们就可以发现，华侨从来没有主动去欺负过别人，而总是被人欺负，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华侨系海外赤子，希望祖国富强。历史上他们对祖国革命与建设作出宝贵贡献，在抗日战争中还有献出生命的可歌可泣事迹；在祖国建设事业上历来有投资，经营重要项目，如兴办教育公益事业及近代新兴企业——工厂、铁路、公路、银行、市政建设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862年到1949年就有25510宗，资金达1.28亿元。毛泽东关怀华侨，团结华侨，称赞华侨是完全正确的。

过去华侨之所以常受人欺负是与旧中国贫穷落后、政府软弱无能相关的，华侨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被称为“海外孤儿”。对于这点，为拯救民族和建设祖国而终生奋斗的毛泽东自然是不能容

忍的。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提到要“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1949年9月21日，当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当然是包括广大华侨在内的。这次会议所通过的毛泽东亲自审定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1954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宪法第九十八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新中国的成立使华侨是“海外孤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政府为保护华侨正当权益做了许多工作。例如，1955年在亚丁港发生一起外国海员被谋杀案，华侨张胜被冤枉判处死刑。我国政府获悉后不惜重金聘请国际上有名望的大律师为张辩护，结果张上诉获胜，被宣判无罪。此事在海外华侨中引起强烈反应，无不为之欢欣鼓舞。再如，1951年11月20日缅甸毛淡绵海边1300余小商摊焚于火灾，其中75%为华侨所有。火灾发生后，我驻缅使馆官员立即前往慰问难侨，帮助华侨团结起来生产自救。使馆全体人员还参加募捐运动，受到华侨赞颂。通过这些工作，祖国政府在华侨心中的威望大大提高，华侨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对广大华侨来说，最重要最长远的根本利益是什么？是能在侨居国安居乐业、长期生存。在毛泽东批准的一系列文件中，特别强调这个问题，指出能争取广大华侨在当地长期生存就是胜利。事实证明，这是非常英明的。

中国人原来的传统观念并不是这样，而是“衣锦还乡”、“落叶归根”。不少华侨当年也是抱着这种想法告别亲人的。但当他们长年在外，有一定的生活根基，甚至在当地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之

后，对绝大多数人的实际情况来说，还是从此落地生根好。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是一个观念的转变。这种转变符合华侨社会的发展规律。所以毛泽东对此加以肯定，他要华侨克服保守思想，要学当地语言，要同当地人通婚，要同当地人民融合在一起，直到加入当地国籍。一开始有些老华侨对此难以接受，但历史证明了这是正确的。广大华侨华人也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了这一点。今天每当回顾起这一历程时，很多华侨华人都非常钦佩也很感激毛泽东为大家指出的这一正确方向。当然，也有不少华侨放弃国外的优裕生活回来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种爱国主义热情是难能可贵的，政府和人民是欢迎的，并给予高度评价。

为了实现在当地长期生存，除了学习当地语言，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外，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就是华侨不要参与当地的政治，遵守当地的法律。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在他批准的一系列文件中一再强调这点，指出要把华侨工作同当地革命划清界限。1954年10月26日他亲自对印度总理尼赫鲁说：“如果华侨保持侨民身份，他们就不应该参加所在国的政治活动，……应该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他还对缅甸领导人说：“华侨中也有激烈分子，我们劝他们不要干涉缅甸的内政，……不要跟以武装同缅甸政府进行斗争的政党取得联系。”毛泽东还说过，“在华侨众多的国家中，……政府怀疑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这也要在长时间中加以证明，到底我们在教育华侨守法呢，还是暗地里策动他们反对居留国政府。各国非法政治活动或者是革命，但那是本国自己的事，华侨不应该参加。”今天，可以说人们已在长时间中加以证明，中国政府没有利用华侨做不利于其他国家的事情。我们言必信，行必果，几十年来的确是按毛泽东所说的去做的，因而赢得了有关国家的理解和信任。对于这样一项成功的政策，我们将一如既往始终不渝

地坚持下去。

在毛泽东看来，华侨仅仅不给别国带来麻烦是不够的，还应促进中国同居住国的友谊，成为友好的桥梁。他强调要教育华侨做出表率，要克服大国沙文主义思想，要谦逊，尊重所在国人民，尊重当地社会风俗习惯。他说：“双方的关系不好，首先要责备自己，不要先怪别人。”毛泽东的思路是把容易引起中国同其他国家矛盾的华侨问题变成促进中国同其他国家友好的因素。这也是毛泽东常讲的：在国内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国际上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家。

解决华侨双重国籍功绩彪彪史册

为消除其他国家的疑虑，必须解决华侨问题中的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双重国籍问题。华侨的双重国籍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清王朝和民国政府都在国籍问题上采取血统主义，凡中国人的后代都具有中国籍。而华侨众多的东南亚国家则采取出生地主义，认为一些华侨出生在他们国家就应具有他们的国籍，成为他们的公民。这就形成相当多的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造成了中国同其他国家在对待华侨的法律地位上发生法律冲突，在处理华侨的具体事务中产生许多矛盾。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问题如不解决，就不能不使那些华侨众多的国家对我国产生疑虑，因为那么多的中国人生活在他们的国家，而且有些人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如果都视为中国公民，在他们看来的确是件可怕的事。这些国家都是二次大战后涌现的民族独立国家，同我国有着共同的经历，在国际事务中与我国有很多共同点，所以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在双重国籍问题上作出了果断决策，对外宣布不主张双重国籍原则，愿同其他国家友好协商解决这一问题。凡在国外加入或取得外国籍的中国血统人，不再具有中国籍，不再视为中国公民，不再要求他们效忠中国。我们还鼓励华侨根据自愿原则加入当地国国籍。1954、1955 两年中，毛泽东就同印尼、印度、缅甸、柬埔寨、泰国等领导人 11 次谈到这个问题。1954 年 10 月 20 日毛泽东主动向尼赫鲁总理提出：“华侨国籍问题也应该适当解决。”1954 年 12 月 1 日毛泽东对缅甸吴努总理说，国籍问题要搞清楚，到底是中国籍还是外国籍。他说：“我国不主张双重国籍。”

在毛泽东这一果断决策指导下，我国首先同印尼谈判解决双重国籍问题，对方也有这一要求。1954 年 10 月开始谈判，很快达成协议。1955 年 4 月 22 日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外长在万隆同印尼外长苏纳约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解决华侨双重国籍条约》。1960 年 12 月，双方制定并公布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实施办法的换文》。之后，我国在同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建交时，都在建交公报中宣布，凡加入或取得居住国国籍的中国血统人不再具有中国国籍。1980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至此，全面解决了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现在，生活在外国的中国血统人绝大多数加入或取得了外国国籍，人们已习惯称他们为华人。他们仍是我们的亲戚和朋友，周恩来形象地称他们为招赘出去的儿子或嫁出去的女儿。他们与我们同种同文，我们愿与他们保持友好关系和来往，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国友好的大门是向全世界各个国家、各种民族的人民敞开的。事实上，华人也是友好的使者，双向交流的桥梁，通

过他们可以使中国了解世界，使世界了解中国。

回顾 40 多年的历程，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如此妥善地处理好了华侨华人问题是我国的一大成功。这个问题的解决对我国同周边国家建立起睦邻友好关系具有重大意义，而毛泽东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指路人。

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周恩来总理在华侨华人工作中的光辉业绩。作为新中国建筑师之一的周恩来在华侨华人问题上也为实现毛泽东英明的战略意图作出了彪彪史册的贡献。他通过自己卓有成效的大量工作，使毛泽东的思想和决策成为现实。周恩来也有很多关于华侨华人问题的创造性的论述，非常深刻，非常精辟，至今读来仍发人深思，具有指导意义。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在华侨华人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功和非凡成就，除毛泽东的伟大作用外，无一不渗透着周恩来的心血。毛泽东、周恩来是海外赤子心中永存的伟人。

毛泽东与外国文化界朋友的 谈话的深远意义

金 畅 如

我们在研究毛泽东外交思想过程中，学习了他在会见外国朋友时的谈话。其中他与外国文化界朋友的谈话占相当部分。据我不完全统计，仅在60年代的前几年（当时我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毛泽东主席会见外国文化界方面的代表团，达70余起。会见方式有三种：（一）同时会见许多国家的各界代表团，其中包括文化界。例如：1960年5月7日，他在郑州同时会见了非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其中属于文化界方面的有5个。（二）同时会见许多国家的文化界代表团。例如：1960年11月18日，他同时会见了古巴、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墨西哥、厄瓜多尔和日本等国的新闻界朋友；又如：1964年12月24日，他同时会见了参加亚非文学交流会的许多作家代表团。（三）会见一个国家的文化代表团。例如：1960年6月21日在上海会见日本文学家代表团、1961年4月19日在南昌会见古巴文化代表团、1964年4月26日会见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1964年4月16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等。

毛泽东在会见外国文化代表团时，除合影留念外，经常与他们进行亲切交谈。针对不同要求，所谈话题也有所侧重。观点明确，语言生动，意义深远。毛泽东常常通过这些谈话阐述他的外交思想，或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阐明他的外交策略和决策。

仅举数例：

将亲写的鲁迅的诗，赠送给日本文化界朋友

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会见了日本民间教育家代表团、日中友协代表团和日本翻译出版界许多朋友时，他说：日本广大人民都是我们的真朋友，你们也会感到中国人民是你们的真朋友，朋友有真有假，但通过实践，可以看出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毛泽东针对当时日本人民在反对外国控制和反对本国反动派的斗争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挫折，就对他们说：尽管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革命经过了无数次的曲折、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最后胜利属于人民。日本人民是有希望的。

会见后，毛泽东主席把亲笔写的鲁迅的一首诗赠给日本朋友，诗句是：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毛泽东说：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时代写的。当时日本朋友对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和赠字，十分感动。

3年以后，即1964年10月中旬，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派我陪

同日中友协第九次访华代表团、日本社会活动家代表团（团员许多是教授）和语言学家等到西安、延安、上海等地参观，其中许多朋友对我说：毛泽东主席那次和日本朋友谈话和赠送亲笔写的鲁迅诗，在日本广为流传，许多进步人士，能够背诵出来，增强了日本人民反对各种反动势力的斗争勇气和信心，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

我听后，也深受感动，可见，毛泽东那次会见，其影响是深远的。

对亚、非、拉美人民反帝反殖的正义斗争 表示深切同情和完全支持

外国文化界代表团，特别是其中作家、新闻工作者和青年学生，他们来华访问的目的，主要是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在世界人民反帝反殖的斗争中，希望能够了解中国领导人对形势的分析和态度。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主席在会见外国文化界朋友时，向许多代表团表示，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受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是深切同情和完全支持。

毛泽东主席深刻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的反帝反殖斗争的有利条件。列举了越南人民、古巴人民和非洲许多国家人民在反帝反殖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他说：只要采取正确的路线，坚持斗争，依靠工人、农民，团结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及一切爱国力量，紧紧联系群众，就能够取得胜利。

支持非洲人民和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 的斗争，希望非洲人民加强团结， 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奋斗

1963年8月8日，毛泽东主席会见了留法黑非洲学生联合会代表团和肯尼亚作家以及其他非洲代表团时，亲切地对他们说：在非洲、亚洲和世界各地都有种族歧视的现象。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我们的团结不是种族团结，而是同志、朋友的团结。毛泽东在介绍中国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经过后说：可以证明，人民革命是能够取得胜利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能够打败的。还指出：整个非洲现在都处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浪潮中。不管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或者还没有获得独立的国家，总有一天要获得完全彻底的独立和解放。非洲人民正在一天天觉悟起来，全世界人民都在一天天觉悟起来，全世界90%以上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所有革命的人民，都能够团结起来，争取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在会见他们时，为了支持世界各地反对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第二天，即1963年8月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

如所周知，毛泽东在《声明》中，举出了大量的事实，说明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于是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日益不安。美国政府采取了阴谋的两面手法，它一方面继续纵容和参与对黑人的歧视和迫害，甚至派遣军队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又装出一副主张“维护人权”，“保障黑人公民权利”的面孔，呼吁黑人“忍耐”，在国会里提出

一套所谓“民权计划”，企图麻痹黑人的斗志，欺骗国内群众。《声明》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种族歧视的斗争。《声明》最后指出，“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靠奴隶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还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毛泽东这次和留法黑非洲学生联合会等代表团的谈话和《声明》，至今仍是鼓舞世界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伟大精神力量。

谦虚豁达，感谢各国朋友对中国的深厚情谊， 正确分析历史 and 对待外国经验

毛泽东与外国文化界朋友交谈时，许多次提到：我们感谢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对中国的支持，亚、非、拉美许多国家斗争的胜利，也是我们的胜利，世界上各国人民都是互相支持的，已经取得胜利的人民，应当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国际主义的义务。

当外国文化界朋友谈到要学习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时，毛泽东说：最主要的是，中国过去和你们一样，长期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依靠各国人民的支援，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他幽默地说：“你们是搞文的，我过去是搞武的，因为帝国主义在杀人，我们是被迫才搞武的。”

当外国文化界朋友称赞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时，毛泽东主席总是说，中国过去“一穷二白”，今天依靠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们没有经验，所取得的成绩我们很不满意，现在经济还比较落后。你们到各地去参观，既要看好的地方，也要看不好的地方，即落后的方面，这样才能全面。中国人民是有信心把自己国家建设好的，所以我常说：我们需要时间，需要和平，需要友谊。

有些外国文化界朋友与毛泽东主席交谈时，谈及中国的悠久历史。毛泽东主席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最有名的人，一个是孔夫子，一个是秦始皇。对孔夫子，以前把他说成是“圣人”。好像什么缺点都没有。“五四”时期，又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现在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对他进行分析。至于秦始皇，过去把他说成是最坏最坏的人，我看也要对他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价。

毛泽东对亚、非国家的作家们说：各国人民都要正确地对待自己国家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经验。他还说：现在中国的艺术舞台，存在着让死人（古人）和“洋人”（当时在场的周恩来总理解释说，是指对本国来讲的外国人）占据着的现象，应当改变。总之，我们应当重视历史遗产和外国的东西，但要从本国现实情况出发，加以分析，不能照搬。你们对中国的经验也应当这样。

毛泽东主席还十分喜爱观看外国文化界代表团带来的艺术表演。初步统计，在60年代的前几年中，有缅甸的民间舞蹈、越南的历史剧《义静烈火》、古巴的芭蕾舞和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演出的《祇园祭》等。毛泽东主席与全体演员合影留念，这使他们很受鼓舞。

从以上情况来看，毛泽东主席仅在这几年当中，就会见了这么多的外国文化界朋友并进行了亲切交谈，可见他对外国文化界的重视。在这些朋友中，来自与我国尚未建交的国家的作家、教授、新闻工作者和青年学生居多数。毛主席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

表明的态度，使他们感受甚深。毛泽东的言行通过他们向全世界人民传播，其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主席所说的中国“需要时间，需要和平，需要友谊”，就是指中国为建设自己的国家，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愿意联合世界上一切正义的力量，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不断努力。这一点已深入全世界人民心中。

毛泽东与外国记者

马 佑 增

毛泽东主席非常重视做外国记者工作。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国以后，他都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会见外国记者。他与外国记者的交往是他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一个小小的却又是极其丰富的侧面。

一 毛泽东十分重视做外国记者工作

毛泽东在领导革命战争时期戎马倥偬，建设时期日理万机，但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他都十分重视做外国记者的工作。

1936年至1939年间，一批西方记者，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斯诺当时的夫人海伦·福斯特及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等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来到陕甘宁边区，毛泽东非常重视做好这些记者的工作，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所在地保安和延安先后会见他们。1944年春中外记者团获准访问延安，毛泽东与外国记者的交往便更加频繁。到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为止，他先后在延安会见了美国记者哈里森·福

尔曼、冈瑟·斯坦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阿奇博尔德·斯蒂尔、约翰·罗德里安等。毛泽东高瞻远瞩，同他们畅谈中国革命和世界形势，给他们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其中有的记者转而同情、支持并热情宣传中国的革命事业，成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先后会见了南斯拉夫、古巴、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智利等国的新闻工作者以及来华定居的斯特朗和以美国作家与友好人士身份访华的斯诺等。毛泽东会见外国记者是他外事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泽东在与外国记者的交往中特别注意有选择地深交朋友。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于1936年和1939年两次进入陕甘宁边区采访，新中国成立后又于1960年、1964年和1970年3次来华访问，毛泽东每次都会见了。斯诺热爱中国，写了许多介绍中国的报道和书籍。毛泽东不忘老朋友，对他十分关心。1972年1月斯诺病重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派遣医护组和有关人士到瑞士照顾并问候斯诺，准备接他到中国治疗。斯诺1972年2月15日在瑞士逝世的次日，毛泽东发去唁电说：“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斯诺的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毛泽东献了花圈。斯诺的前夫人海伦·福斯特于1937年在延安采访过毛泽东，写了不少书，1972年底又应邀访华。毛泽东1973年1月3日亲自写信给她表示关怀并欢迎她再来。1978年她再次访华，在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时泣不成声。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另一位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1958年72岁高龄时来华定居，以极大热情向全世界报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她一生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和书

籍，影响巨大。毛泽东 1959 年 3 月 13 日在武汉会见了她，1965 年 11 月 24 日又在上海会见和宴请了她。毛泽东同斯诺和斯特朗等建立了真诚的友谊，这已是载入史册的佳话。毛泽东同他们的交往也为做好外国记者的工作树立了光辉榜样。

二 通过外国记者阐述重要的政策主张

在抗日战争前夕，中国人民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中国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提出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但国民党反动派不愿抗战，对苏区进行军事封锁和敌意宣传，使外界对苏区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在这严峻时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是否能广泛传播并得到各方的同情和支持是中共当时面临的重要课题。1936 年 6 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从北平出发，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成为进入边区采访的第一位外国记者。7 月，毛泽东在保安的窑洞里多次会见他，阐明中共的政策主张，强调中国各党各派各阶层应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斯诺的报道发表在英、美报刊上，引起轰动，并被译成中文出版，名为《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他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成为用多种文字出版的畅销书，此书的中译本《西行漫记》在中国读者中间也产生巨大反响，不少进步青年受这两本书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毛泽东的这次会见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组成广泛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起到了推动作用。

1946 年 6 月，国民党政府依靠美国的支持，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气焰十分嚣张。8 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对斯特朗说：“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相信人民解放军的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因为“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他还把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原子弹比作纸老虎，指出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历来主张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他把反动派比作纸老虎的论断大大增强了中国人民必胜的信心，在解放战争及其后的对敌斗争中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 通过外国记者传递重要信息， 为外交斗争服务

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埃德加·斯诺，同他谈了台湾问题、联合国问题、世界和平等问题。当时中国国内正处于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国际上美国对中国继续采取敌对政策，中苏矛盾激化。毛泽东对斯诺说：“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维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这点我们是要坚持的。”毛泽东通过斯诺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政府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只能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立场越来越得到世界人民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美国总统尼克松调整对华政策的信息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并通过斯诺传递了欢迎尼克松访华的信息。他对斯诺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游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斯诺传递了这一重要信息，对促成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起了积极的作用。1972年2月2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使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毛泽东通过外国记者传递重要信息已成为他外交决策的一段佳话。

四 同外国记者交往及巧妙 处理有关问题的艺术

新闻工作是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善于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巧妙地处理这类问题。1951年7月开始的朝鲜停战谈判是一场尖锐复杂的外交斗争。7月12日，联合国军代表团借口联合国方面新闻记者未被允许进行会议采访而单方面拒绝与会，以致会议暂停。毛泽东决定在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达成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的同时，作出必要的让步，允许对方20名记者代表作为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这就清除了枝节问题上的障碍，使停战谈判休会3天后复会。毛泽东对这次记者问题的处理是他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善于作出必要的妥协以达到预定目标的一个范例。

50年代末，斯诺分别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写信，要求访华。当时中美关系不正常，中国出于政策上的考虑拒绝接受美国记者访华。毛泽东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灵活地请廖承志同志

通过群众团体，以艾黎的名义邀请斯诺作为“作家”进入中国，这就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毛泽东做外国记者工作显示出他的独特风格，会见外国记者都取得良好的效果。他当过记者，了解记者的特点和愿望，外国记者会见他后总是满载而归。无论是在保安和延安的窑洞里与外国记者作彻夜长谈，还是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里同外国记者促膝谈心，或者在餐桌上和外国记者谈天说地，他那革命必胜的信念、精辟的见解、渊博的知识、机智的谈吐、幽默的语言和平易近人的作风给外国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诺称颂他是一个“平易、简朴、锐利、机智、老练、博览群书、精力过人、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

毛泽东反对大国主义的 光辉思想和实践

刘 毓 明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伟大缔造者。毛泽东思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壮大的指南。毛泽东外交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殚精竭虑，开创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型外交，为中国人民留下了极其宝贵、极其丰富的理论和实践财富。坚持不懈地反对大国主义，就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我国为什么特别重视反对大国主义？这首先是因为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大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水火不容。这是毛泽东提出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其次，中国在历史上曾经作为东方封建大国存在 2000 多年，大国主义思想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这种错误思想不可能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消失，相反，可能有些人因人民革命的胜利而骄傲起来，犯大国主义的错误。因此，早在新中国诞生之初，毛泽东就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无论如何不要犯大国主义的错误，振聋发聩地号召：“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

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他本人在这方面更是为我们树立了一面伟大的旗帜。他的反对大国主义的思想 and 实践，在中国乃至世界外交史上熠熠生辉，永放光芒。

一 尊重各国人民

妄自尊大，目空一切，骄横傲慢，对别国人民和别的民族，特别是对小国人民和弱小民族采取轻视、鄙视态度，不平等待人，这是大国主义的典型表现之一。

毛泽东鲜明地反对这种大国主义，一贯对别国人民、别的民族，特别是对弱小国家的人民和民族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期望，由衷尊重，平等相待。他不止一次地指出，一个民族多少年来不但保存下来而且有了发展，一定有它的长处，否则难以理解。他尖锐地批判帝国主义者散布的“有色人种论”，指出有色人种同白色人种一样都是人；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他是什么肤色，都是平等的；亚、非有色人种像有色金属一样，是有价值的，是会“膨胀”起来的。

毛泽东对亚、非、拉各国人民充满了热情，对来自亚、非、拉国家的朋友，他总是乐于会见，无拘无束地自由、平等地交谈。他赞扬日本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印度和缅甸人民聪明、勤劳；阿富汗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对锡兰（今斯里兰卡）冲破美国的封锁和禁运，卖橡胶给中国，他指出这是一件大事，表明锡兰人民是勇敢的。他对尼泊尔、柬埔寨

寨等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指出这些国家变成强国的可能很大。他早就断言整个非洲、拉丁美洲是很有希望的。

毛泽东关于抗美援朝的决策以及停战后对中朝关系的处理，最突出、最集中、最鲜明地反映了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主义的原则立场和崇高精神。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在下达的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特别指示：“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终于赢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完成了祖国人民的重托，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毛泽东的命令。

在这里，特别应指出的是，毛泽东不仅要求志愿军全体指战员这样做，而且作为最高统帅，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如1950年12月，为保证中朝两国军队的粮食供应，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提出了向朝鲜新解放区暂行借粮办法，报告并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当即致电转发给金日成首相，在电报中，他表示“同意”彭德怀提出的办法，但把决定权留给了金日成和朝鲜政府，郑重提出请他们“审议批准”、“公布实行”。从志愿军出国到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毛泽东在领导作战和谈判工作中，既提出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又充分尊重朝鲜党和政府。“金首相意见如何”，“请金首相考虑”，这样的话在毛泽东发出的电报中屡见不鲜。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朝鲜形势趋向和缓，毛泽东及时提出朝中谈判代表团的工作请朝鲜同志负责，并请金日成首相直接领导。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和实践，不仅在中朝友好关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也为当代国际关系树立了光辉典范。

二 援助是相互的

大国主义不愿援助别的国家，即使有所援助，也视为单方面恩赐，俨然以恩人自居，甚至在援助时附加种种条件，向受援国要这要那，把手伸得很长。

毛泽东则一贯主张：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要帮助别的国家，不能只顾自己。他强调，当代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都是相互支持的，援助是相互的。

首先，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除了依靠自己的力量外，也是同各国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在得到苏联和各国一切革命力量的支持下才获得革命胜利的，而中国人民的胜利对于正在斗争中的各国被压迫人民，也是一种援助。

关于抗美援朝，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是帮助了朝鲜人民，但如果认为这种帮助是单方面的，认为朝鲜人民没有帮助中国人民，那是不对的。没有朝鲜人民的英勇斗争，中国是不会安全的。敌人打到了鸭绿江边，如果不打退他们，中国的建设也是没有保证的。朝鲜战争的胜利是中朝两国人民共同取得的，是互相帮助的结果。而且，第一是朝鲜帮助了中国，第二才是中国帮助了朝鲜。

越南领导人在其抗美救国战争期间和胜利以后，一再感谢中国的援助。毛泽东同样指出，中国人民应该感谢越南人民。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这期间中国先后同70多个国家签订了关于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协议。毛泽东要求帮助发展中国家搞建设项目的中国援外单位和有关人员，一定要贯

彻少花钱多办事的精神，要帮助人家仔细算帐，决不要给了人家钱又让人家背上包袱。在他看来，受援国发展起来同中国发展起来是一样的重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发展起来了，对中国是极大的帮助。

三 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热诚期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同各国友好合作，求得共同的发展和繁荣。但当时，有些国家的政府对新中国心存疑虑，有的害怕中国以大国自居，不能平等相待；有的害怕中国搞侵略扩张，在他们国家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广泛地、不断地、耐心地向这些国家做工作。

毛泽东指出，所谓大国小国只是一种心理状况，一种形式。说大国是不好惹的，小国是随便可以欺侮的，这种论调是绝对没有道理的。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说大国高人一等，小国低人一等，这是帝国主义理论。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小，它同大国应该是完全平等的，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就应该互相尊重。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而把其他国家看成是自己的子弟。

毛泽东在这里阐述的大小国家完全平等的思想，同样体现在他会见外宾时，无论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还是外国驻华使节，也无论是学者、作家、记者，还是青年朋友，他都一贯保持着平等待人的高尚风格。

他在对外交往中十分谦虚。他多次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

使我们感到惭愧。又说，现在中国虽号称大国，但力量还弱，经济和科学文化还很落后，要改变这种状况，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他诚恳地告诉外国朋友，我们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也开始看到一些成绩，面貌开始改变，但缺点很多，认为中国都好没有那回事。我们需要朋友，需要学习。谈到他本人时，他更是虚怀若谷。他多次对外宾说：“我是个普通人。”“我也没有上过大学，我只进过师范学校。”“我并不是生下来就干革命的，直到十月革命以后，才开始读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知道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我和我的党在一起，治好了中国社会的一些病，但是还有些病发现了还没有治好，也还有些病，我们到今天还没有发现。”有的外国朋友赞扬毛泽东是“反对殖民主义争取解放斗争的人民的领袖”。他当即表示“不是领袖，是朋友”。

毛泽东对国际友人十分尊重。1972年，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华，会见毛主席时提出，她有3个孩子，并拿出带来的3张照片，请毛主席签名，毛泽东当即在3张照片上一一签名。她又拿出签名簿，请毛主席为她本人签名，毛泽东欣然挥笔写下“毛泽东赠班夫人 1972.6.28”。1975年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时，毛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予以会见。会见结束时招待人员报告说，代表团中有3位团员没有赶上同主席握手，请示怎么办。毛泽东当即示意请他们进来。朝鲜代表团团长请他休息，不要等了，并起身告辞，而毛泽东仍挽留他坐下。直到3位团员进来，毛泽东同他们一一握手以后才与全团告别。

毛泽东会见外宾后经常把客人送至门外，就是在年迈有病、走路困难时，也尽量这样做。来自五大洲的朋友们为此衷心赞叹：“毛主席特别伟大可亲”，“真是了不起”。

四 大国不应损害小国

毛泽东多次指出，大小国家既然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不应该在政治上压迫小国，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于小国。他强调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自己管，一国的国内纠纷由这个国家自己解决，别国不得过问，也不得利用这种纠纷。他还对外国朋友说：我们不在你们的国家讲共产主义，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我们不挑起人家来反对他们的政府。我们教育华侨拥护侨居国政府，尊重侨居国法律，与侨居国人民友好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有人说中国要侵略、要扩张。针对此，毛泽东指出，中国一没有抢夺各国市场，二没有在别国建立军事基地，三没有派军事顾问团到别的国家去，四没有同别国订立不平等条约附加政治条件。事实上不是中国要侵略，而是中国怕别人侵略。他还多次讲，人口多就应该向外扩张，到别国去取东西，这是希特勒的理论。中国对别国的土地一寸也不要。中国的土地相当多，大部分没有开发。中国人口多，可以依靠本国的土地和资源用发展生产的办法来解决。中国不要打仗，既不想打世界大战，也不想打局部战争。中国需要的是长期的和平环境，是国际合作和帮助。中国愿意同所有国家友好，100年、1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

五 不强加于人

毛泽东反复强调在国际交往中要反对强加于人。他在同来访的亚、非、拉国家的客人谈话时多次讲，中国的经验只能供你们参考，你们以你们的经验为主，参考外国经验为辅。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不要生搬硬套中国的经验。他同外宾谈话后常说，我讲的意见，只供你们参考。

1967年10月，中国某驻外使馆不从驻在国实际情况出发，在国庆招待会讲话稿中点名指责另一国家，还对驻在国国内问题作了不适当表述，驻在国政府提出意见后仍拒不考虑修改讲话稿，导致驻在国对使馆国庆招待会进行抵制。毛泽东主席获悉此事后迅即予以严厉批评，指出这是“强加于人”，是“大国沙文主义”，“要进行教育”。

1968年，毛泽东曾就对外宣传工作连续提出意见，集中纠正“强加于人”的错误倾向，短短3个月期间，指示就有近10次之多。他指示不要在援外飞机上喷刷他的语录，他不赞成国内群众向外宾赠送他的像章，他在审阅有关单位的请示件时删去了“中国援建工程的成绩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等提法，指出：“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他看到一份文件中有“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的语句，立即指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他严肃提出：“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

毛泽东反对大国主义的鲜明立场和态度，受到了世界各国朋友的赞扬。

在外交部毛泽东外交思想 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

(1993 年 12 月 8 日)

田 曾 佩

为纪念伟大领袖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学习、继承和弘扬毛泽东外交思想，拓展外交新局面，我部除同中央文献研究室合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外，经过一年多的筹备，收到部内外有关单位和个人撰写的研究毛泽东外交思想的论文共 30 多篇，举办了这次为期两天的毛泽东外交思想研讨会。江泽民总书记特致贺词，李鹏总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主持开幕式并发表了讲话，中联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文化部和社科院的负责同志也讲了话。出席开幕式的还有吴学谦、贾春旺、齐怀远、曾建徽、郑必坚等同志。昨天下午和今天，又有 15 位同志发了言。两天的研讨会，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外交思想，交流了学习心得和初步的研究成果，重温并加深了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认识和理解。这对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外交思想，进一步搞好新时期的外交工作，无疑有着重大意义和积极影响。

毛泽东外交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外交思想丰富多采，博大精深，是

我们学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宝库。外交战线虽然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外交及其制定的外交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是比较熟悉的，但过去还没有组织过这样大的研讨会，比较集中、系统、全面地研讨毛泽东外交思想。尽管这次研讨会因时间关系，还有一些准备发言的同志未能发言，大家发言后也没有展开讨论，但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毛泽东外交思想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开了一个好头，是值得祝贺的。

大家知道，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了战后最重大的变化，世界处于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新旧矛盾错综复杂，缓和与动荡共存。在这种情况下，深入学习和研究经过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的毛泽东外交思想，用以指导外交工作，尤为重要。毛泽东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方针政策和外交艺术风格，永远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继承和发扬。正如邓小平同志说过的：我们现在执行的仍然是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邓小平同志不但继承了毛泽东外交思想，而且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毛泽东外交思想。他对我国的外交政策适时地进行了重大战略调整，改变了过去“一条线”战略和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估计，明确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强调处理国家关系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更加鲜明地突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对国际事务作出判断，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最早提出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国两制”的构想、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原苏联、东欧剧变，世界新旧格局交替之际，又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

付等战略方针,极大地丰富并完善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使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指导我国的外交工作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开拓了大好的崭新的外交局面。

这次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研讨是成功的,但也是初步的。我希望,在这次研讨会的基础上,今后我们要继续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全面、科学地研究毛泽东外交思想和邓小平的外交思想,用以指导新时期的外交工作,更好地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服务,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友好合作和共同繁荣,以及全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这是我们对伟大领袖毛泽东最好的纪念。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

作者=

页数= 3 3 3

S S 号=

D X 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

书名	
前言	
目录	
在外交部毛泽东外交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李鹏
学习毛泽东外交思想做好新时期外交工作	钱其琛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光辉思想积极开展党的对外工作	李淑铮 1
学习与弘扬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	滕 藤
继承毛泽东对外经济交流思想促进我国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贸易事业的发展	
刘向尔	
毛泽东和中外文化交流	陈昌本
毛泽东的民间外交思想和重要决策	韩 叙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外交战略思想	姚仲明
学习毛泽东外交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学	刘 山
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探析	郝润昌
毛泽东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若干论述	傅耀祖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演变	迟爱萍 1 1
毛泽东对外战略中掌握主动的思想	谢益显 1
学习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周溢潢
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建交原则与创建新型外交的重大思想决策	黄嘉华 1
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先声——简论毛泽东关于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主张	尹承德 1
重大的历史决策——论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与策略思想	木 君 1
学习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	曹桂生 1
毛泽东高屋建瓴的策略思想和斗争艺术——学习中美大使级会谈策略运用的点滴体会	赵祥龄 1
毛泽东关于反对美国武装干涉台湾的决策	沈智焕
毛泽东关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思想	张立淦
学习毛泽东关于西欧联合自强的思想	高存铭
试论毛泽东关于中法关系的战略思想	曲星
毛泽东关于睦邻友好政策的思想和实践	马行汉
毛泽东关于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和黎巴嫩、约旦、伊拉克反抗外来干涉的决策	郁兴志
毛泽东关于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斗争的决策	曾 涛
毛泽东关于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斗争的思想	闻兆祥王小庄
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为中非友好合作关系奠定坚实基础	钟 非
毛泽东关于发展中拉关系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蔡维泉 杨万明
新中国华侨工作的指路人	张宏喜何锦
毛泽东与外国文化界朋友的谈话的深远意义	金畅如
毛泽东与外国记者	马佑增
毛泽东反对大国主义的光辉思想和实践	刘毓明
在外交部毛泽东外交思想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	田曾佩